

炎黄春秋

张闻天在五四时期的先见

怀念我的哥哥叶笃义

理想家实干家章乃器

我为刘伯承治眼病

吴组缃真话说到底

第5期

2004年

炎黄春秋杂志社主办

目 录

特 稿

- 1 李定：学者型的领导干部 徐庆全
6 章乃器：理想和实干铺就的坎坷人生 许水涛
——章乃器之子章立凡访谈录

春秋笔

- 13 张闻天在五四时期的先见 张培森
17 “学大寨运动”的回光返照 淮北子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报道琐记

人物志

- 23 吴组缃真话说到底 吴继路
27 《大公报》的创始人英敛之 王 鹏

往事录

- 32 赵尔陆含冤逝世真相 张开善
35 我为刘伯承治眼病 陈智慧
40 渡江战役前夕的危险旅途 张惠卿

怀人篇

- 46 我的引路人——姑母刘静君 刘导生
49 怀念我的哥哥叶笃义 方 实
53 不悔的子冈 付 阳

求实篇

- 57 遇罗克冤案是如何披露出来的 祝晓风 张洁宇
62 关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真相》一文的补正 迟泽厚

一家言

- 64 “七君子”群像落成感言 章立凡

他山石

- 66 彼德大帝的出海梦 陈德辉

文荟苑

- 69 漫谈曹雪芹的人生态度 胡德平
73 曹雪芹与黄叶村 贺 海
76 漫画家沈同衡 萧 阳

文配画

- 80 浅说时尚
——精神现象零拾之十四 陈四益 文 丁 聪 画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杜润生 任仲夷
周 惠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一鑫
李学勤 李维民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宋文茂 苏双碧 张 鍤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范敬宜 钟沛璋 凌 云 曾彦修
戴 逸 魏久明

社 长 (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 社 长：

方 实 徐 孔(常务)
杨继绳 吴 思

执 行 主 编：

李 晨 徐庆全

编辑室主任：赵友慈

办公室主任：底先华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陈 渊

理 事 单 位：深圳市亚大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秘 书 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电 话：(010)68522852 (办公室)
(010)68534879 (编辑室)
(010)68532048 (发行部)

传 真：(010)68532569

印 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 购 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龙源期刊网

网 址：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 版 日 期：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 价：4.80元

李定：学者型的领导干部

● 徐庆全

一个月前，一位我所尊崇的老前辈给我三大本《李定文集》，让我看看。“李定是谁？”孤陋寡闻的我随口问道。老前辈说：“李定去世前与我比邻而居，他官止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华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不过这是一个非常有见地的学者型官。简单地说，在政治思想上他是一位活跃的敏锐的领导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坚定维护者实践者；在职务上，他是北京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与中共沟通的一道桥梁，是我们党统一战线工作上的一位当之无愧的优秀领导人。”

老前辈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一个月来，我翻阅了厚厚的《李定文集》，查阅了他的资料，走访了与他相知相识的前辈。有关李定的一个个历史片断慢慢缀联起来，李定以鲁迅所说的须仰视才能看得见的人的形象，在我脑海中定格。

以笔作刀枪

李定原名杨邦祺，1923年11月出生于云南省施甸县。父辈所给予这个名字，大致代表了一种理想和寄托——邦者，国家也；祺者，安定也。李定的父亲杨华是云南讲武堂第一期学员。人们对这个讲武堂不是很陌生，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的朱德履历上就有这样一笔，不过，人们不知道杨华那时正与朱德是校友。因为这一关系，杨华也与中国革命有了一段渊源关系：1927年南昌起义后，朱德率部上井冈山，在艰难重重中得到了时任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同情革命的范石生的支援，而杨华恰好在这支军队中担任团长，他对革命也融入了一份同情。

这样的渊源关系，使幼年的杨邦祺显然滋生

了向往革命的理想。在中学时代，“挥斥方酋”的参政意识，使李定更多关注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的现实。日本的入侵所唤醒的强烈民族责任感，使他用笔作刀枪，在《云南时报》“副刊”上发表了多篇抗战散文、诗歌。这样的意识，也使他融入到一群进步人士中间去，接受了更多进步思想的熏陶，并开始阅读马列主义书籍。1942年，日本的铁蹄踏上了云南省，在西南联大学习的李定已经不安于坐而论道了，他决定休学，直接到抗日前线。他到《云南日报》担任编辑和战地记者，奔赴滇西采访，报道抗战前线战况，用一支笔尽自己的所能，唤起国人的爱国热情。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所实行的独裁政策，不但让国人失望，也使李定涌起了与这种独裁相抗衡的决心。他积极参与组织西南联大及昆明学生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运动。他的学识和他的干练，使他成为独当一面的罢课委员会宣传部长，负责昆明学联《学生报》的工作。这场学生运动所起的作用早已载入史册，李定的名字也成为史册中一个高音符号。

1946年，李定到北京大学继续完成学业。第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履历上所增添的这笔，意味着他已经从一个自在的进步革命者转变成为一名与他所追求的事业融汇在一起的自觉革命者了。

开拓性的地下工作者

1948年，对于追求民族和人民解放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说，已经看到了黎明的曙光。11月初，辽沈战役胜利结束；12月初，淮海战役虽

然鏖战正酣,但胜利已经不是什么需要担心的问题。平津战役的序幕已经开启了——人民解放军已经对天津形成了包围之势。

在这兵临城下的决战前夕,处于恐慌中的国民党市长杜建时、城防司令陈长捷和警察局长李汉元又增添了另一种恐慌:他们常常接到一位神秘人士打来的电话,劝告他们放下武器,弃暗投明。这样的电话来自于位于天津市中心繁华地区的罗斯福路(今和平路步行街)哈密道口的《大公报》馆内,而拨打电话的就是李定。

1947年8月,完成学业的李定,经党组织安排,在天津《大公报》担任记者,有了一个公开活动的身份。而他隐蔽的职务是:中共天津市工作委员会成员,《大公报》地下党负责人;后来又在“迎接天津解放行动委员会”中负责职业青年工作。党组织先让他负责联系学校的工作,后来又让他从事社会方面的工作——通过与一些民族工商业上层人士的接触,及时获取有关国民党的情报,做策反工作和开展对敌斗争。打那些神秘电话,自然也是策反的重要工作之一。

李定后来先任天津市统战部部长、“文革”后调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与他这一时期的工作自然分不开的。

当时,李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工商界,并选定地位最高、名望与影响最大的天津永利久大化

学工业公司董事长李烛尘为统战对象,再通过李烛尘去影响工商界。

李烛尘和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林伯渠是同乡也是同学;他同时也是董必武等人的好友。他在工商界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了解更多一些,因而对这个政府的作为甚怀恶感,他对《大公报》客观公正的报道则抱有好感,很愿意在《大公报》发表自己的政见。而李定平和的工作方式使他与《大公报》的距离更近了。

李定经常去专访李烛尘,报道他的“只有和平才可以发展工业”、“只有停止内战才可办好工业”等观点,更会让李烛尘谈对时政的看法。他报道过李烛尘对国民党的看法: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所谓“接收”实际上是“劫收”;他也报道过李对“四大家族”之一宋子文的揭露与谴责。

当时,李烛尘在天津组织了“工业协会”以团结工商界人士,每周三和五聚会,名为“三五俱乐部”。李定是这家俱乐部的常客。这个协会所作的一切让天津国民党感到恐惧,便组织了一个“工业工会”来与之相抗衡。李定根据党的指示,暗中引导并支持李烛尘的爱国行动,并在《大公报》上揭露敌人的阴谋。他还主动到“三五俱乐部”去演讲,介绍国内外形势,唤起这些业内人士对国是的关心,此举也使他赢得了工商界人士的信赖和赞誉。

因为统战工作做得好,李定经常能得到一些情报。一次,美国“救济总署”负责人莱普汉一行突然造访天津,地下党要求李定尽快搞清美国人此行的意图。李定找到李烛尘,了解到莱此行的目的是企图用“美援”拉拢傅作义。李并告诉他,所谓“美援”,只不过是“撒点胡椒面而已,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李定立即在《大公报》上发表题为《美援有如撒胡椒面》的报道,不但将莱之行公布于众,而且揭露其阴



1974年全家合影(前排左起:李定、李美全;后排左起:杨雪野、杨松涛、李晓云)

谋。

善作统战工作的李定,在工作中创造性地开拓工作。为了联系新闻界其他报馆的地下党员和进步记者,他主持联系成立了“天津记者协会”,作为地下党的一个外围组织,在新闻界秘密开展统战工作。这项工作卓有成效,甚至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的机关报《民国日报》的人都参加了革命。

平津战役打响后,我平津战役指挥部发现,敌人的兵力部署有了变化。搞清楚变化的情况,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这项任务义不容辞地落在了李定的身上。李定知道,国民党天津某兵站支部长李贻亮是《大公报》记者、地下党员李光诒的侄孙,便通过李光诒去做工作,将敌人更新部署的兵力和火力装备、军需供应等情况,统统搞到手,及时送到解放军前线指挥部。

这项工作做完后,善于开拓工作的李定进而又继续利用这一线索,进行策反和保护天津的工作。在他的安排下,李光诒又继续通过李贻亮策反国民党的另一个少将支部长。这项工作很有成效。在解放军即将进城前,陈长捷下令炸毁这个兵站的新仓库时,这位少将支部长批示“贻亮处理”,使李贻亮得以借故拖延,把这座装满军用物资的仓库完整地保存下来,交给人民解放军。

李定在天津解放前夕的几个工作片断,当然远远不足以展示他在血与火的形势下的整个工作内容,却足以展示他的学识和统战工作的才能。因此,天津解放后,他在担任了短时间的天津团市委宣传部部长后就改任统战部副部长的职务,成为天津市委统战部的筹建人之一。

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与中共沟通的桥梁

在李定一生的任职中,在统战部工作的时间是最长的:在天津,他干了20年,在中央统战部,他又干了7年;其后在中华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和全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的位置上,也都是统战工作的延续,应该说是“老统战”了。后人要写他,这应该是重点叙述的内容,但是,梳理材料后却发现,也只有几个不完整的片断。这其中的原因大致有两条:第一条,用他的夫人李美全的话

说,李定在家里不谈工作的事情,而李美全又是党性很强的人,也从不问。第二条,李定是个平和而不喜张扬的人,从不谈自己工作的成绩,在媒体露面的机会也很少。不过,在《李定文集》中却留下了他对统战工作的一些思考,使我得以结合几个历史片断,为李定20年的统战生涯画一素描。

李定晚年在回顾和反思建国后党的统战工作时,借用工商界人士之口,认为有两个“黄金时期”:一个是建国到1957年反右前,一个是改革开放之后。

本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统一战线”是我们党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我们的统战工作应该是非常优秀的,团结了大批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和工商业界人士。建国最初几年,也依然延续了这一传统。从新政协的筹备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民主党派都占有重要席位。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到各个部,都有民主党派担任副主席、副总理或部长。直到1954年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央还坚持要求各地地方党委保证安排25%的党外人士为厅局级官员。而且,这一段时间内,中央的许多重大决策也都是和民主党派协商的。但是,1957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李定用简略的语言描述为:“包括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在内,内心深处才开始与共产党分离。”(《文集》第三卷1410页)

至于为何会出现这种变化,李定也有精辟的分析:

50年代,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巅峰时期,以胜利自居的心理,对群众解放者自居的心理,自视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光荣、伟大、正确的心理,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留给共产党人在胜利后“君临天下”的心理,很难接受“犯颜直谏”。这里还深深隐藏着一种心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不能与人分享。民主党派要想更多更深地参与是不能接受的。公开提出“轮流坐庄”更是“造反夺权”的言论,只能伐之、诛之(《文集》第三卷第1420页)。

身为一名党史研究者,读到这样一位高级干部酣畅淋漓的文字,心中油然而腾起一种敬佩感。我想,李定这种求实的精神和勇气,实来自于他20年统战工作的切身体会。

由于在解放战争期间从事统战工作的经验，加之中共中央在开国初年团结民主党派的正确国策，李定在1950年就任天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后，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在贯彻党对民主党派和原工商业者的方针、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奠定了天津市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工作的基础。他注重联系实际，广交深交党外朋友，紧紧依靠各级党委和各方面的力量做好统战工作，为天津市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可惜，这一段时间太短了。反右开始后，李定就再也无法舒畅地工作了。

面对着使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遭受灭顶之灾的反右派运动，李定心中是如何想的？我虽然看不到有关材料，但是从李定在回忆与自己一起工作过的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时所讲到的情况看，他显然是不赞成这样的运动的。

李定在回忆万晓塘的文章中，透露出这样几个事实：一、在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中，天津市“在民主党派领导层和基层主要成员中都没有出现问题”；二、在反右派运动中，李定“因为言论‘右倾’、同情知识分子，也受到批判”。因为这样的批判，1959年他被下放到钢厂。三、“从后来‘摘帽’的情况来看，天津在反‘右派’斗争中，划‘右派’没有像一些省市搞得很大，这与市委的掌握有关。”（《李定文集》第三卷第1464—1465页）

不事张扬的李定，在这里丝毫没有谈到自己是如何做的，而把功劳全给了万晓塘和市委了。熟知这两次运动的历史情况的人都明白，在运动中，各级党委和政府某一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的权力是非常大的，这一点在反右派运动中表现得更明显一些。一般说来，这一部门的负责人如果要定某某为右派，基本上这个人是没有跑的。正因为如此，某一部门的负责人做法是“左”的——当然，这来自于中央的“左”，这一部门的右派数量就多；反之，这位负责人有难能可贵的独立思考，能在“左”的大潮中保持清醒头脑——当时的情况往往被称之为“右”，这一部门的右派数量就少。李定显然是属于后一种，否则的话，他也不会因为言论“右倾”而遭受批判并被罢官的。

更令人钦佩的是，即使被罢官后，李定仍然

坚持实事求是，自觉抵制那些“左”的做法。

1959年10月，李定被下放到天津第四钢厂担任党委书记。此时，因庐山会议而兴起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之风又蔓延到全国。因为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提意见而被打成为“反党集团”，所以全国各地都在寻找“小彭德怀”，寻找“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李定所在的钢厂自然也难免要受到影响。但是，李定却和干部、工人一起会战半个月，对这场运动不积极——“没有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虽然李定不抓，但是大形势的逼迫，却使一些干部和工人“怕戴上帽子，心情紧张”。一位老工人因炼钢材料问题无法完成任务，竟然找到李定，恐慌地承认自己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而李定则说“谁说你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你们是好同志！”老工人听到这样的话，禁不住热泪盈眶。看到这样的好同志，体会到“反右倾带来一种心理恐惧和说假话之风”的李定，也“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更可贵的是，李定非但不抓“右倾机会主义者”，而且坦然地在上级领导面前陈述自己对这场运动的看法。第一次他向市委反右倾工作委员会阐述自己的意见：不能把反右倾和生产上的困难混为一谈；第二次他更向市委说：在原料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职工努力拼搏已经很难，没有右倾分子，硬要找右倾分子，这不是党的政策。在那个人人自保的年代里，李定的胆识和勇气可敬可佩！当然，他这样做，在“文革”“左”风达到极致的年代里，却得到了“阶级调和”、“只统不战的投降主义”等帽子。

“文革”爆发后，李定戴这些帽子而身陷囹圄。在饱受折磨被解放后，他依然挂怀统战工作，并对“文革”“左”祸有了更深切的反思。

1971年，李定又回到天津市委工作。1973年4月，他又重新担任统战部副部长（稍后任部长）。面对着令人忧心的国家大局，他心急如焚。他曾向友人发问：“这样的继续革命到底还要革到什么时候？还有什么人没有被革？”“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李定这里已经失去了光环，他已然明白，靠这种理论将国无宁日。

更让李定揪心的是，统战工作开展的余地已经很小了。他曾经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当时工作的困境：做统战工作就像坐在一个跷跷板

上,要寻求一个不翻跷的平衡点,非常困难。稍有偏差,便是右倾,后果不堪设想。尽管这样,他每天仍然拖着疲惫的身体去看望他的“统战对象”,兢兢业业地尽自己的一份力。李定在当时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一如既往地关照党外人士的政治生活和物质生活。1974年1月5日,他主持恢复了天津文史研究馆,安置了一批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同时,



1996年李定夫妇在美国洛杉矶合影

他把“统战工作”做到了日本。1975年,在他的主持下,天津市和日本神户市结为友好城市,这在全国还是首创。当年6月,他自己亲任天津市神户友好访问团秘书长,到日本访问。

可是,他心中的困惑也越来越多:一面说了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面却又高呼“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他所要统的对象,又批判,又团结,到底以什么为主?目的到底是什么?

困惑积累多了,李定的思维也在反思中清晰了。他对造访的好友马识途说:

我认为统战工作就是要做到团结大多数的人,共同来建设我们的新国家,但是现在的做法却实际上以批判为主,把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打倒了,甚至把党内的许多老干部当作走资派打倒了,到底靠谁来建设我们还十分落后的国家?

这样的发问,应该是我们语法上所通常讲的“设问”——实际答案李定心中已经给出了。他已经清醒地知道:目前这样大革文化命,实际上是在革国家的命!他也知道,要建设好这个国家,统战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庆幸的是,这样的“革命”在1976年那个金秋十月被终结了,党的实事求是路线又回来了。被李定称之为统战工作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来临了。李定也随之担负了更重要的责任——1982年调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对私营经济的开拓性思考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改革开放路线,使我们党紧紧抓住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解放、发展生产力的主线。统战工作也有了新的任务,那就是调动所有积极力量,为国家这个根本任务服务。担任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李定,紧紧围绕党中央各个时期的工作中心,以实际情况为基点,不断提出统战工作的目的、作用及工作方法。他关注国家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特别关注私营经济的发展道路,对中国的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直伴随着种种争论,而争论最激烈的,还是私有经济。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反对私有经济的看法还是占上风的时候,李定就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要发展生产力,一定要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他把私营经济当作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当作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当时来说,这一认识是超前的,也是在今天被历史发展所证明了的正确观点。

三大卷的《李定文集》,汇集了他从1982年到2000年所撰写的重要文章、讲话、调研报告、札记等等内容,体现了他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和研究学者水准”。文集集中的(下转第75页)

章乃器：理想和 实干铺就的坎坷人生

——章乃器之子章立凡访谈录

● 许水涛

许水涛：我在中学时代就从“七君子事件”中知道章乃器先生的大名，粗知历史之后，又得知他是1957年钦定、后被改正的右派。关于他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虽然已有文章披露。但我想，从您的角度谈，既有带着感情色彩的亲人的视角，也有带着理性成分的学者的视角。

章立凡：我怎么看待父亲，涉及到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这么一个话题。他们这一代人实际上是处在传统与现代这种转型阶段，既受传统文化教育的熏陶，又接受现代民主思想的教育；既有传统道德所讲的“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理念，又有讲宪政、讲民主、讲法制的思想；是很特殊的一代人。我父亲在做人方面是按传统文化的要求做的，对社会理想则更偏重于“科学与民主”，他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许：他这代人处在内忧外患的大变动的时代，只有把他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看才能看得透彻一些。

章：这也是我们研究历史最起码的一个原则。

特立独行

许：关于您的父亲，我在接触有关史料的过程中油然而生崇敬之意。他可以成为著作等身的学者，但坐而论道不是他的风格；他可以成为拥有巨资的民族资本家，但他的抱负和理想并未停留在实业救国的层面上；他可以成为国民党政府

的要员，却因根本不认同这个政权而主动放弃。他给我的感觉是一个特别忙碌特别勤奋的人，可惜他做的不少事情是半途而废的。

章：的确是这样的，但这种半途而废放在内忧外患的大变动的时代就可以理解，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政治的热忱使他屡屡放弃了个人的许多东西。父亲的生活确实涉及到许多领域，我承认他有成就，但他最终是个失败者，因而有很多人说他是个悲剧性人物。他早年成为著名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1932年6月，他出面联合上海各华商银行，成立了银行界的公用机构——中国征信所，负责对银行客户的信用进行调查。这是国内第一家由中国人创办的此类机构，他出任董事长，靠公平竞争击败了所有的外资，非常成功。他所著《中国货币金融问题》一书，被译成英、日文，成为研究中国这一经济领域的权威性著作，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他不满足于此，深感对国家民族的兴亡负有责任，必须与闻国是。

1933年以后，他参与了救国运动的发起，直到1936年被捕，救国会的文件几十万言，十之八九是他执笔的，是救国会里的“宣言专家”，这就招来了国民党的迫害。上海市长吴铁城警告银行里不应容留章某，否则对银行不利。在国难当头之际，他一点没在乎。银行副经理、征信所董事长的职务是在几分钟之内就决定放弃的。从银行辞职后，他下定毁家纾难的决心，把全部精力投入救国运动。有的人认为他傻，或认为他应该事先

商量一下,但这些过程都没有。

1940年6月,他在大后方与上海银行的陈光甫合资创建上川实业公司,设酒精厂、手摇发电机厂、机器厂、畜牧场等,任总经理。当时战备物资极端匮乏,民间机动车几乎弄不到汽油,酒精厂生产的无水酒精正可替代,因此获利不少。但他更关心战时整个民族工业的存亡和发展,提出了解决恶性膨胀的根本办法,为清除腐败,建议实行国民财产登记制度,个人资产实行一名制;对战后中国的建设,他主张利用外资发展民族工业,实行大公司小股东制度,倡议开发大西北;他提出“工业立体发展”的重要思想,认为工业组织和技术的平面发展必然造成重复建设,主张建立“运用高度的组织力量和高深的技术”的立体工业经济体系。他创建了中国工业研究所,制定许多经济发展计划,像修筑轻便铁道、清理长江航道、救济困难企业等。

许:如果他一直这样做下去,那肯定会成为经济大亨的,可是他还是放弃了。

章:是的。有人说他是理想主义者,他有非常理想甚至是超前的一些东西,从信仰进化论、三民主义到信仰社会主义。他一生做过许多新年之梦。在1933年《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征文中,他认为中国“非革命无以图存”,“中国将来的革命,必然是一个向整个的上层阶级进攻的左倾的革命。那个革命的目标,不单是要推翻帝国主义,而且同时要推翻帝国主义的虎伥。”

许:这是一个被历史发展证明了的梦想。

章:但他的梦想也有许多幻想的成分,真正反映了理想主义者的色彩。抗战胜利后,他发表杂文《我想写一篇小说——20年一梦》,借主人公黄子孙1945年的元旦之梦,抒发他的社会理想。在梦中,中国实现了民主政治,“全国的人民个个都拿主人翁的身分,热心国事,因此,不但政客官僚不能包办政治,各个政党也都在争取人民的同情。”“中苏之间的亲善,更是举世无出其右。”“英美以大量的资本和技术帮助中国建设,已经在进行第4个5年计划中。中国现在,重工业的发达虽较苏联稍次,而轻工业的发达却已经超过了苏联。”“国民生活已经比20年以前提高了10倍,依然还有大大提高的可能。”他还梦见许多已经被杀害的人们仍然活着,并担任着重要

的工作;杀人的刽子手改行作了国营大屠宰场的屠夫,官僚们一部分变为善于伺候人民的公仆,另一部分成为医院的看护。拿着剪刀检查文字的人们,被分配到大型的国营服装厂做裁剪师;检查信件的官员则成了机关、企业中处理日常来信的助理秘书。但这位黄兄一觉醒来,“如像天堂掉到地狱里去一般”。1948年元旦,父亲开始了他的新中国之梦。他在《乾纲重振》一文中写道:“‘世乱奴欺主,运衰鬼弄人’,这是多少年来中国政局的写照。可是于今为烈。老百姓供养的公仆,变成特权阶级,进一步‘我为刀俎,民为鱼肉’,要吃主人的血肉骨髓。”“新的开始就是主人‘乾纲重振’,自己来管事,把这一班恶奴扫除得一干二净。同时,人抬起头来,把鬼打到地狱里去。这就是民主世界,也就是人的世界。”一年后,父亲又写下《新的转折点》一文,作为1949年的新年献词。他热情地预言:“时序更新,人类历史亦翻到更光辉灿烂的新页。”“亚洲各地民族革命,将因中国革命之胜利,而更加蓬勃。整个亚洲大局,将于今年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一年之计在于春’,愿从今天起就开始努力。”

许:他是一个理想远大、追求执着的书生,所以,当任何现实的物质利益与他的理想和追求发生冲突的时候……

章:他还是选择理想。

许:而且表示得很果断、迅捷,基本没有瞻前顾后和深思熟虑。

章:是的。他的表态从来都是很明确的,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同意就是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他会当场表态。这种做法当然会让有些人下不了台,这除了性格上的原因以外,还跟他曾从事的职业有关。银行是一个非常精确的体系,不允许有任何差错,这种职业训练也使他对事物的判断和处理具有企业家的风格。

许:他在“七君子事件”中的表现以及1948年底的抉择,正是这种明快风格的体现。

章:的确如此。1936年11月,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逮捕,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在这个事件中,他的确面临着重大的选择。第一次被捕后保

释,法院第二次发了传票,就面临投案不投案的问题。当时宋庆龄阻止他:你去了会有生命危险,后来看也的确如此。他可以不投案,第一是因为人在租界,第二是有很多条件包括宋庆龄的帮助而选择流亡或躲避。但他二话不说,穿上衣服就去投案了。

而1947年民主同盟遭解散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民主人士的迫害,父亲被迫流亡香港。在香港时期,各民主党派共同发表的宣言,绝大部分是他执笔起草的,再度成为“宣言专家”。与此同时,他把投资和经营的重点放在了香港。他认为香港的发展环境和发展空间都很好,就创设了港九地产公司,在香港最贵的地段,即总督府附近做房地产,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已经做到他自己所讲的“资本主义经营达到最高峰”。如果他继续做下去,那可能是另外一番情形了。可是由于图利生涯同他的理想矛盾,所以,在1948年底,他接到中共中央的电召,面临着人生的重大选择。是选择理想?还是两头都占着?他处理起来很简单,就是结束在香港的业务,没有任何犹豫。惟一做的就是先辞职,以保护股东、员工的利益。北上后就再也没有关心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房地产由王宽诚接手了。

许:看来,您父亲硬是在困难重重中把主要精力放在实现政治理想上,终身不渝。但这是一条变数很大、布满荆棘的求索之路,有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凶险。他为什么要这样?

章:经济和政治是不可分的。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更关心的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除了早年的儒家教育以及“五四”科学民主的影响之外,他的社会责任感的第三个来源,就是发展中国经济、进入现代化社会的这种理想。任何搞经济的人都不希望社会分裂、打内战,希望有一个廉洁的政府,这是他最为关注的。

许:但他作为中间力量的代表不断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所遇到的困惑、矛盾却是很突出的。

章:是的。抗战期间,他提出“少号召,多建议”,认为在国策已经确定的今日,我们应该少作政治的号召,多作积极的建议,使国策可以早点充实起来。主张不分党派,一致团结抗战,其用意本是希望国共两党团结抗战,以大局为重,减少摩擦,避免统一战线内部的内耗,但国共两党

都不认同这一点。党派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何者为先?从各党的角度讲肯定有各自的看法。

国民党的很多要员与他有关系,当时国民党不是不想用他,他在安徽搞战时财政搞得很好,树了一个好的范例。蒋介石在武汉召见他,提出让他留在“中央”管理经济,但被他当场谢绝了。蒋又动员陈诚、孔祥熙、陈立夫等大员轮番挽留,都未奏效。国民党政权到后期,财政非常困难,金融快要垮了,陈诚建议蒋介石重用他,让他当财政部长,以整顿不景气的经济。老蒋说:我是想用章乃器,但章乃器不为我所用。老蒋在这点上看得是很清楚的。

许:是不是他觉得在国民党政权做事,与他的个性、与他保持独立的人格有冲突。他是不是意识到在那里干的结局不会好?

章:国民党用了许多大知识分子,像翁文灏、胡适、傅斯年、王云五等人,在国民党那种排斥知识精英和自上而下不透明的政治体制里,个人才华的发挥是很成问题的。王云五如果做一名学者,应该是很成功的,但他不幸干了一任经济部长,发行金圆券,把名声给搞坏了。这实际上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制度不好会毁人啊!

许:在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20世纪上半叶,许多热心于政治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都提出过主张,具体到您父亲,他的思路是什么?

章:他在40年代写了一篇文章,说当前中国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就是要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他跟共产党能走到一起来,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三者是中国发展的大患,共产党要除掉这些,他当然要支持。

你知道,父亲是民建的创建者之一。创建这个团体实际上就是为实现他的梦想,这与抗战期间各党派的民主宪政运动及工商界人士发展民族工业的要求有关。父亲为民建起草了政治纲领、组织章程和各种文件,希望通过平民的努力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而且是“不右倾,不左袒”。一是提出“经济民主”的主张,要求以民主方式制定国家的经济计划。二是在推进政治民主上也提出了主张,如提出军队国家化、保障人权和言

论自由、反对新闻检查制度等等。

为人谋忠

许：1948年底，在面临除旧布新的伟大时刻，他作出北上的选择，他后来跟您谈过这时的心情吗？

章：他对我谈得不多。不过，从他当时留下的文字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他放弃了在香港大有可为的事业和优裕的生活，于1949年初到达东北解放区。在沈阳的欢迎大会上应邀讲话时，他表示：“我过去多年为资本家打算盘，今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打算盘。”这说明他是来为新中国贡献力量的。父亲作为民主建国会的代表出席了新政协会议，身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在会上第一个公开提出将来有一天要消灭自己的阶级，认为资产阶级一边要积极生产、积累财富，同时要随时准备消灭自己的阶级，他确实有这样的一种“大同”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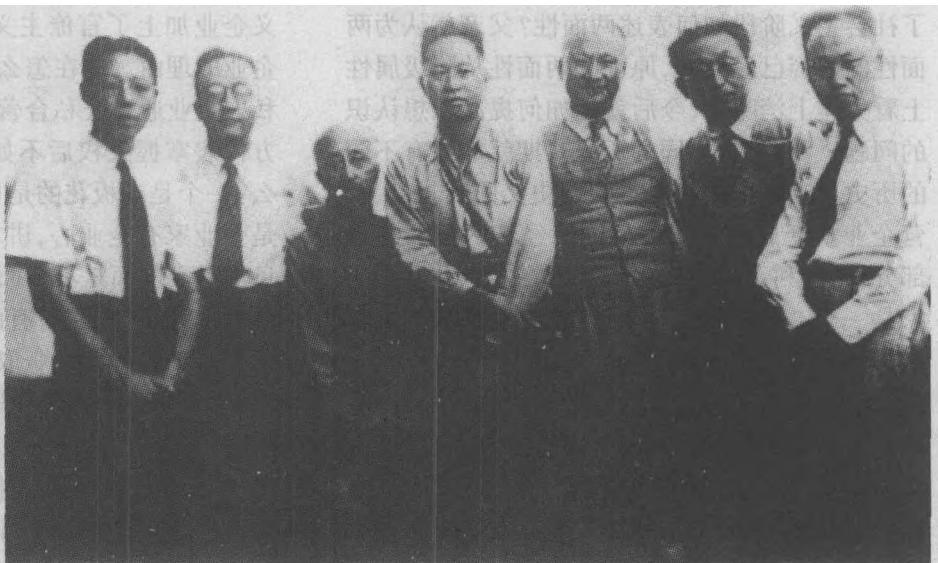
许：有人看了他的《七十自述》后说：“章乃器愚忠。”您是怎么看的？

章：我父亲讲，他一辈子都是为人谋忠的。他早年就有一个观点，就是一个国家要有中心政治势力，我们要对它多下方剂来促进，有人据此认为他是改良主义者。从这两点来讲，他是认同主流社会或者是政治上的主流势力，愿意跟他们合作，一起为国家服务。这个中间有个选择，就是你这个主导政治力量是不是进步的，是不是能为老百姓做事的，是不是对国家的发展、老百姓的利益有作用？是，我就跟你合作，国民党也不是完全不合作。他原来是主张中间路线的，对跟共产党合作，未必是每件事都赞同共产党的，例如在救国会对于《日苏中立条约》的表态问题上就是如此。但既然回来，就一定要精诚合作，交给的事情一定要做

得最好。1952年8月出任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后，他保持理论家和实践家的本色，尊重科学，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协助陈云制定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政策。他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最多长达16小时，往往星期天也不休息。那真是殚精竭虑啊！毛主席、周总理都表扬过他的工作。这是他为人谋忠的一面。

许：“反右”运动已经过去47年，今天的人们对它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评价，我在大致接触有关的史料后，发现其中许多言论被历史证明是真知灼见，具有超前性。我想，即以您父亲来说，大致应该如此。他获罪的主要观点都有哪些？今天如何认识这些观点？

章：他在“反右”中被批判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观点，今天回顾起来是看得比较远的。他自己的理想也是希望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他后来发表许多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时期地位的论述，想给决策者这样一种提示，就是靠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办法改造不了思想。他觉得搞社会主义，不要打击民族资产阶级这部分人的积极性，他们不会造反的，会跟共产党走的。这部分人的学识和管理能力有用，要鼓励他们发挥积极性。我父亲与其他“右派”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他从1950年开始就受批判，一直到1957年。他在“反右”中被批判的主要观点不是发生在“反



1939年10月，救国会领导人在重庆与叶挺合影。左起：沙千里、邹韬奋、沈钧儒、叶挺、章乃器、张申府、王炳南

右”期间,是5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的很多批判的延续,这是“右派”中比较特殊的情况。

父亲曾说民建应该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这话的来历是这样的:1955年英国工党代表团来访,民建负责接待,父亲是主要的接待人。当时民建就是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给英国人看的,父亲介绍民族资产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怎么参政的。毛主席在会见工党代表团时讲,我们的民族资产阶级比你们英国的工人还要进步。当时是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关系比较好的时期。父亲提出这个概念的本意是积极的,并不是要抬高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而是说资产阶级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我想他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才提出这个概念的。但人家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认为公私合营完成后,资产阶级在向我们索要更多的权利,认为他在美化资产阶级。毛泽东先是同意后来又不同意父亲的观点。

许:这个问题在现在看来,已经基本解决了。

章:是的。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民主革命时期的提法是既有革命的一面,也有软弱、妥协的一面;建国初期的提法是既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但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有争论,毛主席也提出如何界定两面性的问题。在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以后怎么界定?原来的两面性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形势下产生的。“八大”提出阶级斗争结束了的论断,到了社会主义阶段如何表述两面性?父亲就认为两面性的内容已经改变,原来的两面性从阶级属性上看大体上消除了,今后就是如何提高思想认识的问题。我认为,不同的历史时期就应该有不同的历史界定。改革开放以后,历史又回到起点:私营企业重新成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现在承认私营企业家是一个“新的阶层”,并修订宪法保障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实际上是向1954年宪法的表述回归。回过头来看历史,当时吵得面红耳赤、沸沸扬扬的很多话题,现在来看都是极平常的事情。应该承认任何事物都有积极面和消极面,私营企业家也不例外。但是靠制造阶级斗争那一套,肯定是不利于国计民生的。

父亲还撰写了关于“墙”与“沟”的文章,他

反对斯大林关于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说法,认为这容易造成群众对党员的误解和党员对自身的误解:群众认为党员特殊,党员也会自认为特殊,其实大家都是人,共产党员所以特殊可能是历史责任更重大一些、品质应该更高尚一些,其他没有可特殊的。他当时说:党员有1200万人,如果1%的党员犯错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损失将是多么大!这又是经济学家的思维。现在也仍然存在这种问题。

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他提出革命领袖在革命阶段说的话并不能简单地套用在建设时期,不然就是教条主义了。比如说毛主席讲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但现在做工作就是要像绣花一样地认真细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对敌斗争的手段,取得政权后,改造这些人,还得要有人道主义。到他检讨的时候,还说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上,本人也犯了一个错误:政协大会曾通过一项决议成立毛泽东大学,后来因毛主席本人不同意而未实行,但自己当时也是举了手的。我很纳闷,哪个“右派”做检查,还说这种事?他居然就说了,这样说实际上还是在提示,他对个人崇拜很有看法。

父亲还认为:“假如不幸而让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当中起主导作用,那不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幸,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损失。”从后来的历史看,他这句话应验了。他还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这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现在怎么看这个问题,当年的许多私人企业通过公私合营收归国有,继续经营,公方代表掌握大权后不如私营老板管得好,为什么?一个是老板花的是自己的钱,他要在意;其次是企业家有企业心,讲求效率。此外他说过“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其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时有两派意见,一派说是剥削,认为是赚取利润到赚取定息的延续;一派说不是剥削,认为已交出生产资料,拿的是固定的收入,同银行的存款差不多。定息类似于今天的投资基金,今天已没有人认为投资基金是剥削。我父亲认为上述两个说法都不算全面,他提出: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些观点当时被扣上美化资本主义、美化剥削、攻击党的领导等

等罪名。

许：您父亲刚直自信，个性极强，不大容易为原则问题迁就，也不善于转圜，这在为人处事上自然是高洁的、令人敬佩的。但在政治生活上却难免受到种种掣肘，遭到有意无意的误解和陷害，这种情况在反右期间表现得似乎更明显一些。

章：是这样的，这也是他始终不肯像别人那样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的真实原因。面对火药味越来越浓的批判和越来越吓人的帽子，面对无中生有的捏造和断章取义的曲解，他却与人舌战，逐条反驳对他的批判，并每天准时到粮食部照常工作。如此强项不屈，批判会没法再开，于是转而责令他写书面检查。1958年1月，他写出了一份3万多字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回顾了自己在整风中的全部言行，以及建国以来在民主党派工作方面的全部经历，在文章最后写道：“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别人，也不能泯灭良心来对待自己。”1月28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召见他，通知他准备撤销他粮食部长的职务。他说，撤职倒没有什么，但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宁死不能承认的。直到被撤职，他始终拒绝在他的“右派”结论上签字。主持定案工作的李维汉也承认他“心口如一”，高压无用，只好硬着头皮拍板：我们不是法院，章乃器不签字，照样可以定右派。父亲后来为此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直节虚怀”

许：有人认为您父亲在历史上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有人誉之为“中国骨头最硬的知识分子”。他一生经商、治学、从政，始终未脱书生本色。

章：我曾经说过：“父亲在1957年当上‘右派头子’殆非偶然，他的命运早就由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一生都与此挂得上。他要不这么为人处事，肯定会一帆风顺，活得很滋润，“文革”中间都不会受冲击。以他的特殊身份和地位，肯定会在周恩来的保护名单之内。但他要坚持独立思考的个性，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许：当理想与现实发生碰撞的时候，他是如何面对和调整的？

章：他的民主宪政理想与共产党1949年后实施的人民民主专政肯定是有距离的。从《共同纲领》这个角度看又是有共识的，1954年又进一步变成一部宪法。父亲非常重视宪法，认为既然大家有了共识，就要遵守，就是要按宪法办事，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调整。他的所有言论，实际上都是在宪法这个范围之内，认为任何个人、政党的活动都应该是遵守宪法的，所以他提的观点都没有超越宪法的范围，是在宪法的范围内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他讲的很多意见，现在来看，无非是改良主义的，指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希望能够得到纠正。有人找他谈话，他说：你现在让我检查，我只能进行反批评。坚持独立思考，这是他做人的长处和特点，也是其悲剧所在。最后处理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观点而是因为态度。

许：1957年后的章先生孤处于政治权力之外，只保留了政协委员的身份，遭受冷落之后闲下来了，这对一位政治抱负远大、事功心理强烈、大半辈子忙碌的政治家来讲，当然是很痛苦的。他是不是很难适应？

章：对于一个刚过花甲、精力充沛的实干家来说，失去工作的权利是一种莫大的痛苦，但他仍以达观的态度面对人生，将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还希望5—10年之后为国家工作10年。在公众场合，他仍是精神抖擞，谈笑风生，丝毫没有其他“右派”那种抑郁消沉之态。

同时，父亲依然在有限的场合参政议政，在政协的会议上搬出许多数字来质疑“大跃进”。他是经济学家，讲话是有根据的，是经得住推敲的，这也是会让人不高兴的事。

许：这个特点在七千人大会后又以批评“三年自然灾害”的方式表现过。

章：的确是这种情况。“七千人大会”之前父亲就开始了对“大跃进”的批评，后来他又在座谈会上多次批评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大跃进”头脑发热、经济发展失调、国家经济陷入严重困难、人民生活空前困苦等等问题。他还就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向三届政协第三次会议提出申诉，当朋友劝止他时，他表示：“唯事实为最雄辩”，事实越到后来越清楚。为此，1963年1月，

民建中央通过了《关于开除章乃器会籍的决定》。3月,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了撤销章乃器政协委员职务的决定。纯粹因言论而被除名,在当时政协的历史上是空前的。父亲认为这不是他个人的不幸,而是1949年以来的政治协商制度的不幸。

许:他永远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但这样的处分好像对您父亲的个人思想触动不大。

章:他这人承受力还是比较强的。理想主义者有一个好处,就是不想眼前这些乱事,父亲在逆境中仍保持自己的信念。“反右”时他说自己是“心安理得,轻松愉快”。日常生活中,他对时政也有批评,我那时提醒他小心说话,他很反感。说自己的话可以到大街上去讲。他还做了一副对联:“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坚信历史会作出最公正的结论,现在,你们爱怎么批判就怎么批判吧。

许:您这样说,使我想到“无知者无畏”这个流行的词,其实,真正有大知的人是更加无畏的。

章:我还想说的是:父亲是“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5月去世的,他为什么能活下来?1966年8月,年届七旬的父亲受到残酷迫害,被抄家、批斗。当时红卫兵在吉祥戏院有一个“打人集会”,押送来的“牛鬼蛇神”往往有去无回,当场毙命。他在那里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他仍靠气功的功力硬顶着。后来有一个民警到戏院向红卫兵要人,说是这个人打死了不好向中央交待,才捡回了一条性命。当他被送到医院求治时,竟遭拒绝。他挣扎着坐起来,在长椅上给周恩来写了几个字:总理,我被打,已经受伤,医院不给治疗,请你指示。信送出后不久,他被推进了急救室。事后得知,周恩来指示医院:无论何人,一律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给予治疗。

父亲当时为什么没有死?他跟我讲,他求生的念头非常强烈,说我现在不能死,我死了很多事情就说不清了,我必须要说清楚了才能死。他虽然有很多失败,但要有始有终,对历史要有交待!他能活下来,当然与他个人的意志有关。除此之外,就是他练气功,靠气功来调理和治疗被打伤的身体,多年坚持锻炼使他比别人强壮。他与其他知识分子在性格上也有所不同,作为一个山民的后代,他从小生长在山区,有草根性的一面,

与贵族化的、一直过着优裕生活的知识分子不一样,好日子能过,苦日子也能过,生存能力很强。

许:您父亲为什么在“文革”初期那样一种环境下花很大精力冒险撰写回忆录?对他来说,写这样的回忆是很痛苦的。

章:他撰写回忆录是有一种机缘的,就是人家找他要求外调材料,这样就有了一个合法写作的由头。那时社会上到处“抓叛徒”,外调人员满天飞,兴师动众地调查个人历史。父亲党内外朋友很多,各种外调应接不暇,他便乘机写起了回忆录。由于外调内容属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他就分为几个历史主题写,复写多份。此时国家动乱,自己年已迟暮,到了不能不写回忆录的时候了。他说:“泼在我身上的脏水太多,自己不写谁写?”我是他回忆录的第一读者,定稿之后总有一份交我保存,其余则分送至亲好友,意在传世。父亲写回忆录坚持两条原则:忠于历史和保护好人。

许:由此说来,他是把这件事当成晚年的头等大事来做的。

章:他要对历史有个交待。

许:我看到您的客厅里挂了“直节虚怀”这四个字,是您父亲在什么情况下写的?

章:“七君子事件”时,有位画家是李公朴的亲戚,画了一幅竹子,到狱中请七君子题字,父亲便书写了这四个字。后来我从那幅画的照片上单独截取下来,“直节虚怀”是指竹节是直的,竹腹是虚空的,就是指要保持做人的正直的气节和虚怀若谷的心态。我现在是拿它当座右铭,不说假话,不说违心的话。

许:最后一个问题,面对父亲不断追求梦想却坎坷多难的人生,您有什么话想说?

章:我说的还是一句老话,一个健康的社会是允许人讲真话的社会。从父亲那一代人的经历来看,社会所发生的所有问题都是从说假话开始的,归结到一点,民主呢,就是人民要把自己的意愿表达出来,变成执政者的行动,变成国家意志或国家行为,而不是反过来,把执政者的某一种意志施予众人,大家都要按这个模式来说话,搞毛主席批评过的“舆论一律”。这样,父亲那一代人所经历的坎坷才能成为历史的坐标。

许: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责任编辑 萧 徐)

张闻天在五四时期的先见

○ 张培森

启蒙思想发端之地——南京“河海”

江苏南京有一所全国闻名的培养水利人才的高等学校——河海大学，如今优美的校园里矗立着一尊高大的伟人塑像，他就是全校师生员工所景仰的 80 多年前的老校友——张闻天。“河海”历史悠久，创办于 1915 年，当时名叫“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是近代实业家、时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张謇，倡导创建起来的我国第一所全国性的培养现代水利专门人才的高等学府。张闻天 1917 年考入该校，属“正科第三届”学生。这个普通农家弟子为何能进入这样一所高等水利学校？说来还有一点偶然因素。少年张闻天高小毕业后本可以接着读普通中学，由中学再升大学，可是家庭的经济实力毕竟不如那些有钱人家，于是便选择了一个免收学费、宿费的职业学校，这就是当时设在浦东宝山县吴淞炮台的“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后来由于身体不适应海上作业，读了将近两年后就无法再坚持下去。正在此时从报上看到“河海”招生的消息，于是便征得父母的支持，以相等学历考入了这所家庭经济还承担得起的公立学校。如果不是这次转学，进不了高等学府，这个农家学子的前程也就很可能是另外一番情景了。

“河海”虽说是公立学校，但是张謇在创办这所学校时由于北洋政府国库空虚，创办经费相当拮据，学校一直没有自己的校舍，张闻天入学前学校就已经搬了两次家，不得已情况下租赁了南京大仓园（今长江路上）一个姓蒯的两所民宅，一所作校舍，一所作宿舍。学校尽管校舍困难，然而在师资方面却是延请了国内名宿为教授，同时集中很大一部分开办费购置图书和仪器，仅图书一项即从美国采购新书 2000 余册。创办之初教学没有中文教材，校长许肇南提出完全用外文教

材以济急需，得到各位教师的赞同。先后采用英文教材达 40 余种，“一时使国内工科高等学校采用外文教材成为风气”。显然张闻天高水准外语的培养也是跟当年“河海”这种教学条件有关。对学生影响更为深远是这所学校的校风，学校以养成学生“高尚之人格”、“勤俭耐劳之习惯”、“切实应用之知识”为办学方针，要求学生人人抱定从事河海工程事业之决心。师生同唱的校歌的歌词这样写道：

钟灵毓秀石头师，人才蒸蔚起。

河疏湖蓄水利兴，工学昌明时。

横流浩劫永断绝，拯救数兆黎。

大哉河海奋前程，毋负帮人期。

对于在海边长大的张闻天，小时候就从老师那里听说过自己家乡过去一位地方官钦琰兴修海堤为民造福的故事，因此当初报考“河海”也确实是抱着让“横流浩劫永断绝”的决心的，然而后来张闻天毕竟没有学完水利专业，两年之后就离开了学校。那么又是什么促使他改变了原来的志愿？这就离不开当时大时代的急剧变动和他本人的思想变化。

从“河海”开办到张闻天就读前后这四五年间，中国社会正酝酿着一个新的时代巨大变动，一方面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使得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西方科学文明得到进一步传播，另一方面“换汤不换药”的民国现状和猖獗一时的尊孔复古思潮，推动着一批新的知识分子进一步思考问题的症结所在。“河海”开办的同一年（1915），作为新文化运动兴起标志的《新青年》创刊。陈独秀创办的这个刊物一问世，就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着统治人们思想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和封建礼教，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而到张闻天入学这一年（1917），《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移至北京，杂志每期发行量从一千多份激增到一万五六千份。张本人在其自述中曾说到过这个杂志对自己的深刻影响：

“‘五四’前《新青年》的出版给了我很大影响，我的自我觉醒也于此开始。”

1919年，也就是张闻天进入“河海”的第三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已经在新文化启蒙中觉醒起来的张闻天便积极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张闻天当年活动的具体表现已无历史记录，只是1980年笔者开始搜集张闻天史料时，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许德珩曾经在接受笔者采访中说到过五四运动中对张的印象。许老是当年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会和全国学联的负责人之一，在与笔者谈话时已经90高龄，头脑却十分清楚。他回忆那时候是在南下到上海组织学生会过程中接触过张闻天的。他说：“张闻天同志和沈泽民同志很要好，五四运动时都是河海工程学校的学生。那时他很年轻，大约是十七八岁，很活跃，所以我的印象很深。”虽然许老已说不出多少张的具体表现，但是在五四运动已经过去60多年，张居然还留在这位当年全国学运领袖脑海里如此深的印象，可见张当时确实是南京五四运动中的活跃分子。

这位五四领袖还说到另一件与五四运动有关的重要史实，即张闻天和毛泽东同为五四时期著名社团“少年中国学会”的早期会员。他说：“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有毛泽东、李大钊、邓中夏，我也参加了，还有黄日葵等一些人。上海有张闻天、沈泽民、商务印书馆的杨贤江等人。张和沈是会员中年龄最小的。”据历史查考，毛泽东入会是他1919年12月第二次到北京之后，由学会发起人李大钊、王光祈介绍于1920年正式入会；而张闻天则是1919年12月由南京分会会员左舜生、黄仲苏二人介绍正式入会。在1920年2月《少年中国》刊载

的一条会员入会消息中有这样的记载：“新加会员本会于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共加入会员三人”。三人顺序依次作了如下排列：张闻天（江苏）、芮学曾（山西）、毛泽东（湖南）。从这条历史记载来看，张入会时间还略早于毛。那时他们二人没有可能见面，但是两人的名字却第一次并列到了一起。

横空出世的三篇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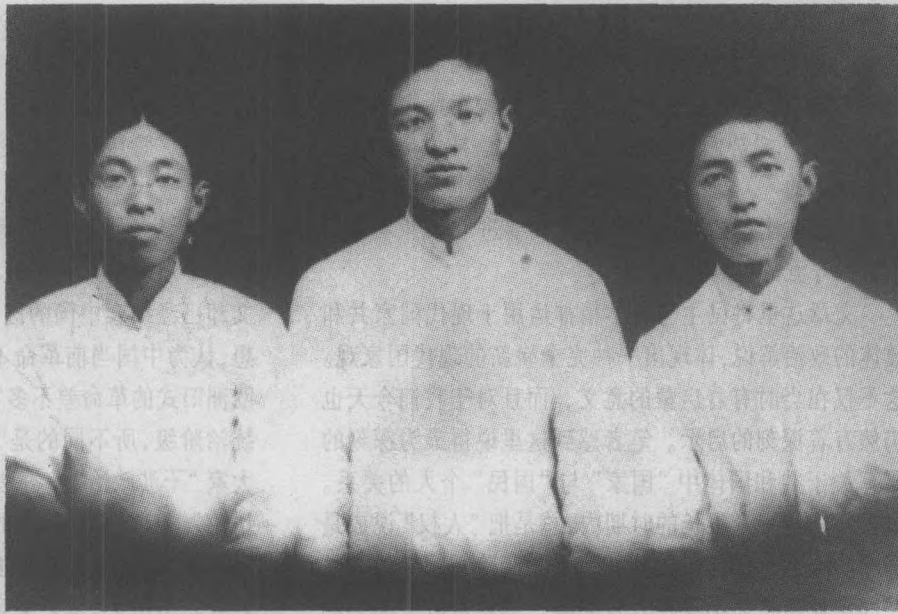
实际上张闻天突出表现于五四运动的并不是他的组织才能，而是其思想站到了反映时代要求的前沿。张闻天文集组最初获得这一认识来源于1981年发现的一份旧报。张本人在1941年写的自传中说到他五四运动时曾在一份名叫《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开始发表文章，根据这一线索，张闻天文集组的程中原同志当时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这份报纸。这份《日刊》是每期一张四开四版的日报，每周出版6期（星期日休刊），从1919年6月至9月共出了70期。该刊的主编阮真是南京高等师范国文本科二年级的学生，张闻天是编辑科科员，是该刊的重要撰稿人。阮真在该刊最后一期的《编辑科经过报告》中这样写道：“本刊自六月二十三日创刊以来，阅时两月有余，出版共七十号（期）。虽于国家社会无直接裨益，然颇为教育界所注目，而我会员得思想之接触，学说之观摩，其必有益于此者，可断言也。真（阮真）于发表来稿，重思想不重文字，尤以改良社会及改良教育为救国初步之方针，此本刊之微意也。考各门所发表之文字，‘论著’‘评坛’不无佳作。……”

而令人欣喜的正是从这份报纸中发现了张闻天最早发表的三篇佳作。先说第一篇题为《“五七”后的经过及将来》。“五七”是指五四爱国运动中全国纪念1915年袁世凯出卖主权的五七国耻日而举行的群众示威行动。文章发表的时间是1919年7月



1919年8月19日至21日，张闻天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社会问题》一文，文末节录《共产党宣言》第2章10条细款

11日,顾名思义是一篇回顾和总结前一阶段五四群众运动高潮,探索下一步行动的评论文章。文章不长,但是首先一个奇特之处是在开头几乎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列数这场运动群众作了如何的“牺牲”,而所得结果却又是如何的“微乎其微”,之后,一连得出六个“无用”：“不声不响无用；空文鼓吹无用；电报战争无用；切实劝告无用；奔走呼号无用；奔都请愿无用。”乍一看,文章这里岂不是整个否定这场群众运动吗？但须知作者这里并不是站在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上来全面总结



1920年7月张闻天(中)赴日留学前在上海与茅盾(左)、沈泽民合影

这场运动,而是立足于现实,通过总结斗争实践来启示人们深入思考“将来”的问题。那么究竟“将来”又用什么方法才是真正“有用”呢?回答这个问题,文章用“釜底抽薪”这个成语形象比喻地提出了一个新的大主张,这就是一句话:将“武力政治、强横的中央集权、卖国贼、安福系、腐败的政党”,来个“一切废除”;“然后建设这健全的民主共和国”。文章郑重指出这是一个“大事业”,而要做成这个大事业,认为必须做到三点:“(一)抱定正鹄;(二)勇往直前;(三)不屈不挠。”

“武力政治”、“强横的中央集权”实际就是指的北洋军阀政府。不过这两点也可以说是对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权特征的很好概括。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对于当时封建军阀统治,从主张改良到根本解决是早期共产主义者从斗争中得出的政治共识,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这一共识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而张闻天写此文章时,五四群众斗争高潮刚过,他就在文章中如此明确地提出这种主张,说明他当时思想是相当前沿的。这里不妨拿同一时期毛泽东撰写的著名《〈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来看一看,当时毛泽东就恰好还是主张“向强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直至1920年11月他方断然表示:“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

再来看张闻天的第二篇文章题为《中华民国平民注意》。该文发表于前一文十天之后(7月22日)。如果说前一文提出了政治目标“健全的民主共和国”,那

么这第二篇就是从理念上告诉人们这共和国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特别是作为共和国国民应该有什么样的观念。作者这里是以一个启蒙者的身份向广大“平民”来解述一个共和国国民应有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共和国国家与国民的关系。何谓启蒙?启蒙就是要使人在精神上从对封建统治的依附性和奴性中获得解放。文章正是拿“共和政治”同封建专制制度作鲜明对照的方式来解说共和国法制的基本原则。例如平等的原则,文章指出:“从前专制国常有种族、门阀、信仰、武力,若财产等阶级,因势力而享特权。”而“共和政治的法律,必须以万民平等为原则。”每个国民“无论他资格上地位上什样,公法上、私法上的权利义务都是一样,就是凡为国民人格同一”。再如自由的原则:“专制时代君主万能,他要使人民驯服,就是人民没有自由。”而“共和时代,国家以人民组织,所以发达人民即所以发达国家,所以个人的自由非常重要,所以人权是神圣,不但不容私人的侵犯,即国家除了不得已限制外,不能滥用权力而侵害的。”

对于长期受封建思想奴役的中国人,从根本上说究竟用什么样的钥匙来开启民智?文章用的正是从新文化运动吸收过来的两大法宝——民主与科学。文章说:“吾们从前在专制势力下的时候,不晓得君主、民主到底是什么东西,只晓得君主武力是万能,因为目光所到的只在这一国。到了现在,交通便利,接触面广,晓得君主武力不足恃,晓得有世界的潮流。”因此文章回答“共和国国民应该怎样?”时提出的第一条要求就是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吾们何论做哪一厢事情,终要自己主张,不要服从他人。”文章同时强调的另一条就是“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凡事“吾们一定要用一个法子证明它”,“吾们不能说‘因为古人这样说’这法子就是科学的。”文章还告诉人们要相信中国未来会“比今日要好几十倍的”,“不能保守,要进取”,“不要怕干冒保守派的讥骂”。

文章这里将民主与科学精神运用于现代国家共和政体的政治解说,体现出一种完全崭新的现代国家观。这不仅在当时有着启蒙的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今天也仍然有着深刻的启示。笔者感到这里说得最为深刻的要算关于共和国体中“国家”与“国民”个人的关系。过去我们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总是把“人权”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批判,似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就压根儿不存在人权问题,当然也就更不会想到人民的政权还会存在国家本身做出侵害人权的事情,可是现实告诉人们的是,建国以来这种滥用国家权力做出伤害人权的事情难道还算少吗?过去我们一直是强调个人服从国家,只有国家发展了个人才有前途,可是究竟又怎样才能从根本上强国,张闻天这里说出了一条更为值得我们深思的真理:“发达人民即所以发达国家”,并进一步发挥说:“于法律范围内,人人自由,各有活泼进取的精神,各具独立自治的能力。分子发达,国家亦发达了。”

最后让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篇论文,这就是同年8月19日至21日连载于《日刊》的《社会问题》一文。这篇文章是上个世纪80年代被发现时最为引起广泛注目的一篇。人们当时感到新鲜的是五四运动高潮刚刚过去,包括一些先进分子在内,都还根本不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的时候,年仅19岁的张闻天竟然已在这篇文章中公开尝试用“马克思(Marx, Karl)唯物的历史观”考察社会问题。而且在《共产党宣言》国内还没有中文译本的情况下,文章最后向读者完整地列出了《宣言》的十条纲领。著名五四运动研究专家、人民大学资深教授彭明读了这篇文章后连声称赞说,在五四青年中能那样早地写出这样文章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于是198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中央编译局等单位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展览,就将张闻天的这篇文章作为一篇新发现的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珍贵文献向观众展出。

其实这篇历史文献的珍贵价值并不只是在文字上的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点,而更值得人们注意的

是作者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以及中国革命问题所作的接近科学、接近实际的解说。首先是他在文章中用了相当一段篇幅解说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今日看来尽管这种解说是如何地幼稚和不准确,然而它毕竟是破天荒地用马克思物质生产为社会发展基础的论点解说人类历史;再者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中国先进分子还只是开始一般地议论社会主义,而张闻天此文却已经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中国革命两步走的设想,认为中国当前革命不是同俄国一样,而是“大约同欧洲旧式的革命差不多”的,首要任务是铲除封建官僚统治阶级,所不同的是“起革命的是工农”,最终达到大家“干涉政治”。办法即是“实行普遍选举”,“公开讨论”。“等到这一次的革命和振兴教育等成功了,后来再讲第二步。”文章也正是在介绍第二步社会主义的内容时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大纲领。熟悉中共党史的人们知道,将党的奋斗纲领明确分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步的是1922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而张的文章这时就已提出了同中共二大基本相一致的萌芽思想,应该说这种认识也是相当超前的。

除了以上三篇文章以外,张闻天发表在《日刊》上的还有许多言简意赅的“杂评”和“随感录”,不过集中突出体现他当时思想的却是这三篇论文。总结过去,窥测未来;弘扬人权,开发民智;唯物史观,绘制蓝图,一个未来富有崭新思想的现代政治家、思想家的年轻才华已经是略见端倪。而他之所以能够当时展现出这些先进思想,自然是他所成长的那个巨变的时代有关,然而也同时确实表现出了这位年轻学子对新时期特有的感悟力。统观这三篇佳作可以说他当时实际上已经开始抓住了对其后来一生都有深刻影响的三件带有根本性的东西,一是建设健全共和的政治理想;二是新文化精髓的民主科学;三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的唯物史观。这时候的张闻天当然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是一个以启蒙为己任的民主主义者,但也应该看到,他这时人生思想的起跑线上也确实不只是有了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已经开始注入了时代最新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他在文章里呼吁人们在寻找改变现状途径中“牺牲也不要怕”,这自然也就首先包含了他个人献身这番“大事业”的决心。因此,已经有了如此宏伟思想情怀和决心的他,随后不久改变原来兴修水利的志愿,脱离“河海”另作他谋也就不足为怪了。

(责任编辑 萧 徐)

“学大寨运动”的回光返照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报道琐记

● 淮北子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报道，不论是前段的清理，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还是后阶段的农村体制改革，都绕不开所谓“大寨经验”和“学大寨运动”的纠缠。

1977年冬天，“学大寨”运动达到高潮。接着便开始走下坡路。1978年春天农村形势出现了积极变化。在安徽、四川等地的带动下，全国农村形成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破坏农村、农业罪行的热潮。同时，落实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

热潮，持续高涨。

以上这两股热潮的发展，在全国各地都与“大寨经验”、“学大寨”和“建设大寨县”运动的要求顶上了“牛”。

揭批和落实政策的过程中，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大寨有许多“经验”违背了“六十条”的规定，媒体的宣传（新华社、人民日报起到带头、主导作用）自然就发生了很大变化。

对于媒体宣传的这些变化，有些读者可能还没有发觉，有些人却早已感到问题的严重，并为此忧心忡忡，愤怒已极。陈永贵同志便是其中最敏感、最愤怒的一位。他觉着你反大寨，你在影射大寨，是在批“大寨经验”。陈永贵同志对北京有关媒体的宣传极为不满，忍无可忍，趁1978年春节跑回山，西组织文章对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的宣传报道进行“反击”。

这是一场新中国新闻史上罕见的利用地方党报有组织有计划地向中央党报发起“反击”的事件。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

“学大寨运动”与落实党的政策“顶了牛”，这场严重的斗争不是偶然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的党中央，奉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在农业战线上，要继续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某些领导人认为，只要按毛泽东的教导把“农业学大寨”、“建设大寨县”的运动搞好，农业生产便会搞好，农村的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所以在粉碎“四人



1964年，担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

帮”之后仅三个月,1976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第一个全国性大型会议,这就是“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陈永贵作主题讲话,他把“四人帮”对农村和农业的破坏,归纳为“三反一砍”。他说:“‘四人帮’干扰破坏学大寨,破坏普及大寨县运动,罪行累累,铁证如山,他们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反对大干社会主义,妄图砍掉大寨红旗。这个‘三反一砍’的要害,就是篡党夺权,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根据这样的估计,他提出今后农村工作的总体任务就是:“坚持大批修正主义,坚持大批资本主义,坚持大干社会主义,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搞得更好。”

这个“三反一砍”没有抓住“四人帮”的要害,只能起到维护、抬高“学大寨”运动地位的作用。

一切真正深入实际,了解农村真实情况的有识之士,无不痛切地认识到,不能再继续“学大寨”了。当前农村最紧迫的问题是:让多年来一直在饥饿线上挣扎的种田人吃饱肚子。从这一点出发,引出了以安徽、四川两省带头,全国各地农村陆续紧紧跟上,清理、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的热潮,用实际行动批判、纠正“左”的错误,开启了通向农村改革的大门。

万里是1977年6月在危难之中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到了安徽之后,他跑遍了江淮大地,20年极“左”,“文革”十年浩劫给这个资源丰富的大省,尤其是给这里的农村带来的严重破坏,使他触目惊心。正是农民的悲惨景状使他下定了决心,“一定要从安徽的实际出发,切切实实解决面临的许多严重问题”。万里提出的解决“许多严重问题”的办法,首要一条便是停止“学大寨”那一套“左”的做法,尽快落实党在农村的政策。

与安徽的做法相类似的还有四川等省。

而当时的党中央主管农业的陈永贵等正在紧锣密鼓,准备采取另一种行动。1977年11月8日,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要在全国农村全面推进“学大寨”运动,“建设大寨县”,提出具体指标,规定时限,大搞农村生产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的

“过渡”。

“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的精神受到各地不同程度的抵制,会议所鼓吹的“穷过渡”等没有形成热潮,相反,产生了会议主持者原来想象不到的效果。更多的人清楚地看到,“农业学大寨”运动正在极力对抗党的农村政策,现实地、严重地威胁着农村形势,不能不引起高度警惕!

有了这种认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新闻单位的农村报道也自然地发生变化,揭批“四人帮”的报道深入了,对落实党的政策的报道大大加强了。而对“大寨经验”和“学大寨”运动的报道急剧降温。对此,陈永贵等怒不可遏!

陈永贵回山西发动火力猛烈的“反击”

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的记者从农业部领导那里,从种种途径多次听到陈永贵和部里某些负责人对宣传报道的不满,他们认为宣传消极的东西太多了!他所说的“消极的东西”,可能指的是报道揭露农村存在的问题太多,或者是宣传落实政策,更可能是宣传中对“大寨经验”的某种不敬或否定。

1978年2月间,陈永贵终于忍无可忍,愤怒地要组织对“错误舆论”的“反击”了。在北京他有支持者、同情者、追随者,但却没有可靠的供他驱使的“反击”兵将媒体。趁过春节时机,他回到大寨,在山西组织反击的力量。

宋沙荫是陈永贵组织这场“反击”的直接参与者。1980年10月,在对大寨、昔阳的那次大调查中,我在太原与病中的宋沙荫有过两次长谈,使我了解了昔阳、大寨和陈永贵的许多事情。宋是陈永贵“文革”后期身边最重要的秀才,原是新华社一位老记者,60年代报道大寨“自力更生”精神是有功的。70年代在昔阳县委工作了几年,对我们这些较他年轻的记者在昔阳的工作有不少帮助和照顾。在那次谈话里,他说,1978年春节时,老陈带着一肚子气回到大寨,过罢春节,就让我召集驻昔阳、大寨的各新闻单位人员开会,传达了他的指示,要各新闻单

位针对当前新闻宣传上的消极和错误的舆论,写文章进行“反击”!

另外,据当时“驻大寨联合报道组”一位同志透露,当时已确定了十几个反击的文章选题。

据那位朋友当时提供的材料,陈永贵提出来要给予批判、反击的舆论上的“错误”、“消极表现”如下:

1、有些人把现在的农村形势看成1962年的形势,这个看法对吗?

2、现在农村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两条道路的矛盾,还是落实不落实经济政策是主要矛盾?

3、不要把先进单位搞得灰溜溜的。有的同志搞宣传脱离基本路线,脱离总路线,这对吗?

4、定额管理你们说得那么好,不搞定额你们就给戴大帽子,有六顶之多。

5、你们批“穷过渡”是批谁呢?是批张春桥吗?

6、家庭副业问题。解决农业问题靠集体,是靠发展集体经济,还是靠老太太养鸡?你们言不及义,好施小惠。

7、自由市场。应该强调供销社和国营商店嘛!你们把自由市场宣传得那么好,对吗?大寨、昔阳没有自由市场,不也实现交换了吗?

8、把生产队自主权说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9、你们搞宣传的,给文化大革命说上几句好话嘛!

10、靠什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你们是靠资本主义调动。

11、当先进难啊!

12、你们宣传分配上的“一年早知道”。这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场

是安抚富裕中农的政策。

从以上这12个方面的内容来看,陈永贵对农村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完全坚持“左”的一套,极力维护“左”的一套,对任何一项落实政策,他都不能容忍。

在他的组织下,“反击”真的开始了。

1978年2月26日,《山西日报》带头发难。在这一天的《山西日报》上发表了山西省委召开电话会议部署春耕生产的新闻。这条新闻突出报道了一位省委书记在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对于大寨的根本经验和一整套经营管理上的先进经验,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学习、推广……大寨在经营管理上的一整套经验,是行之有效的,非常成功的,必须坚持在全省范围内普遍推广,不允许借口情况不同而对大寨的经验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更不允许放弃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再犯‘工分挂帅’、‘烦琐哲学’那一种错误。”

这篇报道通过这位省委领导同志之口,对安徽、四川等地落实党的政策,纠正“左”的错误行动进行公开批判。通篇是“不允许”“更不允许”这类的用语,他们以真理化身自居,完全是革命式的语言,不容别人置辩。

1978年3月2日,山西《晋中报》紧紧跟上,“反击”的火力更强烈。这天的《晋中报》刊登了报道晋中地委召开县(市)委书记座谈会的消息。消息通过座谈会的众人之口,强调如下观点:“大寨的根本经验和大寨所实行的一整套经营管理制度是完全符合现阶段农村经济政策的,是同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相适应的。”“大寨、昔阳基本核算单位过渡的经验,以劳动管理为中心的一整套经营管理办法,……都是大寨根本经验和昔阳学大寨成功的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真学大寨,就要坚信不移、坚定不移地推广这些经验,或为推广这些经验积极地创造条件。如果对大寨、昔阳的一个个具体经验发生某种程度的怀疑、动摇,不认真推广,那么,学大寨运动也就只留下了一个空口号,到头来还是假学,甚至滑向反对学大寨的道路。”

在这里,“假学大寨”、“反大寨”的帽子、棍子都飞舞起来了。

“穷过渡”是所谓“大寨经验”和“学大寨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陈永贵还在鼓吹“穷过渡”,甚至在大寨公社搞从大队向公社核算的“过渡”,还扬言要向全县统一核算“过渡”,真可谓对“穷过渡”情有独钟。在这场“反击”中,全国所有地方,凡抵制“穷过渡”,消极对待“穷过渡”的地方和单位,都在“反击”的炮火目标之内。

学大寨运动对农村经济最大的破坏之一是批判、搞乱了劳动管理,从而造成了劳动无责任,“大呼隆”、“大锅饭”盛行,以平均主义代替按劳取酬原则。陈永贵等曾说,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是“大寨经验”的“核心”。安徽等地不是从抓劳动管理入手,先是落实政策,后走向建立生产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陈永贵对此恨之入骨,耿耿于怀。在这次“反击”之中,自然火力最集中的便在这一方面。

《晋中报》发表了《各级书记都要动手抓管理》的社论。社论说:“人民公社实行什么样的经营管理制度,大寨、昔阳已经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行之有效的、有助于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好制度、好办法。所以我们说,加强人民公社的管理,就是认认真真地、实事求是地学习、推广大寨、昔阳的一整套经营管理制度。”社论还说:

“学习推广大寨、昔阳一整套经营管理经验,始终存在着斗争。这个斗争,实质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级书记也必须掌握这个斗争。”

在这篇气势汹汹的社论里,加强劳动管理,建立必要的生产责任制的正确做法,都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他们霸气十足地要求全国各地都要按大寨的办法做,都要学大寨、昔阳的“一整套经营管理制度”。

1978年3月3日,《山西日报》发表的《高举大寨红旗搞好春耕生产》社论,“反击”的调门更高,公然说:“大寨评工分是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的核心,各地要认真推广。”

5月9日,《山西日报》又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专门阐述“大寨劳动管理的经验”。这篇题为《积极推广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的评论员文章说:“应该指出,推广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确实需要一定的条件,但条件是要人创造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具备条件,而是有的人根本不服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有的单位,明推暗不推,或者把大寨经验推歪了,造成了劳动管理上的混乱,反而倒打一耙,把罪责加在大寨劳动管理经验头上,这种颠倒是非的做法是不能允许的。”这篇文章针对各地的搞责任制的情况,强调指出:“大寨搞定额管理,但不是定额计酬”。其矛头直指联产计酬责任制,而这正是农村改革的核心。

而《晋中报》报道晋中地委召开县(市)委书记座谈会定出22条规定,在谈到推广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时,按捺不住,竟然高喊:“坚决反对搞定额计酬”。

1977年6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寨经验》一书(驻大寨联合报道组编写),认为“定额管理、按件记工”有五大问题:第一,影响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平等、互助、同志式的关系,造成了干部社员在劳动过程中的对立情绪;第二、工分悬殊,扩大了差别;第三、干部长期脱离劳动,就会成为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者;第四、滋长了自私自利思想,影响着贫下中农的革命意志,“按件计工”,靠工分刺激社员的积极性,把一些社员养成了“工分脑袋”,“屁股上带着算盘”;第五,浪费了劳力,降低了农活质量。

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家庭副业，关闭集市贸易，也是“学大寨运动”一项重要内容，当然这次“反击”也不可能不被列为“反击”对象之一。

1978年3月2日，山西《晋中报》报道了晋中地区制订的22条规定，对社员的家庭副业，规定“产品除自用外，剩余的要通过国营商业和供销社渠道出售”。“我区绝大多数取消了自留地”，“全区农村集市贸易已为社会主义商业网点所取代”。

1978年4月19日，《山西日报》发表了昔阳县大寨供销社的调查。《调查》说：“他们在学大寨中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通过农村商业工作的职能作用，在商品流通领域堵死资本主义的路，为农业学大寨扫清障碍。”文章介绍了大寨供销社如何加强工作，“取缔了自由市场，使社会主义全面占领了农村市场阵地。”

1978年4月18日，《运城地区报》在《坚定不移地搞好“取代”工作》的大字标题下，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这个地区开展“取缔自由市场、代替集市贸易”工作的报道。在第一版上以于乡和韩阳两个公社对比的方式，发表了一篇《本报记者述评》，说：“今年3月份，社会上刮起一股冷风，怀疑‘取代’工作。于乡公社党委和供销社党支部及时召开了全社生产队长和代购代销员会议，号召大家要顶住冷风，坚定不移地把‘取代’工作搞到底。……相反，韩阳公社和供销社的领导对‘取代’工作缺乏信心，尤其是供销社领导，还持有怀疑态度。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左右摇摆。这个供销社的党支部书记……还经常大放冷风，说什么：‘山西、陕西隔条河，两省政策为啥不一样？人家那边集会人山人海，要啥有啥，咱这里弄得冷冷清清’。显然，这个供销社的党支部书记就十分迷恋和向往自由市场。……他们不仅不积极取缔自由市场，而且还充当了自由市场的‘卫道士’。”

在整个“反击”中，唱主角的是《山西日报》，火力最猛的是1978年4月16日该报发表的长达万字的编辑部文章：《真学大寨就有农业发展的高速度》。该文是此次反击领衔之作，它挥舞“左”的大棒，给落实党的政策的人扣上“反对、怀疑社会主义”，反对“学大寨”的“反

动势力”的大帽子，把落实政策的干部们说成是“各种破坏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反动势力”。这篇文章说，“我们也有同志总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对于大干社会主义，缺乏魄力，放不开手脚，不是把着眼点放在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农业上，或者在顺利的时候，还觉得社会主义可靠，一遇到艰难险阻、天灾人祸，就忘了社会主义，又觉得还是资本主义、小农经济那一套可靠。有的同志甚至认为可以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来搞社会主义。”文章强调，“一定不能忘记农村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斗争这个主要矛盾”，“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继续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向各种破坏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反动势力和错误倾向进行斗争”。

以上就是二十几年前那次“反击”的部分内容。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那次“反击”是多么猛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农村改革的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斗争是多么激烈、尖锐、复杂。

在公开“反击”的背后

这场反击规模不算很大，但火力很猛，性质严重，它的影响远远超出新闻界。

这场“反击”能够如此猛烈地展开，绝不是偶然的。冲到第一线开炮呐喊的是少数人，但其背后是有一股力量在支持着他们。说到底，是农村工作受“左”的影响太深了。某些人在“左”的轨道上走久了，走惯了；也有人被一次次政治运动整怕了，不敢越雷池一步。形势变了，却还抱住所的“大寨经验”那一套不放。总之，只有陈永贵等同志是搞不成这次“反击”的，他首先得到当时的山西省委某些领导的有力支持。山西省是大寨所在地，山西省委在农村改革初期，一直坚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一整套“左”的东西。在全国“包产到户”已经形成气候的情况下，仍然认为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是方向、路线错误。1978年春天，山西省委某些人在山西省内，甚至在中央、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上，肆意攻击落实党的政策的行动，继续散布“左”的错误观点。省委一位领导在山西省一次

会议上说：现在外面反对学大寨这股冷风很大，不要受这些影响。我们鼓吹，“首先应肯定大寨的一整套经营管理。现在是对大寨经验宣传不够，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有人说当时影响全国思想解放的，全国有“两个凡是”，而山西还多出两个“凡是”：凡是大寨已有的先进纪录不得超过，凡是大寨已有的经验要照着去做。直到1980年陈永贵同志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后，仍无根本性变化。这一年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同志亲赴山西找许多领导做工作，帮助他们转弯子，总结经验教训，之后又调整了领导班子，才终于打开局面，“大寨”问题才得以解决。这年8月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呈上一份报告：《关于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11月23日中央加了几千字的批语，批发了这一报告，这便是1980年83号文件。直到这时，山西对待大寨的态度算有了根本转变。

理解、支持陈永贵进行“反击”那些错误说法的，在北京也有人在。农业主管部门的某些领导就是。农林部1978年3月29日召开情况汇报会。会上，农林部一位副部长在发言中专门谈了宣传报道问题。他说农村经济政策，如按劳分配、经营管理是应该宣传的。但是分量是不是要那么多？要掌握一下，要适可而止。

1978年4月，在山西“反击”火力最猛烈的时候，农业主管部门整理了一份《目前农村工作中几个值得注意的政策问题》的材料。这份材料指出，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它表现在也影响着各个方面。农村工作必须始终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在一定时间侧重清理和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纠正某些突出的倾向，是必要的。但是总的说来，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开展“一批两打”，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整党整风整社，是农村工作的中心。同时，应该看到，当前各地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整顿领导班子，成绩是主要的。批资本主义过头，对干部处理的面大和不准是少数的、个别的现象，大多数地方对资本主义没有批起来，对社队领导班子姑息迁就，不敢批评教育，没有认真整顿是主要的。许多地方资本主义泛滥，社队领导班子中存在的问题，比“四清”以前还严重。这是当前损伤社员积极性、障

碍农业高速度发展的主要矛盾。

这份材料特别强调指出，“四人帮”在农村的干扰破坏主要是从极右的方面，造成许多地方资本主义泛滥，歪风邪气盛行；也用假左真右的手法，破坏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这两种情况是同时并存的。在运动中必须对当地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加强指导。在批判“四人帮”的假左的时候，要彻底揭发其极右的实质；在纠正某些“左”的倾向的时候，不能放松了“两打”和纠正资本主义倾向。

把这份材料与山西“反击”所发文章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两者间的诸多共同点。

尽管陈永贵在山西“反击”的火力很猛，尽管还有人在顽固地坚持“大寨经验”一整套“左”的错误做法，但响应者很少，各地报刊都没有跟上，反应冷淡。中央主要新闻单位旗帜十分鲜明。他们从实践中认识到要把农村宣传重点放在落实党的政策上，“学大寨”运动不能再搞下去了。所以，1978年以来，除了某些会议上的几声口号之外，就很少有对“大寨经验”、“学大寨”和“建设大寨县”运动的宣传了。但也有一个例外，1978年4月21日，《山西日报》刊出驻大寨联合报道组署名的《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一文，这篇文章鼓吹的仍然是“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大批资本主义”等“左”的那一套，还有什么“大寨、昔阳干部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不是嘴上说社会主义，实际干资本主义”，这类影射攻击别人的昏话。可是，不知是上面哪位支持大寨的大人物发了话，还是新闻单位自己考虑宣传策略上的“平衡”，新华社、《人民日报》两家商定，最后由新华社全文转发4月21日《山西日报》刊载的这篇文章，《人民日报》全文刊登。有人说，这是“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以来，新华社、《人民日报》对大寨、昔阳发出的最后一篇表扬性的大文章，是对“学大寨”运动告别的“最后一声礼炮”。

这场“反击”来得猛，去得也疾。炮声隆隆一阵之后，很快烟消云散。这成了农村改革进程中一段极为响亮，却十分刺耳的“插曲”。也有人开玩笑说，这场勇猛的“反击”，是“学大寨运动”的回光返照。（责任编辑 杨继绳）

吴组缃真话说到底

● 吴继路

在北京西山蓊郁的丛莽中，一座普通坟茔的墓碑上镌刻着两句铭语：“竟解中华百年之恨，得蒙人民一世之恩”。这是墓主，著名作家、学者、教授吴组缃先生对自己一生情事真诚的高度概括。吴老逝世已十年，“古来圣贤皆寂寞”，光阴流水，世事沧桑，对这位风骨卓然的世纪老人，旧人会记得，新一代可知道？

吴老生于1908年,1994年去世,他的经历前一半在旧中国,后一半在新中国。年轻时负笈清华大学,后以早熟的才气创作农村题材的小说,解剖社会人生刻骨铭心,态度严谨,被茅盾大师赞为文学“生力军”,并预言他“是一位前途无限的大作家”。记得当年求学读他的成名作、代表作《一千八百担》,因为对作品深刻揭露的南方农村宗族统治复杂关系不很了解,加上小说完全用人物对话刻画性格,推进情节的高超手法,使缺乏鉴赏力的我没有读懂。后来读《天下太平》,我的心被震颤了,作家笔下底层农民惨苦境遇与绝望挣扎,尽管事过境迁,也叫人坚信西哲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贫穷是革命和罪孽之母”,从而相信旧中国农民造反是天经地义。

农民果然造了反，中国革命从农村星火燎原，并且经过浴血奋战取得了成功，新中国建立。吴组缃先生刚过“不惑”之年，赶上改天换地，兴奋欢跃自不待言。可是，历来以写农村写农民著称文坛的吴先生，此后却专心于教学与研究，没有再搞文学创作。据说他这个决定，也是接受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回顾前尘，盖棺论定，不能不赞叹这个决定的世事洞明。

为什么呢?组缙先生的创作自始抱定现实主义宗旨,那是既经典又现代,既有传承又极具个性的文学法则,他视为天条,所以一贯反对“主

题先行”，更拒绝奉命写作。倘若面对农村题材，他断然不会去写那样的小说，譬如煌煌四大卷的《金光大道》。陈寅恪先生有句翻用古人意韵的诗，曰：“不采萍花即自由”，很可以表达吴先生当时的状态。文学研究专家对这种现象自然可以有很多深刻的阐释，但就普通人来说，便只能有个单纯的认识，那就是这位作家或学者一贯主张和坚持：说真话。

组绌老人后半生的四十多年,是以教师和学生身份在美丽的燕园——北京大学度过的。丰厚

北 京 大 學

徐路同志：
 來書奉悉。無沒有去寫重慶四、五的散
 文。只有一篇散文，此篇寫到重慶一段故事。
 此篇甚長，因紙可結手，故多刪筆充數。另
 一篇，因字數銀足，者一部，寫了重慶之事。
 均收入人民日報社。吳錫湘小說散文集，
 諸君閱一過，裁存否取為荷。
 此致
 吳錫湘同志
 八月六日

吴组湘致作者信

的学养,严谨的作风,事事务实的处世原则,使得吴老在学府讲坛成就了另一种流泽与业绩,历届学生都盛赞他的讲课极富魅力,听他的课如同被能工巧匠琢磨陶冶,完全成为一种享受。

我无缘享受这种幸福,只从几番阅读他的作品产生由衷景慕。吴老晚年口碑甚丰,不胫而走,而最为人们钦佩颂扬的,莫过于他鲠直坦诚的性情,任何时候都敢于说真话。“说真话”,这么一桩简单的事,竟会成为人们崇仰的对象么?是的,因为上世纪后半段,正值我们青壮年时期,经历过一段难忘的世道,那里假大空备受褒扬,而敢讲真话的人却横遭整治,上至元帅下及黎民,有的竟付出生命代价。文学大师巴金老人把他的“随感录”题为《真话集》,正可以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标示。

在我多次听过吴组缃老人数十年间敢讲真话的典故逸事以后,便潜生一个心愿,何时能有机会拜晤老人家,“见贤思齐”,亲聆教诲?但素昧平生,凡人如我,怎好贸然登门叩访呢?

而机缘终于有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为了编《作家童年散文百篇》,给组缃老人写信,请他推荐篇目。很快得到老人答复,信中说:“我没有专写童年回忆的散文。只有一篇散文《柴》,写到童年一段故事。此篇甚长,后段可独立,或可滥竽充数。”

《柴》写小时候他家雇来劈柴的一个贫苦农民,个子瘦高,小孩子叫他“鹭鹭哥”。他孤苦破落,身世悲惨,一边狠狠劈柴,一边向身边小孩子倾诉自己的倒霉遭遇。结结巴巴的故事却惊心动魄,这成了作者阅历人生的重要启蒙课。作品刚发表即由日本作家增田涉译成日文,被赞为有“鲜明的写实主义作风”,收入佐藤春夫编的《世界短篇述作全集》。

想通过这篇文章叫新一代读者了解于他们已很生疏的老作家,这个愿望的实现原本渺茫。但是我趁机会重读一遍组缃先生的全部文学作品,对这位学者型作家独异的文韵文体多一点感受,却是很有收获。“风格即人”为洋格言,“读其文,想见其为人”是古贤语,我在延宕了很长时间,克服了重重心理障碍之后,终于在1992年4月末的一天,来到北京大学朗润园九公寓,拜晤吴先生。

事前我预设的一个聆教题目,就是关于说真话。我一位朋友,同事,早先做过吴老学生,他告诉我:吴先生的为人,使他倒霉的地方,也是他顶受人钦敬的地方,就在于一贯耿直,刚正,敢说真话。在这一点上他极严格,不将就不敷衍不矫饰。朋友知道我有顾虑,又鼓励我说:先生的性情外刚内柔,对凡人百姓,老人家从不摆架子,你用不着胆怯。

果然,我在以室代厅稍显幽暗的书房看见吴先生时候,84岁的老人正在病后调养。本来魁梧的身材,坐在沙发里便难以彰显,但见他高额宽颊,疏眉朗目,面貌清癯遮不住文人武相。他戴一顶绒线织的便帽,似乎小孩子才戴的那种,眼光宁静却烁烁有神。我自报家门,向老人家问候。在我们编的书里,作家按生年前后排序,他的《柴》排在第三十九,中间靠前。老人翻开书,指着冰心的题词说:“她大我八岁,身体还很好。”

谈话入轨,事不宜迟,我暗转到预设的话题,想印证传闻很广的有关老人家讲真话的逸事。出乎意料,老人说真话不留面子,吐肺腑惟见坦诚,他这个脾气当时便亮了相。提起解放后全力投入教学不再创作的事,我没有细掂量,贸然说了一句:“您是不是不愿意搞‘遵命文学’?”

老人听了,眼睛直直望住我,语气显然带着不满,正色道:

“你是说鲁迅讲过的那个‘遵命文学’吗?你去好好查查书,鲁迅有明白的解释。”

或者看出我面红耳热,老人面色和缓下来,说,我们那一批搞文学的人,无论做人为文,受鲁迅的影响太大了。你是教写作课的,必定知道鲁迅做文章的秘诀,就是“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

一片真话坦言,在我如醍醐灌顶,那次访问归来,连忙查鲁迅文集。“遵命文学”的话在《〈自选集〉自序》里,当提到《呐喊》的创作经过后,作者说:“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组缃先生早年就说过,自己做人为文的宗旨,都是鲁迅“启发扶助起来的”。当时“革命先驱者”改造社会的主张,与他们的文学追求完全

一致,如此的“遵命”自无须避讳。但是如果让文学成为一种东西的奴仆,唯唯遵奉圣旨,服从政策,这无疑就变成了“命令文学”,跟先前讲的“遵命文学”所指全不是一回事。我很钦服吴老几句真话的教诲,想到他的断然选择,他一生前半后半的不同奉献,带一定典型性,值得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人好好审视。

我提到早年一件说真话的典故,老人沉吟说:“那不是一件平常事么,还有人记着?”

解放初期,作家协会召开一次座谈会,讨论刚问世的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这部紧跟形势的作品自然很被看重,主持会议的人也预先有个意向,希望与会者充分肯定。发言者热情鼓励,中肯分析,这都在情理之中。组绂先生也讲了话,因为他在作家协会任职,又是著名小说家,他的发言自然很引人注意。吴先生在对作品的合时宜与作家真诚投入生活的态度作了赞许之后,更多更细地剖析了小说的不足与缺点,特别是主要人物形象刻画上的粗糙乃至败笔。他说的一片真话,深含着对同行的关爱,也流露对新创作的期许。不料这样的真话,由于跟主调不和谐,竟遭到一些人非议,七牵八扯,说了不少离题的话。随喜尚同大概是人的普遍心理吧。逆耳良言往往被误解,鲁迅早年批评过的那种小家子气,小圈子气,风流不绝,文坛与名人也未能免疫。

访谈不到20分钟,话题剪接老人的经历却达二三十年。吴老回忆说,当年那次座谈会是沙汀主持的,沙汀跟他是老朋友,面对那种气氛也无可奈何。“前几年他又调到北京工作,我们见过面。”提起写《三千里江山》的杨朔,老人慨叹说,他是个很认真很诚实的作家,听说也在文化大革命中给迫害死了。

在中国,讲真话倒大霉的一页皇皇历史是反右派运动。吴老历来直言不讳,“炮筒子”,他的日子自然不会好过。“鸣放”时候谁晓得那是“阳

谋”?整风,给党提意见,提到知识分子政策,一阵子受批挨整,过后又“落实政策”,一贯心里有话就直说的吴先生,顺口打了个比方,说:“这倒像大人对小孩儿,打一顿屁股,给一块糖吃。”

“不过那么一句口头大白话,俗话,想不到成了名言,多少年老有人提它。”老人口吻平静,其中的感慨是蛮沉重的。

我给老人茶杯添上热水,说:“因为多少年间说真话太不容易吧。您为说真话不也付出代价了么?”

知无不言的那些意见,加上他写文章批评“政治挤瘪了业务”,他的种种言论处处不合时宜,反右运动里老人不断挨批判,后来,他的预备党员资格也终于被取消。

真是禀性难移,他说实话真话的做人宗旨可谓“屡教不改”。十年之后他的遭际更凿凿证明了这一层。

我从听闻得来对老人的印象是,他很肃谨,不苟言笑,忽然听到他幽默诙谐的话,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吴老静静地说:

“那以后倒不打屁股了——,”看见我诧异的表情,他仍静静地说:“改成往上打,打脑袋了。”我忍俊不禁笑出声来。

整治打击知识分子的既定方针,到文化大革命算登峰造极。北京大学这块新文化运动发祥地,谁也料不到半个世纪以后,竟发生了史无前



吴组湘(左)与本文作者在一起(摄于1992年)

例的对文化,对文明的疯狂践踏。寒凝大地,恐怖四伏,举国上下举红书,喊万岁,造声势,说假话。大批正直人士为保全性命而严缄其口是自然合情理的事。鲠直坦诚的吴先生怎么样呢?真话还是憋不住的。这回的真话不是俗语而是一句成语:“毛骨悚然”。

动乱伊始,吴先生和一大批学者教授专家,被揪出来批斗。红卫兵造反派把大石板压在他们脊背上,限定时间背诵毛主席语录,背不出来,皮鞭棍棒砸过来,劈啪声痛呼声刺耳震心。如后来季羨林先生在《牛棚杂忆》里记述的,不堪非人凌辱,他同样有过自杀的念头。这些老文化人硬撑着活下来,是他们倒要看看这天大的闹剧究竟如何收场。

闹剧的高潮该算林彪爆炸,“批林批孔”开幕,滑天下大稽地把先前的罪过扣在副统帅头上。“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一大群人开学习会,组绂老人发言,回顾当年“横扫一切”的情景,说到一辈子难忘的感觉,这才有“毛骨悚然”的话。其实,这不是经历那种场面的所有人都产生且铭记的真实感觉吗?只不过先生说真话的性格“不可救药”,他就像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儿,自顾自说出了实情。

“为这句四个字的大实话,听说您又挨批判啦?”

“当然,说是仇恨文化大革命。”老人的语气和表情依然坦荡平静。

他还说过文化大革命“造成文化和文明的不毛之地”,当然更属于地道的“反动言论”。一通通批判如狂风恶雨,闪电霹雳,吴老却像一株大树,叶子掉了,枝杈断了,扎在泥土里的根株则一丝不动摇。工农兵学员“上管改”了,他在课堂讲文艺理论,说到塑造人物,仍然搬出了讲了一条“准则”,引用一句古典名言,叫“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礼记》上的话)。反右倾回潮,他又成了靶子,军宣队负责人声色俱厉上纲,说:“林彪,我们也要知其善吗?也要爱他吗?”

先生木然听着点名批判,一声不吭。那位发言同志大概没想,若是林彪一无是处,坐根儿就是坏蛋,恶魔,那么,把他钦定为“接班人”该当何罪?

不能影响老人家休息,我该告辞了。我想听的话,几段有关“说真话”的口碑式传闻,得到了主人公的证实,又亲聆老人教诲,我感到很高兴。蒙慨准,我给老前辈照了一张相,也拍了个合影。叫我痛感意外的,我对老人第一次访拜也成了最后一次。两年后,86岁的吴组绂老人溘然长逝。对后面近二十年,他称为“欣逢盛世”,抱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信念,他想做不少事情,包括后半生中断的文学创作。高阁壮志,夙愿未偿,自然令人叹惋。但老人终身不移的精神操守,尤其其他那种铮铮骨气,他那种刚直不阿、永远敢求真话的气派,形成一股被众人心仪的人格魅力,“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无疑更具有永久价值。

果然,名贤流泽不会随人而逝。组绂老人已不在,而有关他的一个新典,也属于吐肺腑说真话的,使我很感兴趣,忍不住说项。上世纪80年代初,年逾古稀的他应邀赴美国访问。在大学演讲,一位听众发问,提出个敏感尖锐的历史性问题。拨乱反正,国策转轨,原来坚决反对的东西,如今要极力推行了。问者不无挑战意味:你们那些当政者到底在干什么呢?

这样的巨大课题,横岭侧峰,答案纷纭,莫衷一是。组绂先生一辈子心口如一,怎样表达自己的真实信念又不说空话呢?饱谙世事,人情练达,他的一席真话,又是大俗话兼大实话,在课堂里激起一片笑声:

小时候,老祖母叫给她搔痒,我就去执行。她老人家一会儿说:上边一点儿。一会儿又说:下边一点儿。先说靠左,再命令我靠右。后来才嚷:对喽对喽,那是正好抓到了痒处。你看,连搔痒这么简单的一件小事,也不是一下子就抓准。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搞一种新制度,能不摸索吗?

吴组绂先生这样的世纪老人,他们的信念,他们的追求,包括他那种“真话说到底”的品格,都同中国上一个百年的历史紧密联系着。若想探索先生的心灵历程,他为自己和他誓愿“生生世世为夫妇”的夫人沈菽园撰写的墓志铭:

竟解中华百年之恨 得蒙人民一世之恩
或者能够成为最具说服力的诠释。

(责任编辑 萧 徐)

《大公报》的创始人英敛之

● 王 鹏

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的《大公报》,是创办得较早且又较为重要的报纸之一。其创办人是英敛之(1866—1926年)。

英敛之其人

英敛之,名华,字敛之,号安蹇,满族正红旗人,1866年生于北京。他幼年家贫,“家世微寒,先代无达者”。据说英敛之的父亲和长兄都是体力劳动者,他自己是依靠自学而博览古今群书,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22岁时,他开始信奉天主教,懂得一点法文,从此又和法国人有来往,接触到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知道那里“民权充盛,民智开通”。因此,英敛之很希望自己这个破落垂亡的国家,也能通过学习西方,变法维新,逐渐富强起来。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声震全国。1898年,32岁的英敛之也写了一篇《论兴利必先除弊》,对康有为的一些政治主张表示赞赏。

1902年(即《大公报》创办那年)他在自己日记本的扉页上题了这样一首诗:“献身甘作万失地,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阔立多时。”他的妻子是皇族,姓爱新觉罗,名淑仲,文化程度很高,工于韵律。

英敛之是位有思想的人,敢于发表政治主张。办一份日报,是最理想的表达自己意志的方式,他决心“闯荡”报界。

《大公报》的筹组和创刊

据英敛之日记载,英在1901年4月24日由上海回到天津。他回到天津的第三天,去拜访天津紫竹林天主教的总管、教友柴天宠。柴约请英开设报馆,并答应帮助“募集股本,甘为赔垫”。英敛之很爽快地答应了。

柴天宠是《大公报》的大股东;《大公报》的另一个大股东是王郅隆。拿钱入股的还有张连璧、李敬宇、朱志尧等以及法国主教樊国梁,《天演论》的翻译者严复也入了一小股。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创刊。创刊之时,八国联军已占领天津两年了,《辛丑条约》的签订也快一年了。这时候,八国联军组织的“都统衙门”统治着天津。那时的报界,“中国南北纵横,报馆仅有二十余家,南居二十,北得余数,四五家而已。”这就是说,当时南方的思想比较活跃;天津地近京畿,在清廷直接钳制下,舆论界死气沉沉。此时,《大公报》应运而生,在北方最大工商业城市——天津创刊了。

在《大公报》创刊号上,刊登了英敛之撰写的《大公报序》曰:

“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凡我同人亦当猛自策励,坚善与人同之志,扩大公无我之怀,顾名思义,不负所学,但冀风移俗易,国富民强,物无灾苦,人有乐康,则于同人之志尝焉,鄙人之心慰已。”这就是说,针对当时那种国破民奴、封建专制主义乌云笼罩全国的严重局面,英办《大公报》,同戊

戊时期一样,仍要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学术文化思想,对“我同胞”进行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工作。1905年4月13日,适值《大公报》出至1000号,英敛之撰写《千虑一得》一文,再次阐述了办报宗旨:“自从出报到而今,差不多三年的光景,作报的人一番苦心,无非是盼望中国强盛起来,并没有别的意思。故此每天苦苦的对着各等人,说长道短,讲今比古,凡是可以劝善惩恶之事,没有不按公理论断的,也不管人爱听不爱听,横竖凭我们的天良,尽爱群的本分,虽然我们没有什么高才远见,到底这一片好心,自己是对得起天地鬼神的。”

《大公报》初出一大张,成书版式,用中国毛边纸印刷,仅有一面。报头刊有法文:“L'Impareial”,为“无私”之意。关于“大公报”三字的寓意,英敛之解释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报之命各固已善矣”。英敛之自任该报总理、撰述、编辑诸职,总揽言论和经营的全权。

《大公报》的创办,梁启超有这样的评论:“天津之大公报,有特色,有新论,实可称日报进化之一级。”报刊政论家张季鸾亦有这样评价说:“近代中国改革之先驱者,为报纸;大公报,其一也。中国之衰,极于甲午,至庚子而濒于亡。海内志士,用是发愤呼号,期自强以救国;其工具为日报与丛刊,其在北方最著名之日报,为大公报。盖英君敛之,目击庚子之祸,痛国亡之无日,纠资办报,名以大公”。

要求慈禧归政

《大公报》一创办,便大胆地议论时政,呼吁慈禧不要“垂帘听政”,拥护光绪亲政,从鼓励“保皇斥后”转而呼号“君主立宪”,伸张民权,反对封建专制。

1902年6月21日,英敛之在《大公报》上撰写《论归政之利》一文,公开要求慈禧撤帘归政。文章强调指出,只要“太后”一归政,就有八利:“中外利,满汉利,民教利,新旧利,官闾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无不利。”他还指名道姓,指斥慈禧的亲信、军机大臣——“刚毅国贼”,祸国殃民;指责反对慈禧归政的大臣为“谄媚之小人”。

就是在这篇《论归政之利》的文章中,英敛之还揭露了慈禧1901年回銮以后搞的一套假变法及其腐败朝政,说:“盱衡时事者谓此次变法,虽曰力祛偏私,实事求是;其实仍是因循敷衍之故态,毫无精神于其间。恐泄泄沓沓,仍沿从前之陋习。既未将旧日之熏染,一一痛加湔洗;又未将旧日之秕政,凡可以涣吾民心阻吾进步者,一一锄之务尽,咸与维新。亦不过稍涉皮毛,欺饰耳目,藉以塞责。若是者,仅得谓之变名而已,非变法也。”英敛之尖锐指出,酿成这种“偷惰苟安”的根本原因在于:“士大夫鉴于戊戌之变,政府压力过深,倘有指斥时政者,则目为奸佞,不难加之以罪。”英敛之明确表示,他既不“如寒蝉之无声,漠视吾国沉沦而不救”;也不“胶执己见,党同伐异”;更不“意存趋避,拗曲作直,指鹿为马,信口雌黄,求悦当今一二人之耳目,不顾天下后世之唾骂”。在这篇文章中,英敛之敢于抗大官,骂酷吏,指斥不避权贵,请命不忘小民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同情进步人士

1902年4月8日,清廷与沙俄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后,沙俄不肯履约,不肯撤兵。俄驻华公使雷萨尔提交清廷外务部总理庆亲王奕劻提出“密约七条”压迫清廷承认,其中有“中国不得将东三省之地让与他国或租贷与他国”等款项。进步人士沈荇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披露给日本报界,引起了日英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满,纷纷诘问清室。

慈禧得知“密约七条”被揭露,异常被动,立刻派人彻查消息走漏的原因,有人告发是沈荇所为。1903年7月17日,沈荇被捕。英敛之得知沈荇被捕的消息,于21日在《大公报》“时事要闻”栏中,披露此事。31日慈禧传旨将其“立毙杖下”,用刑极惨。8月2日,《大公报》全文刊录了沈荇“绝命词”四章,其末章云:“今年三十有一岁,赢得浮名不值钱;从此兴亡都不管,灵魂归去乐诸天。”4日又详细报道沈荇杖毙一事,写道:“拿交刑部之沈荇于初八被刑。……兹闻是日入奏请斩立决,因本月系万寿月,向不杀人。奉皇太后懿旨,改为立毙杖下。惟刑部因不行杖,故

此次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谙习，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未至死。后不得已，始用绳紧系其颈，勒之而死。”9月16日，又有报道说：“当杖毙时，先派壮差二名，打以八十大板，骨已如粉，始终未出一声。及至打毕，堂司均以为毙矣。不意沈于阶下发声曰：‘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堂司无法，如其言，两绞而死。”这一报道，其惨状不忍于睹，引起读者的义愤。

1907年7月，清政府杀害革命党人徐锡麟和秋瑾之后，《大公报》也曾发表文章，批评清政府采用株连党祸的办法，大肆搜捕革命党，以致“风声鹤唳，举国骚然”。文章谴责对徐锡麟啖肉剜心，为见于二十世纪中国的“野蛮凶残行径”；对秋瑾这一女子，“以猛狮搏兔之力擒之。……既无证据，又无口供，遽处斩刑”，已经达到了“野蛮已极，暗无天日”的地步。

抵制美货与不受胁迫

1894年，美国与清政府订立了一个为期10年的、载明“两国政府愿合力办理，禁止来美华工”的条约。1904年这份条约到期，美国方面要求继续保留“禁止华工”条约中的主要内容。消息传到中国，各地迅速形成一个控诉美国排华罪行、反对美国经济侵略的爱国运动。

英敛之和他主持的《大公报》积极响应风靡全国的反对美国虐待华工的运动，鼓动天津市民抵制美货，拒登美国广告。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英敛之领导的《大公报》，对各地抵制美货的行为，做了广泛的报道，并号召全国制铁业、洋布业、火油业、面粉业等方面的商界巨头联合起来，不用美货、不卖美货、不消费美货，由此形成了一股很强的舆论攻势。

《大公报》于1905年5月23日登载上海商会发起抵制美货通电，5月26日全文转载了上海的有关抵制美货的“传单”，连续刊登了《上海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6月11日登载《本报不登美商告白》的启事。正在天津的袁世凯，看到《大公报》的英敛之如此起劲的宣传抵制美货，勃然大怒。袁世凯通过天津巡警局，以“有碍邦交，妨害和平”的罪名，下令禁邮禁阅《大公报》。8月17日，《大公报》刊登英敛之“启事”，

说：“抵制美约一事，倡于上海，各省风应，凡华字报五一无之，敝报当仁岂能独让？故随诸君子之后，亦尽国民一分之天职。诚以此举关系中国前途者既远且大也。今不幸敝报独触当道之怒，严禁士人购阅，不准邮局寄递，为不封之封”，并指明这个当道“实为我最有权力之长官”，即指袁世凯。接连几天，英敛之撰写多篇抵制美货、反对“袁长官”的诋毁爱国运动劣迹的文章，报纸的零售量骤增。当时，《大公报》设在租界内，事实上袁世凯的禁邮禁读令只能在租界外执行。

面对袁世凯对新闻的扼杀，《大公报》奋起反击，直到11月22日，英敛之还是不肯罢手，继续撰写《论驻粤美国领事函请岑督封禁报馆事》严正表示“执笔人之天职”是：“阐发公理也，激扬公论也，开通民智也，维持国力也。之数者，皆执笔之士，临死生患难、刀锯鼎镬而不易其宗旨也”。英敛之有力地伸张了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歧视、反对凌辱的决心和正气。英敛之的檄文，袁世凯无计可施。禁邮禁读不行，袁又采取拉拢的办法。袁曾几次以重金收买英敛之，均遭拒绝。一介报人，如此耿直、刚毅，实在是袁世凯始料不及的。

1908年，英敛之在回顾禁报经历时写道：“犹忆乙巳之秋被禁时期，而售报转赠，其多数量置之死地而后生，天下事大抵然欤。固知文字之生命坚逾宝石，虽万劫千魔，酷炎毒病，而不能损害其丝毫者也。当飞沙昼冥，怒涛山立，正不知危险奚似，犹有风静潮平，安致今此之一日。”

朦胧中理解“社会主义”

英敛之在办报之余，博览群书，接触各种思想流派，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学说。1903年3月31日，他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二十世纪之新主义》的专文，指出：“于二十世纪之天地，欧罗巴之中心，忽然露一光明奇伟之新主义，则社会主义是也。”该文对社会主义的内容作了以下的介绍：“其目的欲打破今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举社会皆变成共和资本，共和营业，以造成一切平等之世界。其手段则欲变少数之国家为多数之国家，变海陆军人之国家为农工商人之国家；变贵族专制之社会，为平民自治之社会；变

资本家横暴之社会,为劳动者共有之社会;而后以正义博爱之心而压其偏僻之爱国心也,以科学的平和主义而亡其野蛮的军国主义也,以同胞情谊之世界而扫荡刈除其侵略的帝国主义。”

英敛之偶尔听说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内容,就借题发挥,大谈国家机关是社会公仆的论点,提出“官吏为国家公仆”,是“大家雇来办事的”。他说:“官吏的权位、势力、财产、名誉,都来自国民,没有国民也就无须官吏,所以说官吏应当自居为国家的公仆。”他反对官吏有无限的权力,不讲道理,凭个人喜怒办事;主张“在官场中,第一是不走门子,专凭才干;第二是绝不受请托,铁面无私;第三是不要不合理的钱,但守着俸禄。”

英敛之对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解是朦胧的,他只是把社会主义当成一种思想流派,加以议论。

灌输新鲜知识

英敛之和《大公报》不仅有“敢言”之名,那



英敛之与夫人、儿子合影

时的《大公报》还适应新兴资产阶级发展的需要,提倡开办工厂,振兴实业,设立学校,传播科学知识等等。所谓“牖民智”,就是使民众脱离愚昧,增长知识。英敛之说:“民智不开,万样事都作不到好处。”为了向民众灌输科学知识,他在《大公报》上发表过多篇通俗易懂的文章,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历史等许多方面。关于地理,他介绍过亚洲、欧洲、中国的地理大势;关于历史,他讲过普法战争,讲过埃及向英、法借债受害的经过,还讲过德国宰相俾斯麦的故事;关于自然科学,他讲过月球,谈到过虹霓、潮汐、地震等形成的原理,介绍过电灯、气球、雷电殛人等新知识。

1903年1月13日,英敛之在《大公报》上撰写《中国宜广设工艺厂说》,指出“居今日而言行新政,第一先从实业上作起,而其余一切皆后也。”这发展起来就是“实业救国论”。

英敛之在关于移风易俗方面的许多主张,不仅在当时有很强的针对性,有些到今天仍有可资借鉴之处。他在《大公报》上主编的“附件”栏,从第一期就发表了《戒缠足说》,以后十余年如一日,一直宣传缠足的危害,称“中国有两件坏处,大坏处是缠足,小坏处是(男人)蓄辫”;又说:“应改掉三种毛病:缠足、早婚、吸食鸦片”;批评重男轻女思想,反对铺张浪费大办丧事等。

为清廷送终

1911年4月29日,英敛之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说妖孽》的文章,对清廷覆亡前夕官场腐败进行无情的揭露。文章说:“黑暗政府,妖孽之首领也。聚三五衰朽于一堂,旅而进焉,旅而退焉。聆彼口头禅,未尝不私忧窃叹云:大局之阽危,救国之不容稍缓,然而呈之于事实者,无一不颠倒错乱为图危图亡之谋,以言内政,则一面言预备立宪,一面仍拥护专制也;一面言严禁苛敛,一面仍搜刮民财也;一面言发扬民气,一面仍增益官权也。以言外交,则一面言自保主权,一面又曲徇要求也;一面虑外资充斥,一面又恣借洋债也;一面言慎重领土,一面又断送山河也。对于内,则为滑稽之政府;对于外,则为柔媚之政府。其变态之灵便,虽狐蛊不能喻其神。外

此,则惟是揽权,罔上营私。声色宴游为平章军国重事,子女玉帛乃进退人才之权衡。……仕宦之场,一妖孽荟萃之区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上自卿相之尊,下逮一命之士,何尝有丝毫图治之心。其所以孽孽矻矻,漏尽钟鸣而不肯暂止者,无非为保利禄长子孙计耳。自破格用人之说起,而官吏之流品杂;自卖差鬻缺之风盛,而官吏之心理变。以奴颜婢膝为手段,以白璧黄金为代价。在上之权贵,更依托之以为招徕之术,且美其名曰运动。遂令热中者流,载宝而朝,辇辇而市,胥皇皇焉以为进身之媒。人才之长保以此也,卓异之荐荐以此也。有若金店,有若妓寮,有若饭庄,有若寺观,有若骨董鬼,有若婢媼仆妾,举万有不齐之人类,悉变为官吏投资之场。甚至公署堂皇,大庭广众。昌言评鹭曰:某也,运动某大老而得之;某也,运动某贵人而得之。对于运动而已得者,则群羨其能;对于运动而无效者,则竟笑其拙。万其人一其心,百其途一其准。斜封墨敕,大开幸进之门;红粉朱提,尽是显扬之具。纷纷扰扰,几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及其既得,乃不得不谋利市三倍之赢。于是害民贼出其中,卖国奴出其中。互相倾轧,互相朋比之事,无一不出其中。鬼耶、蜮耶、罗刹耶、灵狐耶,吾又何从而定之!此妖孽中蕃衍最盛之一种也。”英敛之从忧国忧民、救亡图存的立场出发,对清末黑暗吏治,揭发得真可谓淋漓尽致,鞭辟入里。

揭露和抨击外国传教士的劣迹

英敛之是天主教徒,他积极倡导“天主教革新运动”。1912年,他曾上书罗马教廷,指控洋教士不学无术,“专欲愚民”。那时,北京是法国传教区,教权、教务都由法国“神长”控制。英敛之对于他们排斥中国学问、欺压中国教徒的霸道作风,非常气愤。所以,他“极力运动天主教脱离法国羁绊”,提出今后传教应“不限定一国,不限定一会”,并主张“能养成中国籍传教士,俾得自传”。他在上书中说:“以北京而论,我教不独无大学、无中学,并高等小学而无之,只有一法文小学。学费之巨,只可招教外人来学。学成之后,只可依法国人谋生。……一国之广场,以往例今,端恃本国之有神品者继承不绝。譬如一家之内,贵

能自食其力,万不能恃外债生存!”为了提高广大中国教民的爱国意识,英敛之发愤撰写了《劝学罪言》,大声疾呼不作洋人的“附属品”,不作“永世奴隶”。

退隐山林

英敛之经营的《大公报》实际上只有十年时间(1902—1912年)。1912年1月1日,“大清”皇朝倒,中华民国成立了。2月15日,临时参议院批准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这时的英敛之身体有病,“英君渐老,社务中衰”,加之他的仇敌袁世凯掌权,心灰意懒,不愿再抛头露面。1912年2月23日《大公报》改印“中华民国”的年号,同日刊登“告白”:“本馆总理英敛之外出,凡赐信者俟归时再行答复。”这一“告白”,一连登了20天,报务委托樊子谔、唐梦幻等代为主持。从此,他携夫人来到北京,隐居香山静宜园,潜心于宗教、教育、慈善等方面的工作。

英敛之在香山创办静宜女子学校,又设辅仁社,教学生学文,兼传授天主教教理。1916年9月,英敛之将《大公报》出兑给旧股东、皖系财阀王郅隆。1917年11月,熊希龄督办京畿一带水灾善后事宜,在北京设立慈幼局,收养灾民的儿女,诚邀英敛之任局长。1920年,慈幼局移香山,更名为香出慈幼院。英每年冬季募赈款,在香山开粥厂,赈济贫民。1925年初,英敛之创办“公教大学”,后改称辅仁大学,英任首任校长。因英所居香山静宜园在松树丛中,自号“万松野人”,著有《万松野人言善录》,是宣传天主教教理的文集;又收集在报纸上所写的论文,出版了一本《是也集》。英敛之因主持《大公报》而驰名,隐退后成为天主教在北方的“代言人”,当时有“南马(相伯)北英”之说。

1926年1月10日,英敛之病逝。应该承认,英敛之在中国近代史、新闻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历史学家、教育学家陈垣在评论英敛之时说过:“敛之以一个忠诚的天主教徒,发愤著书,提倡爱国,受到外籍教士种种恐吓、威胁,而无一点惧心,真可谓‘豪杰之士’了!”这个评价,恰如其分。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赵尔陆含冤逝世真相

● 张开善

1967年2月2日凌晨,这是一个平常的日子。这个时刻,人们不会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但对我来说,却是个难以抹去记忆的日子。因为那个时刻给我带来了沉痛和惋惜,萦绕着我整整37年。

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的常务副主任、中共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主任赵尔陆上将,突然去世在他的办公室里,当时只有62岁。

37年过去了,每当我提起拙笔想写出这段历史,我的心在沉重,我的手在发木,我的思维难以连贯。使我不能平静的是,因为这件不幸的事,本来是不该发生的,本来也是可以不发生的,然而居然发生了,而且是那样的折磨人,是那样的令人沉痛和惋惜。

赵尔陆一生戎马,驰骋疆场,南征北战,浴血沙场,硝烟弥漫,枪林弹雨,未能夺去他的生命。

赵尔陆出生于1905年,1927年春夏之交,他满怀为国为民赤诚之激情,从山西老家千里迢迢来到武汉,通过关系找到了董必武,随后董必武告诉他党即将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由董必武亲自写信介绍他到南昌去找朱德,刚刚20岁出



赵尔陆

头浑身热血沸腾的赵尔陆,随即毅然怀揣着董必武的信,长途跋涉奔赴南昌。1927年6月,由林柏渠分配他到国民革命军第20教导团,不久,他随这支部队在南昌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同年8月赵尔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走上了烽火连天、浴血战场的革命大道。

1928年初,赵尔陆跟随朱德、陈毅随部队进入湘南,参加了著名的湘南起义,随后上了井冈山。后来又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任红军第四军连、营党代表,29团政委、团长,红一军团供给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供给部部长,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晋冀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冀晋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华北军区参谋长兼后勤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二参谋长;建国后,他任中南军区和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国家第一、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共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主任等等。中共八届中央委员。

1964年上半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正在青海海晏地区核武器研究基地紧张的攻关,赵尔陆

前去察看,我当时是中央专委办公室主管核试验的工程师参谋,跟随他前去。在一天忙碌工作后,我们在闲谈中,当谈到战争年代战场上的危险性的话题时,他说:“我们这些活着过来的人,都会体会到,战场上子弹向你发疯地射过来那是很危险的,但要是做好隐蔽工作,伤亡就会避免或减少。”当我问他,您有没有这样的事例?他微笑而风趣地说,“有一次我蹲在战壕里观察敌人,刚要站起来,一排子弹呼啸着飞过来,从左耳边擦过,很快又一排从我右耳边飞过,对我的脑袋留了点情,子弹跟我们这些走过来的人也不知手下留了多少次情啊。”

赵尔陆哪里知道,两年以后,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一场风暴,却对他一点也没有留情,而是要了他革命一辈子的宝贵生命。

“文革”初期,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都曾为赵尔陆发表过保护性的讲话,但都未能扭转形势,而他的生命最终还是被夺去。

1966年,我国大地上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风暴,来的突然,来的不正常,更来的强词夺理,还应加上一句来的凶狠。

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第一把手罗瑞卿大将在这场运动前期就被定为反党分子而打倒,他承受不了这样的屈辱,从楼上跳了下来,而成了终生残疾;第二把手常务副主任赵尔陆上将自然就成了运动的替罪羊,国防工业战线上的斗争对象。

今天的中年以上的人,大概都还记得或者曾亲身体会到,“文革”开始不久,成千上万人们的思想和心态被扭曲了,而且扭曲的如此厉害,人们像一匹脱缰的烈马,失去了控制,一浪高过一浪的造反,国防工业系统的年轻人组成各派造反组织,造反精神之强,不仅在北京是响当当的,而且在全国也是闻名遐迩的。

“文革”开始不久,赵尔陆的日子就不好过,而且越来越不好过,国防工业系统的一小部分人抄了他的家,他有家不能回了,一大部分人团团围住了办公大楼,要揪斗赵尔陆,对进出的车辆进行检查,看看有没有赵尔陆,每天高音喇叭的

怒吼声震耳欲聋,“赵尔陆出来!”“罗、赵合谋部院合并大阴谋一定要清算!”“破坏国防科研的赵尔陆绝没有好下场!”“誓死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声声在空中回荡,不断的冲击着人们的耳膜。

1967年1月,此时此刻的赵尔陆,经过半年来的运动冲击和精神压抑,他在坚持背着氧气袋看大字报,参加批斗会,他在只能忍气吞声的听着,不能有任何解释,在不停的愤怒的喊声中一天复一天的度过,他此时已是身心受到刺激和打击,他被折磨得既疲惫又憔悴,他显得又黑又瘦,本来是合体的一号军装,此时穿在身上晃来晃去,又肥又大,已失去了昔日上将的威武风采,他的饭量逐渐减少,已减到了平时的一半都不到,他不停地抽烟,他失眠、他头疼、气短、呼吸困难……

此时,周恩来首先出来对赵尔陆进行了第一次保护,在一次中央开会的时候,周恩来将赵尔陆交给了叶剑英和聂荣臻,让他们把赵尔陆安排到北京的西山休息。但赵尔陆在西山没住上几天,他就对这种离开工作岗位,躲躲藏藏,心中甚为不畅,他对这种度日如年的生活很不愿意,他向叶、聂二位老帅提出,国防工业没人管是不行的,自己还是回到机关,做好群众工作,取得群众谅解,尽全力抓好国防工业。

1月22日深夜,赵尔陆从西山改乘吉普车,穿过稀疏人群,隐蔽的回到办公大楼,当他了解到除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研制和极少数项目外,大部分国防工业的研究生产几乎都处于停产状态,他心情极为沉重,郁郁寡欢,内心压抑。

接着,周恩来在京西宾馆接见国防工业系统的群众代表时,对赵尔陆作了第二次保护,周恩来说:“你们不了解党的历史,你们说罗、赵合谋,这是不符合党的历史的。”

随后,传来林彪对赵尔陆问题的讲话,由于林彪当时所处的位置仅次于毛泽东,他的讲话当然很有权威作用,但他说了一个双关语,“对赵尔陆的错误要狠狠地批,对他的工作要重重的用”,这就给造反者有了可利用的借口。这么一来,办公大楼外面的呼喊声毫无减弱的势态,高音喇叭不停的宣传,“罗、赵合谋部、院合并大阴谋”的呼喊声。

特别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说的保护赵尔陆的讲话,没能及时传达下来,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在一次回家见到毛泽东时,谈到赵尔陆被整的事,毛泽东说:“赵尔陆是井冈山的人,为什么要整他?”这句话在赵尔陆去世后才传出,如果早点传达下来,在当时毛泽东的话真可以说是一句顶一万句,绝对权威,赵尔陆肯定会得到保护,对赵尔陆的攻击将会减弱,他的生命将会延续。

赵尔陆的最后时刻精神上的压抑、痛苦,致使心脏病、哮喘病并发,在双重打击下夺走了他的生命。

“文革”开始后,国防工业系统不断传来停工停产的告急电报,工厂和科研部门,绝大部分领导都已靠边,挨斗挨批,无人管业务了,偌大的厂房,空无一人,原来用大量副食品向国外换回来的精密仪器和设备已被尘土覆盖,特别是生产一半的武器装备,吊支在半空中,三五成群的工人、技术人员都不再干活,有的休闲,有的苦恼,有的不安,也有的高喊形势大好,一派大好。这样的局面让赵尔陆极为痛心。

但是,痛心也使不上劲,赵尔陆每天24小时只能在他的办公室和一间小小的休息室里度过,只能在这有限的小空间转来转去,大门出不去了,家回不去了,国防工业各部、各研究院、各工厂更是去不了,只要走出大门就会被造反者抓走,大门外每天都在等着抓他,这位驰骋沙场的勇将,哪里受得了这种禁闭生活的压抑。

压抑、痛苦、委屈,让赵尔陆心力交瘁,心脏病和哮喘病严重并发,但他身边没有医务人员、没有急救药物,甚至没有一个人。

1967年2月2日上午9时左右,当国防工业办公室的机关工作人员,推开赵尔陆休息室房门时,吃惊的发现,他坐在小床上,身体向前倾斜,头垂在膝盖上,手里夹着一支曾被点燃过的香烟,燃烧的香烟把手烧得焦黄。可是他再也感觉不到疼痛了,让人们看了心痛。一代名将就这样离我们而去。

几乎在同一时间,国防工业办公室秘书室的红色电话机响了,是周恩来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周恩来通知赵尔陆即去中南海休息,周恩来对赵

尔陆进行第三次更具体地保护措施。然而,此时赵尔陆已离开人间世界几个小时了。

公开部、院合并的真相,以告慰赵尔陆的在天之灵。

“文革”中,对赵尔陆声讨的最大罪名,是1965年初,将国防工业部与有关国防研究院合并,又称之谓部、院合并,是破坏国防科研的一大阴谋,一大罪行。在无休止的宣传下,激起了国防科研系统的许多人不满和愤怒,当时阶级斗争为一切的形势下,只要抓到赵尔陆,不被斗死,也会被打死,形势极为严峻。这一罪名对于了解中央是如何研究决定部、院合并过程的赵尔陆来说,让他处于极度委屈之中,但他只字未提这是中央的决定,不是他赵尔陆的阴谋,这一切他自己默默地承受着,直到他生命凝固在办公室。

部、院合并是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经过中央多次讨论研究决定下来的,并且形成了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下发后而实施的,其文件内容如下:

1965年2月21日,中共中央(65)中发112号文件通知:为了适应国防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科研、设计、生产应紧密结合,实行统一领导,统筹规划,以便更好地集中力量,掌握尖端技术,加强常规生产。决定将国防部六、七、十研究院分别与第三、六、四机械工业部合并,各研究院改属各部领导。中央责成国防工办组织有关部门抓紧做好各项工作,保证科研、设计、生产任务的正常进行。

这份中央文件中,极为明确的说明部、院合并是中央的决定,并阐明了部、院合并的积极意义,及其合并后的好处所在,部、院合并的中心是为了科研、设计、生产能更好的紧密结合。这与部、院合并是罗、赵合谋的大阴谋相差之远,可以超过太空与地球相隔的距离,简直是谬以千里。

公开此份中央文件,再一次说明,把部、院合并说成是大阴谋,完全是无端罪名,强词夺理扣在赵尔陆头上的这一罪名,是完全不存在的。

“文革”结束后,赵尔陆的夫人和女儿前去看望薄一波老前辈,薄老拉着赵尔陆女儿的手说:“你爸爸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我为刘伯承治眼病

● 陈智慧

刘帅已去世十七年,我常怀念他。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担任济南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主任期间,从1966—1968年为刘帅会诊两次,然后作保健医师一年零五个月。那时正是“文革”的动乱年代,我和刘帅、夫人汪荣华,以及他们的孩子朝夕相处,亲如一家。那是个特殊的年代,所以我们的感情特别深厚,每当回忆往事,我总有一种激情,使我难忘。

第一次见到刘帅

自从1965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工作学习及治疗疑难眼病的体会一文后,卫生部随即发文号召全国医疗卫生系统学习。我们济南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门诊病人突然增加到每日600—700人次,其中党的高级干部也越来越多,我也经常为一些中央首长会诊和出诊。

1966年秋天,院领导告诉我,让我出差到北京会诊,是卫生部组织的,明天就走,到北京后在站台上有人会来接,给我安排工作。同时,交给我一张火车票。因为近一阶段,经常有会诊,我也习以为常。安排好科内的工作后,我按时乘火车到了北京,一位女同志来接我,安排在我住过的新侨饭店。

第二天,那位女同志又来接我,对我说有位中央首长眼不好,请您会诊,地点在北京医院眼科。我们到了眼科,眼科老前辈左主任先向我介绍了刘伯承元帅的病史、病情及治疗经过。原来,刘帅已做过抗青光眼手术。最后,左主任告诉我,现在首长视力很不好,站在视力表前只能指出第一个大字的方向,我们还认为不准。首长多年来

看视力表,在头脑里有很深的影响,他只是模糊的看到,凭印象指出的。其实首长光定位和色觉都不行,给他看手指都数不准,有时眼前手动都说不准确,不可能看到视力表的大“E”字。我检查后想,是眼底出血后玻璃体积血多,玻璃体浑浊,看不到眼底。手术前由于眼压太高,有可能造成视神经萎缩,目前的治疗应以吸收玻璃体积血,提高视网膜功能为主。我提出了这样几条治疗意见。

这是我第一次给刘帅看病。刘帅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对同志亲切和蔼、对革命有伟大贡献的革命家。他身材魁伟,体格健壮,但是视力不好。我想首长若视力好,为党还能做出更大贡献。革命老前辈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我应想尽一切办法为他治疗。

上海会诊

大约过了几个月,院领导又告诉我到上海去会诊,我记得在火车站内戴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很多,已开始大串联了。到了上海车站,已有人在站内接我,送我到宾馆住下后,告诉我:“这次是来给刘伯承元帅会诊。你有亲戚和同学在上海,但不要去探望他们,好好休息。明天在华东医院会诊,我会来接你的。”第二天,在华东医院会诊,参加的人员我记得有华东医院的眼科主任,还有眼科权威、老专家、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任赵东生,他技术高超,德高望重,被国际眼科界人士称为“东方一只眼”,还有老专家周诚浒教授和华东医院一位内科主任。北京医院眼科派来了一位医师介绍病情,说北京会诊后,他们想

给首长做白内障手术,看是否能提高视力。这一次会诊是想听听华东地区的眼科界同志是什么意见。大家听后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是第二次会诊,对首长的病情有所了解。所以我就发言说:“我觉得首长玻璃体积血已七年,现仍浑浊很重,眼底看不到,只见红色反光。晶体浑浊较轻,没有全浑浊,按现在浑浊程度,视力应该较好,若眼底和玻璃体没有病变,根据我个人的临床经验,视力可能在0.2—0.4之间。我认为首长视力不好的主要原因,是眼底和玻璃体的病变,若做白内障手术,视力不可能提高,眼底可能再次出血,怕现有的视力也会丧失(因为上次眼底出血是在青光眼手术后)。我认为目前应先治眼底和玻璃体的病变。”当时我才40岁,觉得在北京和上海这么多老专家面前,我是比较年轻的,应该谦虚,所以我又说:“我的意见不一定正确,请各位老专家们多发表意见。”结果,他们都同意了 my 意见。

神秘的济南治疗

会诊结束后,我就回济南忙我的工作。这时候“文革”已经开始,我就开始受到冲击,每次他们斗争院领导,我就上台陪斗。

正在这个时候,刘帅办公室来联系让我去北京给刘帅治病。因为那次上海会诊治疗后,首长的视力有所好转,所以刘帅要邀我再去北京给他治疗。但是,斗我的那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不同意。此时解放军支左宣传队已进入我院,军宣队熊队长和群众组织一再协商,但那个群众组织的头头仍不同意。

大约在1967年3月,刘帅因为我不能去北京,就带着夫人汪荣华同志(也任刘帅的秘书,刘帅身边的同志都称她“汪秘书”)、参谋、护士来到济南,让我给他治病。他的两个儿子,因为停课闹革命,汪秘书不放心,就一起来了。这次刘帅来济南治病对外当然是保密的。

有一天,熊队长对我说:“刘帅已经来了,住在南郊宾馆的2号小楼,今晚没有安排开会,您吃完饭就去。他们要派车来,我怕给不同观点的同志看到你坐小汽车,又多一个批判材料,你自己去吧。此事要绝对保密。”

吃完晚饭,我带了眼底镜和眼压计,匆匆来到南郊宾馆2号楼,首长和夫人汪秘书热情接待。尤其是首长,还站起来叫着我“智慧同志”,亲切地和我握手。当时,不带姓只叫名字加称同志,是党内最亲切、最尊重的称呼。我想,本来应该是我到北京给首长治疗,现在国内这么乱,结果让首长长途奔波来济南找我,这是对我的最大信任,我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首长治疗,要千方百计提高首长的视力。我拿出检查仪器给首长检查后,给开了药。

没过多久,南郊宾馆的两派搞起了武斗,就连接我的司机的手臂也被打伤了。一天,济南军区杨得志司令员来看望首长说:“在此不安全,请首长转移。”并让我跟首长走。我提出要带一架裂隙灯以及眼底镜和眼压计,刘帅和杨司令都同意。

第二天,军宣队召开眼科科室会,会上宣布是“林副主席”和周总理批准,让陈智慧大夫去给刘帅做保健医师,要带去一些检查仪器。此时,不同观点的那个群众组织也不知说什么好。去参加开科室会的解放军同志怕反对派再想出别的点子来找麻烦,接着说:“陈大夫,您现在带了仪器就跟我走。”我当时就和同来的解放军同志抬着裂隙灯,拿了眼底镜和眼压计,什么生活用品都没带,跟着他们就走了。

在2号楼,我和首长及夫人又住了几天,每天给首长检查、治疗。这段时间,首长病情很稳定,眼压也正常。我们也感到很欣慰,渴望首长的视力尽快提高。

短暂安定的“中山陵”避难

过了几天,汪秘书对我说:“现在北京很乱,我们准备今晚坐火车到南京去,南京很稳定,医院秩序也很好,没有武斗。已经和许世友司令员联系好了。北京挂的专列今晚到。”我就整理好东西,晚饭后就跟随首长出发了。

到南京后,我就与南京军区总医院联系,请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杨成来会诊,给首长检查,首长全身情况均正常。我分析因长期眼压高视神经可能有萎缩,就开始给首长用静脉点滴,治疗玻璃体浑浊及眼底病,提高网膜功能,控制

眼压。这一阶段又增加了几种药,有的是静脉输入的,有的是肌肉注射的,首长过去没有用过。这些虽是普通病人常用,但首长是第一次用。我和护士小杨就先在自己身上注射几次,无不良反应,再给首长用。这时,完全依靠南京军区总医院取药,静脉点滴都是由总医院每天派护士送药和输液的大液体来,因为那个年代输液反应较多,他们都是选给别的病人用过无输液反应的同一批号给我们。护士也是选静脉注射最好的。因为“文革”时期很乱,我怕药厂闹派性,工人不安心工作,药物质量不稳定。所以,有些药拿来后,我和小杨都自己试用后再给首长用。因为首长曾一度血糖高,还制定了每餐的主副食的定量,现在血糖、尿糖均正常。首长随身带来的护士小杨是北京301医院派给首长的特护,已经几个月了。他的任务是给首长服药,滴眼药,肌肉注射,饭前饭后扶首长散步,平时也伴随身边寸步不离。晚上刘帅由汪秘书照顾。

在南京我们的住处环境优美,离市区又远,我们很少去市中心,也不知外界的事。这对首长的病倒有好处。首长是一位忧国忧民的中央领导人,现在听不到不好的消息,精神就非常愉快。病情也有了明显的好转。视力提高了,眼前数指都能准确地说出,而我就逐渐地增加距离。最高兴的是,首长的光定位、色觉也在恢复。当时我们没有镜片箱,没有带色的玻璃片,我用各种颜色的花给首长试色觉。我采了红色、黄色、白色的花和绿叶拿在首长眼前请他看。刚开始时,首长看不见,以后逐渐的能分辨出红色、黄色、白色、绿色,以后又能看出粉红和深红。夫人汪秘书和护士都来测首长的视力,为了检查首长视力进步的情况,我们逐渐把目标由近移远。比如我

们在客厅里,先是让他看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有几个人,他们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再坐远一点让他看。后来,坐到对面最远的沙发上,约3—4米远,首长也能看到是几个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饭后,我们就一起陪首长——由小杨和参谋两人扶着——散步,我们请首长看路边有没有花,花的颜色有哪几种。当时,南京的春色正浓,正值鲜花盛开,我们一路散步,一路测首长的视力,以后看到3—4米远就知道有花,是什么颜色的。每当首长说对了,首长和汪秘书都很高兴,我更是高兴,光定位和色觉不好,说明视神经和视网膜病变严重,现在光定位和色觉都正在恢复。如果经过1—2个月的治疗,色觉和光定位恢复正常,以后提高视力就有希望了。

首长病情好转很快,视力由眼前数指逐渐增加距离到二三米数指。当时我们没有视力表,认为在南京只是短暂的停留,等北京医院秩序好转就回北京。哪知“文革”这一运功,越来越乱。不久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也受到了冲击,许司令员怕首长在那里不安全,就劝我们离开南京。

动乱的黄浦江畔

首长和夫人汪秘书决定去上海。上海社会上



1945年,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中)、政治委员邓小平(左)、副司令员滕代远在一起

两派群众组织已经开始武斗,虽然毛主席一再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但仍是武斗不断。经过了解,上海华东医院(高干医院)秩序良好,不乱,还能正常上班。去上海,可以继续治疗,药物供应也有保障。于是,我们到了上海。

在上海我们住在市区,首长的孩子们和护士有空就去街上看大字报。他们看了就回来讲大字报的内容。有好几次,首长听到陈毅元帅、小平同志,还有其他很多中央领导和他所了解的战友、部下都受到冲击,他就开始沉默寡言,总是睡眠不好。他的原则性、组织性很强,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首长已经看到了“文革”的错误,但他不能讲,只好保持沉默,生闷气。青光眼最怕情绪波动,怕生气。我曾统计过原发性青光眼 300 多例,急性发作的原因 98% 是生气,情绪波动。眼科书上和临床经验也都是如此认为。首长第一次急性发作也是情绪波动,发作前视力 1.0,能正常工作,发作后视力急剧下降。因此,我向汪秘书提议:“请大家看了大字报不要回来讲内容,或者说没有到街上去,没有看大字报。”汪秘书就吩咐办公室的同志和孩子们,不要再讲大字报的内容了。可是首长关心国家大事,他们不讲,首长却让他们每天都去看大字报,回来后向他汇报。我就对他们说:“你们就避重就轻地说一些不惹首长生气的事。”有一次,他们无意间说起上海两派武斗,有一派斗另一派的人,用带钩的铁棍子,从肛门插进去,把肠子拉出来了。首长听后非常气愤地说:“简直是惨无人道。”大家看到首长如此生气,都很后悔,我也埋怨他们以后千万别再讲这些事,只讲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因为那一阶段首长思想上考虑的,都是“文革”的事,造成眼压增高,经常要用药物才能控制下来,视力进步也很慢,还时有波动。我很担心。

我觉得我的责任太重,虽然药物、治疗可以依靠华东医院,但是卫生部和上海卫生局的领导都“靠边站”了,什么情况都无法向领导汇报,大主意都要自己拿。于是,我向刘帅建议,成立一个治疗小组,人多可以集思广益,对首长治疗有利。我想请华东医院的内科主任和眼科的周诚济老专家,这两位专家过去都给首长会诊过,病情也了解。我还想请上海市第一医院的赵东生和五官科医院的郭秉宽两位眼科老专家。但这两位专家

因本院群众组织不同意,正受着冲击,被批斗。后来,我了解到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眼科奚寿增主任和何淑芳主治大夫,没有受到冲击。我建议请他们参加,首长和汪秘书都同意了我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成立了一个临时治疗小组。

有一次我和周诚济老专家、护士、参谋都陪着首长在高压氧仓内治疗,仓外的医护人员在开小组会,说话的声音很高。我们能听到声音,但听不清内容。首长说:“你们听,在开斗争会,在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当时我们在仓内的人,都仔细听,没有听到喊口号。我们告诉首长,他们在开小组会,没有开斗争会,也没有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但首长说:“我听到是在喊口号。”出高压仓后,我问开会的医护人员:“你们有没有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他们说:“我们开小组会,没有喊口号。”回到住处后,我反复考虑,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幻听”?我向汪秘书汇报了在仓内发生的情况,并建议马上请华东医院内科主任来会诊。内科主任来后我详细的介绍了在高压仓内的情况,主任给首长检查后,又问了一些情况。他说:“这叫错听,因为外边是有声音,而听错了。外边没有声音而听到,才诊断为幻听。错听的原因是精神紧张,思考‘文革’的事太多,睡眠不好。首长有老年性糖尿病,神经易紧张和兴奋,服点镇静药就会好。”服药后就没有再出现错听情况。

在上海,首长视力是有进步,但不如在南京时快,还有反复。有一天护士小杨告诉我首长在房间里,能自己从床边走到沙发边。有一次,小杨有事不在首长身边,首长自己从床边走到卫生间,小杨回来后看到首长自己在卫生间,又惊又喜,小杨说这是几年来从来没有的事。还有几次,在大客厅里,从这一沙发走到对面沙发去,自己走了三四米远,中间还隔着二个茶几。

我们还是没有视力表,还是不能查视力。我建议买一个视力表,跟首长多年的参谋说:“首长不会同意的,他不愿让组织多花钱,不愿搞特殊。”首长也不愿麻烦当地领导,也不愿我们去借。他也不愿意去医院查视力,因为若出去,要先由上海市委联系医院,市委还要派人、派车保护。首长不愿麻烦他们。首长还不喜欢查视力表,汪秘书也怕查的视力不理想会影响首长的情绪。大

家都有临时思想,认为北京秩序很快就能好转,就能回北京了。这样,视力是否进步只能由大家看日常生活中行动而定。

返回北京

在上海住了几个月,了解到北京医院还是乱,但解放军301医院已经划出了一个楼,经装修后,专给中央首长治疗、住院用。现在有几位老师已在那里治病,夫人汪秘书和首长商量后,决定回北京。在1967年秋回到了北京。

到北京后,汪秘书和参谋马上与解放军301医院联系好治疗的有关事项,并在301医院给刘帅在中央首长专用病区安排了一个病房。首长还是住在家里。凡是首长用药或是注射器等用品,我只要开出处方,护士就到301医院去取。需要静脉点滴时,我们就事先通知301医院,乘车去。

住北京,首长的生活很平静,外界的事大家都尽量不向首长汇报。首长每天由秘书或参谋给他读中央文件。首长除了每天治疗,生活回到了以前有规律的情况。因此眼压还正常,病情也有好转,视力在5米距离可以看到手指,数的非常准确。不久,北京医院也恢复了正常秩序,首长以前的内科保健医生,也定时来检查首长的身体健康情况,我感到有内科医生我就更放心了。但首长仍然不愿到301医院眼科去检查,更不愿到北京医院眼科去检查,他只要我一人给他治疗。首长对我的信任,使我非常感动。

这时,首长每天还听秘书和参谋读报,读文件。但是,由于外界的形势混乱不止,我感觉首长郁闷不安。他常常呆坐着,不知想什么,他沉默了,谈笑风生已不再见了。有时,稍不如意就向孩子发火。我知道,他是在为“文革”担忧。有一次我问首长:“造反派这样造谣诬陷,陷害好同志,这么多领导人被打倒,社会秩序这么乱,毛主席知道不知道?”他说:“毛主席这么忙,具体事情他不可能知道。”首长就不再说了,我也不好多问,又不好劝慰他。首长是一位非常正义、刚正不阿又很重情谊的老革命家。他看到他的老战友、好朋友有的被打倒,有的被批斗,他了解他们都是好同志,是冤屈的。他气愤、他不平,但他又不能对任何人说。他一再教育他的孩子:要听党和

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跟毛主席走,不要犯错误。那时候我思想上问号很多,很多事情无法理解。最使我不能理解的是,斗争的对象是我们党的各级领导。我只是盼望,这运动快点结束。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国家的损失太大了,使我也忧心重重。

我真怀念南京笑语满堂、其乐融融的生活!我暗暗担忧,首长的情绪会加重他的糖尿病和影响全身健康状况,糖尿病可是一种不好治愈的病。我很担心首长的身体健康会受到影响。

告别刘帅

首长除了关心我生活外,还关心我的政治生活和工作。1968年8月,首长了解到山东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下面也在搞“三结合”,成立革委会,把以前的领导结合进去。武斗也平息了。首长怕我长期在外,不利于结合到领导班子里;最近病情稳定,眼压正常,视力稳定在0.1(5米距离数指);解放军301医院眼科秩序也很好。首长怕影响我将来的工作,就找我谈,让我把工作和治疗方案向301医院眼科尹主任交代一下。首长考虑在“文革”最乱时期我走了,怕群众组织说我逃避运动而为难我,嘱咐参谋与山东省革委会和济南市我的领导联系。1968年8月7日,从总参派了一个参谋送我回来,又写了一封感谢信,送给我院革委会,内容是我在做首长保健工作时,工作好,有成绩,表扬我。又说视力有进步,表示感谢。由于首长细致的安排,使我平安的回到医院工作,上班后群众组织也没有为难我。首长和汪秘书想的非常周到,对我的关怀无微不至。临走的前一天,首长和汪秘书请我吃饭。上车前汪秘书抱着一个大西瓜,让我在路上解渴。他们的热情、体贴和关怀,使我深感两位老革命家对年轻同志的深厚的阶级感情。

我没想到,从此一别,我再也见不到我最敬佩的刘伯承元帅!但回忆往事,仍历历如在眼前,刘帅虽去世多年,我常怀念他!

(责任编辑 萧 徐)



渡江战役前夕的危险旅途

● 张惠卿

1949年2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以后,苏北地区除少数沿江地段外,已全部解放。我人民解放军像无数支铁流,浩浩荡荡开向江边集结,准备渡江。国民党妄想依靠长江“天堑”作垂死挣扎,封锁了长江的全部口岸,堵死了两岸交通渠道,一些炮艇和巡逻艇日夜在江面上游弋巡视,发现有偷渡的船只就当场击沉,人员亦格杀勿论,只留下一条从镇江到对岸六圩的通道,每天有轮渡来回,许多人称“跑单帮”的小贩、客商络绎不绝地来往其中间,在国统区和解放区两边往返贩运货物赚钱。

当时地处江北的镇江对岸的六圩、瓜洲地区还在国民党军队控制之下,这些单帮客从镇江过江后,经过六圩码头国民党检查哨的检查,实际上是每个人都交了“买路钱”,放行以后国民党就不管了。但要进入解放区还得通过一道封锁线,即两不管地段,老百姓称之为“阴阳界”。那里埋了不少地雷,不小心踩上了就得送命。但这些商贩都熟悉路径,七绕八弯,大约走七八里地,就可进入解放了的扬州市郊,有解放军的岗哨在那里。我们当时在上海要去解放区的同志,也往往装作跑单帮的客商,混在他们中间过江进入解放区。

我当时是上海地下党的一名交通员,在3月初曾受命带领六名国民党投奔我党的空军人员从这条渠道进入了苏北解放区。但当我们经过扬州刚到达目的地淮阴附近的中共中央华中局所在地时,就听说国民党当局停开了轮渡,把这惟一的通道也封住了。我在完成这次交通任务后,潜回到瓜洲江边,借住在一个农户家里,直等到了月底,才随着滞留在江北岸的大批单帮客一起被遣送过江。我立即回到上海向组织复命,但这条去解放区的通道已无法使用了。

公开过江已不可能,只有偷渡。开始国民党海军有些炮艇还可以“带黄鱼”,即把人藏在炮艇里夹带过江,一人交15块大洋(银元),据说“生意”还相当“红火”。后来被他们的上级知道了,大为震怒,严加禁止,宣布一经发现,就格杀勿论。

于是那些神通广大的单帮客商又开辟了一条从崇明岛中转的通道。崇明岛在上海的东北端,位于长江出海口的正中,那时还是国民党统治区,但长江北岸包括所有沿江地区都已在解放军控制之下。到崇明岛必须乘船经过吴淞口,那里有个稽查站,每人交两块银元即可放行,已成惯例。船只名义上是去崇明岛,到崇明岛后先靠在岛的南边,到了夜里就悄悄地把船转移到北边,对江就是已解放的南通青龙港地区,江面很窄,等到半夜天黑避开巡逻艇,只要十来分钟就可以偷渡过去,靠岸就是解放区,几乎万无一失。

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地下党员叶云同志,他当时在一家和南通、崇明都有交易来往的商行当职员,熟悉一些冒险

跑这条航道的船夫。我从苏北回到上海后,组织上又急需送一批学生代表去解放区参加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他们共六个人,我就是通过叶云的关系从这条通道把他们平安地送进了苏北解放区,然后转去华北解放区,这是4月初的事。

过了两三天,当组织上知道这条通道没有任何变化以后,我的领导人王锡珍同志(他当时是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化名陈约珥)通知我,说还要送一批台湾同志过江,这几位同志都是党员,有的刚从台湾过来,是十分难得的革命同志,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并说,他已经告知杨孟亮和我一起负责此事,由他和他们接头联系;还说,他们现在的住处台湾旅沪同乡会似乎已引起特务注意,另外,他们中有人还要去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所以必须尽快把他们送去解放区。他要我马上和叶云联系,找到一条可靠的船只。

杨孟亮和我是多年的老战友,又曾是一起在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学习的老同学,彼此十分熟悉,现在都由王锡珍同志单线领导。老杨在南京路一家犹太人开设的马尔斯咖啡馆当侍者,这家咖啡馆也就成了我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前不久,他还协助另一位同志胜利完成了炸毁国民党江湾军火库的任务。这次他已按王锡珍同志的指示去台湾同乡会和那里我党联络站的负责人周青同志(当时我们只知道他叫老周,公开身份是台湾同乡会的工作人员。他解放后长期从事对台工作,是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接上了头,周告诉杨,要走的共七个人。他们都是参加过台湾1947年“二·二八”起义的同志,因在台湾站不住脚而来到上海隐蔽的,有的人还是从国民党的监狱里跑出来的。

我和叶云联系后,叶云说,他们商行正好

有一条船刚从南通来,已卸完货,正要空船回南通去。船老大他熟悉,很可靠,也很老练。现在船就泊在吴淞镇上,随时可以起程。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我请叶云立即找船老大商量,搭七个人去南通,把他们安全送到解放区。叶云当天就去和船老大谈妥了,商定船钱25块银元,另外在经过吴淞口稽查站时每人要交的两块银元“买路钱”,共39块。

我向王锡珍同志汇报后,王当机立断,决定第二天就走。但他又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妥善安排,保证这七个同志的安全。他说,不冒一点险当然不可能,但只要设想好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的应对办法,也就可以化险为夷。当天晚上,他就通过杨孟亮把39枚银元带给我们。

第二天中午在约定时间,杨孟亮、叶云和我在闸北宝山路去吴淞镇的小火车站上将和这七位同志见面,准备一起搭下午的小火车去吴淞镇,送他们下船。

在车站外的一个饭摊旁边,我们见到了等候在那里的周青同志。老杨迎上前去,周把他身边的一个年轻人介绍给杨,说这是领队老陈,说完他就离开了。

老陈穿着一身黑色的中山服,显得相当干



原上海地下党战友欢送叶云夫妇赴四川工作,1949年12月摄于上海。前排(左起):吕林、叶云、孙慧敏、何慢;后排(左起):杨孟亮、严抚夷、张惠卿

练。看得出曾饱经风霜(后来我们知道,他叫陈炳基,当时只有22岁。他和周青等同志都是台湾“二·二八”运动的主要参加者和见证人,解放后曾任台盟总部办公室主任、台盟北京市主任委员),我们用紧紧握手表达了相互的情意。

陈炳基带着我们到站台上同另外六位同志见面时,场面是很动人的。谁都不说一句话,他们一个个含着亲切的微笑望着我们,我们也深情地用眼神向他们致意。在当时上海这样一个特务横行、白色恐怖猖獗的黑暗世界,一下子见到那么多“自己人”,特别都是远从台湾来的同志,我简直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和兴奋,恨不得跨上前去紧紧地拥抱他们。

可是,我突然产生了一个重大的忧虑,因为他们的脸型、相貌十分引人注目,有两位一看完全像是日本人,穿的又都是破旧的西装。我还注意到有个同志的皮鞋裂了个大口子,袜子也是破的,脚趾头都露出来了。有位年近五十的老同志(我后来知道他是著名的台湾老中医李乔松)却像个南洋华侨。这哪是什么“跑单帮”的客商,倒活像是一群穷途潦倒,流落在十里洋场的海外侨胞。更糟糕的是,除了陈炳基和另一位年轻同志外,其余五人全都不会讲国语(普通话),只会讲闽南话和日语。七张护身符——国民身份证,只有一张是真的,其他六张全是假货。这六张假身份证正是杨孟亮从我们一位在南市区当户籍警察的老同学、地下党员严抚夷同志那里搞到的空白身份证,交给组织上填写好以后,不知由哪位同志精心刻制了一枚假图章盖上,尽管比较逼真,但同真的一对比,却显得略小,一般军警虽不易发现,但经不起专门机关的检查。

这一系列新情况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可能根本没有想到,目前我们又无法向领导请示,何况时间也不容许这样做了。

怎么办?要不要改变整个行动计划?但是如果不走,他们已无退路,再回原地很可能出事,以后要走,也就不可能找到这样一条可靠的船,偷渡路线也会发生变化。但如果仍按原计划走,万一遇到查问,如何应对?必须充分估计到他们的相貌、衣着、语言、身份证等等可能引起的麻烦,甚至危险。

我们三个人加上陈炳基同志在站台的一个

角落里紧张地交换意见,商议对策,幸好离开车还有一段时间。陈炳基坚决要求走,不同意改变原定的行动计划,说他们可以见机行事。我们也考虑以不改变计划为好,只要闯过吴淞口稽查站这一关,就不会有问题了。于是研究具体对策:身份证的问题只要不碰到特殊情况,可以混得过去;语言不通,只好不开口,让会讲国语的两个同志出来应付,不过得把原定的互不相识、偶尔同舟关系改为结伴同行;相貌、衣着是个难题,也最关紧要,只有将计就计,承认都是台湾人,声称原都是在海外经商,以后回国在内地折了本钱,流落在上海,别无生计,只有靠贩运糊口,这次是听说崇明的豆饼便宜,在叶云所在的那家商行的介绍下,共同雇了这条船去崇明贩豆饼到上海卖的,想挣点钱好回台湾。叶云把崇明镇上几家油坊的地点、老板姓名等等告诉陈炳基,并要他转告大家牢牢记住,不管碰到什么情况,就一口咬定是去崇明贩豆饼的。

陈炳基把这些应对办法传达给其他六个同志后,得到他们的一致赞同。这样,我们就一起登上小火车,到达了吴淞车站。

在从吴淞车站到吴淞镇的路上,我们看到国民党军队在镇的周围增设了许多工事,气氛显得很寻常。在进镇口的大桥上又发现新设了岗哨,搜查进出的行人并验看身份证,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一天是蒋介石要去吴淞口视察,故警卫特别森严。想到我们中间有六张假身份证,大家不免有点紧张。这时,因火车刚到,进镇的人很多。我们对桥上的情况作了一番观察,决定要叶云带着他们七人在附近等着,我和老杨当尖兵先去试探一下,根据试探结果,他们再行动。我们两人走到桥上,被搜身后,岗哨对我们的“国民身份证”只溜了一眼就放行了。我和老杨交换了一下眼色,向桥那边发出了“可以进来”的信号。只见他们八个人拉开了距离,叶云在前,陈炳基殿后,夹在一些人中间,一个一个走到了桥上。我望着他们,几乎屏住了气息,心紧张得剧烈跳动着。但是一切顺利,两张真身份证,六张假身份证一起通行无阻。

在镇中心的一家茶馆里,我们找到了船老大。他说一切都准备好了,明天一大早就可出口。我们担心这几天出境的情况是否有变化,他说还

是那样,通过不会有问题。叶云把船钱和“买路钱”都交给他,并一再交待他照顾配合,如受盘问,咬定船去崇明装豆饼后再回上海,这七个人是包他船的豆饼客人。

在河边,我们和陈炳基他们反复考虑还有什么漏洞和设想得不周到的地方,最后大家确认一切都妥善了,就送他们七个人下船,船上除船老大外,还有他一个十四五岁的儿子当帮手。

已经是傍晚时分了,西天一抹火红的晚霞正在逐渐暗淡下去,天色开始朦胧起来。船老大把船启动了,准备泊到靠出口处的小湾里过夜,以便第二天凌晨出吴淞口。我们三个人站在岸边,目送着他们渐渐远去。

归途中,天黑下来了。初春的晚风吹在身上感到阵阵凉意,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我心里想,明晚只要也是这样的天色,他们很快就能踏上解放了的土地,这些一向处在白区环境中的亲爱的同志,是多么热切盼望呼吸解放区自由的新鲜空气呀!

但是对于这次行动的担心和顾虑,始终像一块石头那样压在我的胸上。列车忽隆忽隆地向上海市区奔驰着。我的心却依然悬在这条船上。党组织的一再嘱咐,这七个同志热情的神态,对我们无限信任的亲切的笑容,一直在我的脑际萦绕着,我感到肩负的责任无限沉重。显然,杨孟亮和叶云也在想着同样的心事,一路上我们都沉默着,谁也没有打扰谁,谁的心弦都是紧绷着的。分手时,我们约好明天晚饭后在我的住处碰面,交换情况。

回来后,我躺在床上辗转不能成眠,索性起来看书。但书又看不进去……天破晓了,我想象着那条船正在向吴淞口驶去,稽查站,国民党宪警的可憎的嘴脸,盘问,七个同志令人担心的外貌、身份证……

下午5点钟光景,还不到约定时间,叶云突然气急败坏地冲进了我的房间。

“出了什么事?!”我忽啦地站了起来,还没等他喘过气来,就

着急地问。

“船老大的儿子刚才跑来找我,说他们的船今天早上出吴淞口时被稽查站扣留了……七个人连他父亲一起都被带到警备司令部去了,到现在还不知道一点消息……看来问题相当严重!”叶云断断续续说出了这个可怕的消息。

像一个晴天霹雳,我几乎惊呆了!警备司令部,汤恩伯的淞沪警备司令部?这是老虎口呀!为什么把他们带到那里去?这样的事情怎么发生的?难道被发现了什么可疑的行迹,还是六张假身份证出了毛病?仅仅是因为外貌已被国民党特务注意,会不会……我愈想愈着急,愈想愈感到问题的极端严重性。

我立即打电话把杨孟亮找来,这个凶讯同样也使他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谁也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糟糕的局面,这个重大事故超出了我们原来最坏的估计。必须尽快把这个情况报告给组织,迅速设法营救。时间拖得越久,对他们生命的威胁将越大。可是党组织在哪里?我们和王锡珍约定联系的时间还没有到,根本无法找到他。

我们心如火焚,焦急万分,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进行垂死挣扎,疯狂地加紧了他们的白色恐怖,上海的特务机关正在变本加厉地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七个同志的行迹只要稍一暴露,一切就将无法挽救!在这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什么可怕的事情



1976年2月,陈炳基、杨孟亮、张惠卿(左起)摄于天安门广场

都有可能发生。我悔恨交加,深责自己为什么在发现他们的外貌如此引人注目之后,不坚决改变行动计划。党信任我,把这样责任重大的任务交托给我,可是我非但没有完成任务,反而把这些同志送进了虎口。如果他们牺牲了,我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我一生中从来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痛苦的时刻,杨、叶的心情和我一样,每过一分钟,我们心头的重压和苦痛就增加一分。只要有可能,我们宁愿牺牲自己,也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

但是,我们找不到营救他们的办法,想通过叶云的商行设法保释他们,但叶云是个小职员,作不了主,估计他商行的老板也不会同意,弄不好反而坏事,这一步行不通。另外,我们还需要从船老大的儿子那里了解他们所以被扣留的具体细节。因为叶云当时十分着急,没有顾得上问清详细情况,就赶来告诉了我。所以只能等到天亮再分头行动。

已经到了半夜,老杨焦虑得实在忍受不住了,提出要到台湾同乡会去看一下动静,也许能了解到什么线索。从那里还能设法找到周青同志,通过他再找到党组织。我不同意他去,因为深更半夜闯到那里去太危险了,说不定特务正在那里守着。但他坚持要去,我和叶云都无法说服他,他把自身的安危已置之度外了。我最后只好同意他去,要他小心谨慎,见机行事,看看就回来。

一个多钟头以后,老杨一无所得地回来了。那里什么动静都没有。我们三人面面相觑地熬到了破晓时分,谁也没有睡意。一夜间,三个人都像生了一场大病,两颊明显地消瘦了,脸色都很难看。老杨决定再去一次台湾同乡会,我没有阻止他,也不抱任何希望。我不知他能不能找到周青同志,我无法想像当周得知这个噩耗后将有什么反应!我陷入了自责,精神几乎快崩溃了!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天已经大亮,杨孟亮还没有回来。我和叶云正担心他是否会出事,他忽然跑步回来,高兴地告诉我们一个天大的喜讯:他们全部脱险了!

原来杨孟亮刚才在那边找到了周青,周告诉他这七位同志昨天下午就已经脱险回到了市区。在周的指引下,老杨随即又到另一个地方和陈炳基见了面,知道了他们这场惊险的经历。

本来这条船像往常一样,经过稽查站时,船老大给他们每人交了两块银元的“买路钱”,已经准备放行了。有个稽查人员忽然发现他们相貌奇特,产生了怀疑。首先盘问了李乔松这位老同志:你是什么地方人,叫什么名字,要到哪里去?李听不懂,也答不上来,陈炳基只好代他回答;又问了另一个同志,又答不上来,又是陈来代答。一连问了四个人,都是这样,把这个家伙惹火了,喝道:“你们究竟是什么人?这船是到‘匪区’去的,你们知道吗?”陈炳基装作吃惊地说:“这怎么可能?!我们都是台湾的生意人,是去崇明贩豆饼的,根本不知道什么‘匪区’,不信你可问船老大”。那人说:“什么豆饼不豆饼,你们都是共产党,统统跟我走,到司令部去!”

船老大过来替他们解释,挨了一记耳光,说他通“匪”。于是把船扣了,把他们七个人连同船老大一起押到港口司令部,关在一间拘留室里。船老大的儿子是后来从船上溜出来,辗转找到了叶云报的信,把“港口司令部”说成了“警备司令部”。

来审问他们的是一个睡眼惺忪的值班军官,样子很凶,连吓带骗,要他们承认是共产党。他们都很沉着,一再声称,他们是“落难的侨商”,这次就是去崇明贩豆饼,打算挣点钱好回台湾,根本不知道其他什么事。陈炳基按照我们预先商定的答话讲得有根有据,加上他们这些人的这副外表和神态,这位军官要把他们和共产党挂上钩确实不太容易,船老大也配合得很好,使他问不出什么头绪,最后把他们的几张身份证翻来覆去看了好久,不再吱声,拿着走到后面去了,足足有两个多小时不出来,把他们撇在那里干着急。

他们用台语彼此交换了意见,从目前情况看,敌人并未发现他们什么问题,但可能对身份证产生了怀疑,这也十分危险,万一深究下去,把他们交给特务机关就糟了。他们作好了最坏的准备,相互约定,在任何情况下,宁愿牺牲自己,也决不说出真相,只要他们的真实身份不暴露,就有逃脱的希望。

后来他们才发现,这位军官老爷大概因为没有睡醒,跑到里面睡大觉去了,根本不是去检查他们的身份证。他出来以后,态度反而缓和了一些,把身份证掷还给他们,口气严厉地把他们训

斥了一顿,说什么“这条船肯定是到‘匪区’去的,不过念你们是初犯,上了别人的当,这次饶了你们,都给我滚回去!”那位会讲国语的年轻同志大胆问了一句:“我们还能去崇明吗?”因为他心想,如果侥幸能让他们“滚回”船上,岂不依旧可以过江。不想那家伙恶狠狠地吼了起来:“你们从哪里来就滚回哪里去!不准再搭船。下次再碰到就对你们不客气了!”陈炳基赶紧示意大家开溜。结果是每人两元的“买路钱”白丢了不算,交给船老大的25枚银元也被“充公”,落进了这些家伙的腰包。船老大在他们七人被释放后不久也被放了出来。

他们就这样脱险回到了市区,为了不被人发现,他们没有再回到台湾同乡会,而由陈炳基告知了周青同志,周在向组织汇报后,立即给他们另行安排了住处。真是一场虚惊,把我们快急疯了。

实际上,国民党的这个稽查站是明明知道这些船只的去向的,无非是跑单帮在两边贩货的商人。一人两块银元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他们一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这条路线至今从未出过事。而这一次这七个同志实在太不寻常,我们担心的事才终于发生了。但是他们都很冷静沉着,应付得体,也幸好我们事先作了准备,当时国民党已日暮途穷,人心涣散,一些人无非想捞几个钱,看到这批“穷华侨”没有多少油水,也就不感兴趣,放走了事,使他们侥幸逃过了这场劫难。

隔了一天,在约定时间我见到了王锡珍同志,他说情况都已经知道了。他没有责备我,反而安慰我,要我放心,说他们现在都很安全,组织上暂时先把他们分散隐蔽起来,再设法送他们走。

(上接第80页)坏矣。”其实,时尚之兴,出于倡家,自古皆然。只要女人没有或不愿改变以色列人的地位,这情形就不会改变,同道德、元气,无甚相干。倒是从中或可略窥妇女地位的浮沉。

今天,娼妓转入地下,取代而引领时尚的往往是经常出现于银幕或荧屏的另一类人物。而推动时尚的,除了以色列人的社会存在,又加上了商业生意的需要。各种推动时尚的选美活动或时装大赛之类,在前台的因种种炒作而抬高了身价,此后可以待价而沽;在后台的则借此推销产品,随后大赚其钱,只有真以为这是风雅时尚、起而

又笑着说:“好险呀!国民党老爷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把他们当成七个‘洋装瘪三’了。”

我说,主要是他们的相貌、语言和内地人不一样,台湾人的特征太明显,很令人瞩目,要混过去相当困难。王锡珍同志和我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分析,要再送他们去解放区已不可能,如去浙东游击区,也要过几道关卡,难度较大,而据我了解,我们设在那里的交通站已多次遭到敌人的破坏,有的交通员也牺牲了。这条路线已成险途,决不能让他们再去冒险。只有去浦东游击区比较安全,因为去那里可以避开国民党的哨卡,只要过黄浦江时不去搭公家的轮渡,在十六铺外滩附近有许多私人的小舢板(小划子),可以雇他们载你过江,一次三五个人,等于偷渡,但无人阻拦,不受注意。过江后在约定地点就有我们的秘密交通员接应带路。杨孟亮前不久就曾通过这条路线送过人,相当稳妥。但七个人一起走目标太大,容易暴露,最好分批行动。

几天后,陈炳基和另一位叫林青山的同志(解放后曾任台盟福建省主任委员)两人作为第一批,在杨孟亮同志的安排下,被安全地送进了浦东南汇大团镇附近的我游击队驻地,成了两名游击战士。其他五位同志因当时形势发展很快,渡江战役即将开始,组织上考虑他们在上海就地隐蔽还比较安全,就没有再送出去。

4月21日,渡江战役打响了。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蒋家王朝反革命统治的彻底覆灭。一个多月后,上海解放,这七位台湾同志又会合在一起,很快都投身到了为争取全国胜利的革命洪流之中。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效尤的,才是最后买单的顾客。她们支撑着时尚,却永远赶不上时尚,因为等到她们也“时尚”的时候,那东西已不成其为时尚了。

前台的赚了,后台的发了,跟潮的赔了,鼓吹时尚的传媒从中分了一杯羹且毫无风险。这便是现代时尚的经济原则,也是为什么时尚云涌的原因。信不信由你。

诗曰:

塑体瘦身新样方,唐装着罢换霓裳。
任君跟得如蓬转,空解珠囊无孟姜。

我的引路人 ——姑母刘静君

● 刘导生

我的青少年时期,可以说是在姑母刘静君的庇护、熏陶指引下成长的,为我最后走上革命道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打下了基础。

我的姑母原名刘静君(1890—1971年),到抗日根据地后,改名刘仁,建国后又恢复原名,江苏丰县人,为当地一个小有名声的书香人家。我的曾祖父饱学诗书经史,姑母姊妹四人。她的三个姐姐均遵守封建礼教,陆续出嫁。惟独四姑少有壮志,酷爱读书,并以其聪颖、好学,且能出口成章,受到祖父青睐,遂亲自教她读四书五经。这样,更促进她的刻苦努力,以至在祖母夜晚打牌时,也不放弃借着萤萤灯光啃着家里能找到的书。其用心之专注,可见一斑。

曾祖父母、祖父母均去世后,轮到叔祖父成为一家之长。其时,姑母年已过廿,渴望离家入正式学校读书,以求独立人生。及至请求叔祖父恩准时,遭到坚拒。囿于封建礼教,他竟然说:如果是我的女儿,宁可叫她去死,也不能让她出去读书,败坏家风!

这时,恰好我的叔父刘尔孟(字峰亭),准备赴南京报考师范,并想借机帮助姑母冲破家庭封锁,同赴南京报考女子师范。乃设法以走亲戚为名,骗取家长信任得以离家出走。至南京应试后,居然为南京女子师范录取。四年后毕业,受聘于沛县女子学校。原本徐州亦有女子学校请她去任教,但她顾念故里,执意在家乡促进女子进学堂的新风气。数年后“五四”运动爆发,全国掀起要科学、要民主的热潮,姑母发表文章反对女子缠足,提倡女子剪发,率先喊出妇女解放的呼声。可谓反对旧礼教、封建旧思想的先驱。

由于姑母坚持个人奋斗,拒绝家庭干涉其婚

姻,故成婚很晚,年及30才由沛县女子学校同事李亚兰介绍

其弟李亚仙。结识后姑母赏其文才,思想先进,本已心许;后经我叔父刘尔孟首肯(聊为家长同意之意),结为伉俪。李亚仙系自学成才,从事报业,笔锋犀利,文采风流。婚后携姑母辗转上海等地而后到北平。姑母仍不忘学习夙愿,遂考入北京大学为旁听生(当时北大不收女生,只收旁听女生)。北大名师甚多,姑母独尊守常先生(李大钊号),常过往求教,师生情谊颇深,受到其革命影响不少。这期间,姑母和男同学王统照等人编辑进步刊物《曙光》杂志,并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李亚仙曾在河南担任过项城县县长,听姑母讲该县是一贫困县,在袁世凯称帝时,该县县长以项城县系袁家乡为口实,呈书上司,申请将三等县改为一等县,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李不顾自己的名誉、地位、待遇为民请命,又将一等县改为三等县。这件事得到姑母的支持与赏识。

姑母以后发现李思想日渐落后,与姑母分歧加深,终因娶妾而分居。姑母携三幼子女,和一感情很好的奶妈择香山而居,以毛遂自荐方式,给香山慈幼院院长熊希龄写信求职,以其文学修养卓越,被聘为慈幼院女子师范部国文教员,毅然与旧社会多妻制传统宣战,保持女性人格尊严,实属难能可贵。

香山慈幼院院长熊希龄曾任北洋政府总理,因不满袁世凯辞职,退而办理慈善事业。该院靠



刘静君

照片背面题字:亲爱的卓侄!快三个月没有面谈了。知识上,情感上都感着苦闷已极,看!憔悴多了。静君

向海外华侨和社会各界人士募款维持。专收穷苦孤儿,也收少量自费生。姑母不忍看着我在家乡失学,设法写信叫我到北平读书。于是我随一位叔祖父去平,住在姑母家温习功课,以备考试。

姑母为我找到一位她的学生、地下党员胡玉升(男,后名胡健)负责为我补习功课,并侧重英语、代数,同时启发我对革命的认识,做着进步思想启蒙的工作。胡当时已是师范大学的学生,每周末回香山时给我补课就在他家就餐,增加了姑母的经济负担。每月几十块钱的收入,本已够紧张,她从来都把我当成亲生骨肉,关怀备至。闲时,总是亲切地说古道今,给我许多无形的教育。

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李大钊同志被反动军阀张作霖抓走,同时被抓的还有廿多位负重要责任的党员。大钊同志被处以绞刑,其他27位同志都被枪杀。这是1927年4月28日,也正是同年冬我到达北平的。每提起这段悲惨往事,姑母总是泪如雨下。

我曾经见到过大钊同志临刑前的照片,看到他只穿一件布棉袍。当时教授的薪金不菲,其他教授大多西装革履,冬天起码也穿一件湖绉的丝棉袍子或讲究的皮大衣。可以看出,李大钊为了革命事业,经济上并不宽裕。姑母正是学习和继承了这种美德。我的家乡经她拉扯出来的甥侄男女,不下十数人。

大钊同志牺牲六七年后,夫人赵氏也相继去世。姑母想到他的子女无人照顾,于是把从家乡带来的一位饱受丈夫虐待的堂弟媳,介绍到他家照顾姐弟四人。大钊的大女儿李星华考入中法大学后,感到靠业余时间北大刻蜡版所得到的微薄收入维持全家生活十分艰难,便请姑母安排她的三个弟妹,姑母就和好友刘清扬(与丈夫张申府同为在法国留学的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相商,清扬与通州女师校长李云章相识,就请求她将大钊二女炎华送到通州女师读书,小五、小六由姑母转请熊希龄院长收容入学。熊院长在白色恐怖下能救助掩护烈士遗孤,使之继承革命遗志,也是为革命立了一大功。

当时,由于我年幼无知,只能了解姑母是一位仁爱正义和同情革命的志士仁人,而不知道她当时就已是慈幼院中共支部的一名地下党员,直到建国后才了解她的庐山真面目。

1928年,我接到同学由南京寄来的《中山全书》,读后大开眼界,接受中山先生的民族、民主思想和宏伟的建国方略。这时,姑母介绍我阅读日本进步学者宫崎寅藏所著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中译本,新近出版的书名改为《三十年的梦》),使我认识孙中山确实为中国革命的先驱,为反帝反封建创设一个新中国指出一条道路。可是不久,我看到广东出版的画报上刊载的国民党大批屠杀共产党人的照片,才知道新军阀混战又起,军阀割据,中国依然没有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命运。事实对我的教育是深刻的,我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所以,1929、1930年,我毅然加入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和共青团。

1930年后,姑母任北平市社会局妇女儿童救济院院长,又移居北平,比较多的时间是失业。1929年我考入师大男附中时,仍与姑母同住。

1929年8月1日是国际反帝日,“反帝大同盟”举行游行示威,我参加了游行。当时由师大列队出来,行进至南新华街时砸了国民党区党部。由于汪(精卫)阎(锡山)联合反蒋(介石),禁止集会结社,我们这批青年60人左右全部被捕。姑母听说后心急如焚,多方奔走营救,辗转托人,最后才找到国民党的名人熊观民、邹鲁,介绍到北平市公安局和警备司令楚溪纯,说明我年幼(才17岁)被误捕,请求准予接见和释放。他给市公安局长打了电话,说情优待,并同意接见。

姑母来到公安局接待室探视我,哭泣着问我:“他们说你已经承认是共产党人,游行时喊口号跳得最高。”我一听便猜想敌人耍了阴谋。我只承认到师大附中为朋友去要招生简章,在返回的路上被误捕的。这时,我已注意到接待室的另一端有一窗口有警察监视,我即从容地声称,我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只因从附中返回时,碰上游行队伍,被他们误抓来的。其实,姑母也已识破敌人以优待为名,企图诈出我的真实口供。由于我们的机警应对,敌人的妄想破灭了。

我们被捕的全体同志由公安局转押北平警备区监狱,关了五十多天。由于我年轻,且姑母托了人,因此未曾受刑。加之汪、阎反蒋失败,阎锡山仓皇逃跑,我们也就都被无条件取保候审放了。

另一次使姑母虚惊一场的是为李大钊同志送殡。1933年4月23日,由党的外围组织“革命

互济会”筹备,公开为李大钊同志送殡,出面是一批北大知名教授,如蒋梦麟、胡适等出任筹委。革命师生和民主人士一同送的挽联布满宣武门外浙寺全院(由于大钊同志身后并无积蓄,无力举葬,故牺牲后停柩于此达六年之久)。一般都是歌颂领袖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荣牺牲的。送殡时,大队革命青年和大钊同志的亲友在西单举行公祭,然后抬灵继续前进。在接近西四牌楼时,遭到国民党专门反共的宪兵三团机枪扫射,把队伍冲散,这时姑母正和大钊同志的夫人同坐在一辆马车上为前导,因为是亲属才得以顺利通过,直送万安公墓。因我至晚未归,姑母一时焦虑不安,正设法营救,深夜我回来了,她才安下心来。

更幸运的是,为大钊同志立的墓碑事前由专人直送万安公墓,恐遭敌人破坏,乃埋于墓穴内,解放后为大钊移葬时,发现这块墓碑的书写者,正是借住在姑母家我的中学同学赫智莹(即赫洵)。他的夫人何怡平在日寇占领北平后被捕为日寇杀害。他们夫妇和其他一些青年人,经常到姑母家聚集,姑母和她的婆母均热情接待。后来,我在姑母家的储物室里发现有“革命互济会”的印章及油印工具。我推断姑母家正是互济会的秘密机关,后经赫智莹证实,确是如此。姑母家虽生活不富裕,人来人往当然增加她的生活负担,但从没听到姑母有一句怨言。她为革命组织做了掩护工作,在白色恐怖下应是一大贡献。

早在卢沟桥事件爆发前,冯玉祥将军即发动了抗击日寇的古北口战役,这对全国人民是个极大的鼓舞。北平立即成立了华北各界抗日救国会,刘清扬担任秘书长。姑母也是积极参加者,做了许多抗日后援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姑母的甥侄男女云集她家,相商向何处去,至北平通车后,大家才各奔东西。

1937年春,我曾代表华北各界救国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于1936年2月,以代替共青团组织),到河南巡视救亡工作而被捕,须经审查,才能恢复党籍。抗战爆发后,我先到山西找北方局解决组织问题,因当时河南已划归长江局领导,我又转到武汉,代表民先驻武汉办事处,参加和国民党合作的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工作。当我找到长江局要求恢复组织关系时,得到的答复却是:现在兵荒马乱,干部调动频繁,无法解决组织

问题。正好,这时国民党下令解散武汉“青年救国团”、“义社”和“青协”等三团体。我当时毅然决定离开武汉,到敌后去打游击。经刘清扬介绍,我随国民党69军学兵队,由洛阳渡黄河进入敌人后方,经两个月的行军,到达山东沂蒙山区,找到中共山东省委。省委宣传部长孙陶林要我筹办《大众日报》,并任社长。1938年春,我派人到敌占区济南采购纸张、油墨,并写信给姑母要她带子女来鲁参加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我们约好见面的时间和地点,结果发生意外,采购员暴露身份而被捕。所幸姑母带着两个表妹等了多日,未接上头,只好返回北平。姑母并未气馁,继续千方百计寻找地下党组织。总算功夫不负苦心人,1939年夏,她终于找到了时任萧克将军领导下的挺进军宣传部长杨春圃,她被派到北平做地下工作。有了地下党的关系,姑母全力以赴地开展秘密工作,成为没有党籍的地下党员。我的同学赫洵在哈尔滨被日寇逮捕,受尽各种酷刑,仍无口供,感动当时敌寇狱中的防疫员赵公民,借消毒监狱之机,协助两位表现突出的共产党嫌犯(另一人为于树功),共同逃离日本监狱。赫、赵先后到达北平,投奔姑母。当时他们已是日本人的通缉要犯,姑母不顾全家安危,收容他们,并介绍给杨春圃同志审查一个多月。查明真相后,才介绍到平西抗日根据地。以后又通过组织青年读书会等活动,选择有觉悟的优秀青年介绍到解放区。先后不下数十人,后均成为负一定责任的革命干部。不久,姑母(因她已被敌人注意)奉地下党指示,要她全家速速离平,到平西根据地去。姑母以五十岁高龄到抗日根据地去打游击,恐怕也是知识妇女中少见的。由于她的特殊贡献和本身的学识,后成为晋察冀特约参议员。1944年组织上以保存干部的道理说服她,姑母才离开晋察冀到延安去。直到全国解放后,我和姑母才得以相见。经过几十年的战乱,大家能健康的相聚,欣喜之情可以想见。

我的一生,在幼年时期受到姑母母亲般的爱护和帮助;同时,我能有幸读完大学,早年参加革命,并将革命作为我的终身职业,她是我的引路人和保护人,这是我永志不忘的。

(2003年6月27日)

(责任编辑 萧 徐)

怀念我的哥哥叶笃义

● 方 实

我的哥哥叶笃义是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因病于2004年2月19日在北京逝世。

我们是一个有十几个兄弟姐妹的、非常和谐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他行三,我行九,他长我五岁。1934年,叶笃义在燕京大学毕业后,曾在天津一个政府部门工作。1935年爆发了“一二·九”运动。这时,笃义兄虽然不是在校的学生,但这个伟大的爱国运动对他的思想影响和政治触动还是很深远的。从这时起,他就立志忠心报国,矢志不移,全身心地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去。

从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到党的事业的追随者

笃义三哥是一天资聪颖、非常好学的人。1930年他在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被清华和燕京两所大学录取。他的自然科学功底很好,本来想到清华大学读物理系,如果去清华大学自然科学,他将来肯定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科学家。但因我的一个表哥在燕京大学读书,在他的撺掇下,笃义兄到了燕京大学政治系读书。从此,改变了他终生的事业方向。

燕京大学是后来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并因毛泽东那篇《别了,司徒雷登》而在中国闻名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创办的。虽然叶笃义在学校里学的是政治系,但那时却是个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埋头读书的好学生,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不过,这个专业的选择,使他对英美西方的政治制度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后能参与民盟的创建和工作,跟这样

的学习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另外,因为叶笃义优秀的学业,得到了校长司徒雷登的赏识,这既为他以后充当国共和谈的协调人之一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祸根。

1934年,叶笃义大学毕业后,正是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在我的两个哥哥叶笃庄和叶笃廉(即叶方,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下,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思想上开始倾向于革命事业。1936年,他与几个弟弟一起创办了宣传进步爱国思想的“知识书店”,这个书店实际上是天津中共地下党的一个掩护机关。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特务机关要对书店下手,首先得到消息的叶笃义只好停业躲避,书店被迫匆匆关门了。

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我在北平大学念书,积极参加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并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叶笃义非常支持我的革命行动。1935年九、十月间,我因在电车上读一本革命书籍(华岗著《1925-1927大革命史》)被宪兵逮捕。为了保释我,他四处寻找保人,使我获得释放。当时,我和天津学联联系较多。天津学联要召开秘密会议,我找到叶笃义,希望他在我们家里提供开会的场所,他愉快地答应了。他在客厅里布置了麻将桌作掩护。天津学联的两次会议都是在他的掩护下召开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天津先后沦陷,平津进步学生要转移南下抗日,因我的六哥叶笃廉是中共党员,在天津我们家里召开一次会议。“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李昌、蒋南翔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研究天津学生转移路线问题。叶笃义担负起掩护的责任。

如果说此前是出于对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

同情,那么 1938 年秋,叶笃义通过张东荪介绍,则与中共地下党员接上了关系,从此就成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热心追随者和参与者。

1938 年秋天,叶笃义随张东荪来到北平,同在沦陷区的中共地下党合作,开展抗日救国的工作。1943 年 6 月,叶笃义只身秘密前往山西太行解放区,与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参谋长滕代远会晤,共同商讨抗日救国合作事宜。7 月 7 日,叶笃义代表张东荪和彭德怀共同签署了“七七抗日协定”。随后,按照党的安排,在沦陷区开展抗日救亡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叶笃义在重庆加入民盟,并任中央委员。在这期间,他与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成员一道,参与国共和平谈判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密切合作,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反对内战。

1946 年 5 月,国民党挑起内战,进攻中原解放区,上海人民掀起了反内战的爱国高潮。6 月 23 日,组成了以马叙伦为团长的“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到南京去要求面见各方代表呼吁和平。国民党当局得知后,采取各种办法进行阻拦。叶笃义代表民盟到南京下关车站欢迎代表团。

进入车站发现异样后,尽管中共代表范长江劝他离开,但他坚决拒绝了。当火车到达车站,和平代表们一下车,立刻遭到埋伏在旁的大批特务围困在车站附近的一个房间。叶笃义和和平代表一起,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连续毒打,叶笃义被打昏过去,后来才送往医院救治。这就是有名的“下关惨案”。

“下关惨案”发生后,周恩来闻讯随即和董必武、李维汉、滕代远、邓颖超、王炳南等赶赴医院慰问受伤人员。当周恩来来看望叶笃义时,叶感动地说:“谢谢,看来和平民主道路还是很艰难的。”周恩来说:“道路艰难,我们有信心争取到民主和平。”

国共和平谈判破裂后,国民党当局在昆明杀害了民盟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政治形势更加恶化。叶笃义不顾个人安危,义无反顾地与民盟先驱张澜、黄炎培、史良等一道,捍卫民盟的尊严,投入到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去。

1947 年 10 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下令解散民盟总部,叶笃义冒着被杀害的危险坚持留在上

海,与民盟盟员一起转入地下斗争,继续为党、为民盟作力所能及的工作。直到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前夕才被迫秘密转赴香港,8 月回到北平,作为候补代表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坚定的爱国情怀

叶笃义生于 1912 年,在他成长过程中,承接了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的追求,以及反帝爱国的优良传统。他和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具有坚定的爱国情怀。

1934 年,叶笃义大学毕业后,由于成绩优秀,1935 年,不经意间得到了官费留学法国的一个名额。但是,当录取通知书和船票送给他后,他却毅然放弃了。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呢?他淡淡地说,当时国家在那样危难的时刻,日本人都到了家门口了,连学生都在为国家的命运抗争(他指我置身其间的一二·九运动),我出去干嘛?还不如留在国内为国家民族做点事。

叶笃义因为在燕京大学的优异成绩,深得校长司徒雷登的青睐。由于这一层关系,在有美国参与的国共两党和谈时,他作为民盟的代言人与已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多有沟通。1946 年国共和谈破裂、民盟被迫解散后,司徒雷登力劝他到美国去,并表示,愿意推荐他到联合国去工作。他表示坚决拒绝。

1948 年七八月间,国统区学生举行大规模反美示威运动。司徒雷登发表一个声明,威胁说学生们要“自食恶果”。叶笃义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对司徒雷登的声明表示不满。尽管司徒雷登是他的老师,但他也要提出批评。他在上海《展望》刊物上以“陈光”的笔名发表《不要打破温度计——警告司徒雷登先生》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借用司徒雷登讲过的一个比喻——学生运动是代表社会舆论的温度计,镇压学生运动如同不愿见到温度改变而打破温度计那样愚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这个比喻来批评司徒雷登的做法。同时,叶笃义代表民盟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向司徒雷登递交一封抗议的信。他同时把自己的这篇文章也交给司徒雷登,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

1949 年 5 月,叶笃义到香港后,为了得知被羁押在上海的张澜和罗隆基的消息,经常与美国

一位副领事联系,打探消息。当得知张、罗二人脱险后,叶笃义想立刻返回上海。为此,他找这位副领事帮忙买船票。不料,这位副领事竟向叶打探中共内部事务,他拒绝回答。临走时,这位美国副领事居然想到要用钱来收买他,被他一口回绝。

这些事情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虽然叶笃义说起来都是很平淡的,但我能理解他的内心情怀。一个人在决定政治走向的紧要关头,何去何从总是他的最基本的感情。叶笃义从来没有空唱爱国的高调。但是,在几个重要政治关头,他总是恪守一个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良心。这良心,就是他坚定的爱国情怀的体现。

虽九死其犹未悔

1993年,年过八十的叶笃义经过几度请求,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选择,不为一些人所理解,但我能理解他。叶笃义一生命运坎坷,但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信念却从未改变过,用他自己的话说“虽九死其犹未悔”。

1957年,党中央开始整风运动。整风开始后,确有个别人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散布了某些煽动性的言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5月15日毛泽东在写给党内的指示中(这一点是后来才知道的)提出了“引蛇出洞”的策略,使报纸版面上一时全是反面意见,在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这反过来又引起中共领导人的不安,对形势发展和阶级斗争作了错误的估计。

当时,担任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的叶笃义,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他不但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会议上做过多次发言,而且参加了著名的“六教授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他都坦诚地对党的各项工作提出了有益的批评和建议。当整风转为反右时,这些都成为他的罪状了。理所当然地他被错划成右派了。

叶笃义被划为右派后,处分很重,从行政八级降到十三级,职务也全被撤销了。我去看他,他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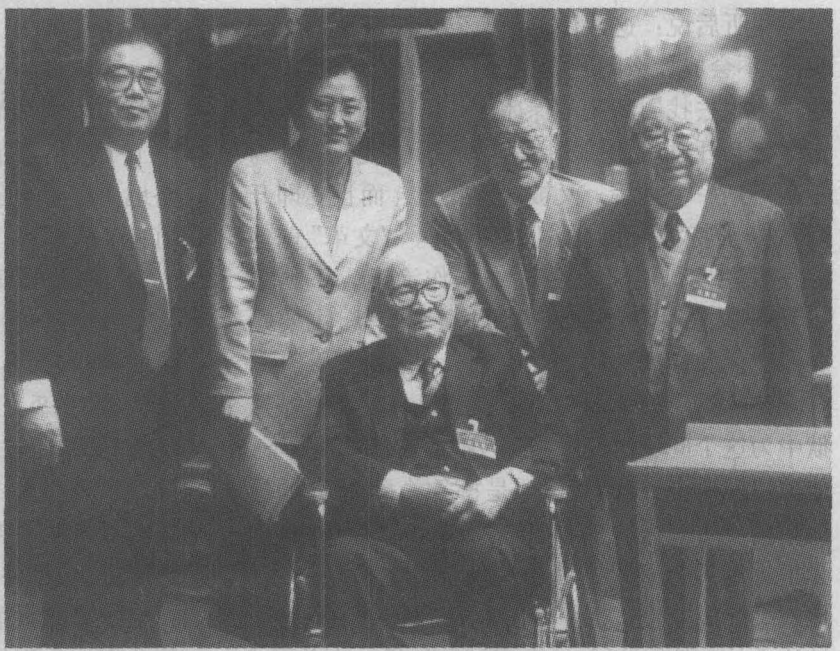
己虽然思想不通,但他并没有埋怨党,而老是自责,说自己不该那样讲话。我也是想不通的,这样一个忠诚的爱国者为何被打成反党的右派呢!我那时已是有近20年党龄的老党员,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劝慰他。

1960年叶笃义摘掉右派帽子,虽然仍保留了民盟中央候补委员的头衔,但基本上无事可做。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翻译工作上。那几年我常常见他捧着厚厚的外文书看。后来,才知道,他把一套四本的《美国外交史》和《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的有名著作都翻译出来了。我想,做这样的工作也是他心中的一种解脱吧。

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叶笃义的命运又一次陷入了悲惨境地。

叶笃义与张东荪关系密切,而那时张东荪已经被定为里通外国的“特务”了,他又是司徒雷登所赏识的学生,而那时司徒雷登则被视为美国在中国的“特务头子”。这样复杂的关系,使他在1968年4月就被民盟中央的造反派实行“革命专政”,被拘留审查,要他交代与这些特务的关系,硬要他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

在拘留期间,审完了他以后,又要他交代同别人的“特务关系”。后来得知,当时审查重点,是要他交代同徐冰(文革前,徐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的“特务关系”。他也因此被关进秦城监狱。



1997年民盟中央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叶笃义(前排)带病出席与(右起)费孝通、谈家桢、刘延东、冯之浚合影

“文革”期间,中央统战部为什么把徐冰打成“美国特务”?徐冰案件的情况,我不清楚,但这个案件却牵连到我的两个哥哥,一个是三哥叶笃义,一个是五哥叶笃庄。这里先说说叶笃庄的情况。

叶笃庄是搞农业的专家,他很早就参加了民盟,曾被选为中央委员,1957年也被划为右派。随后又被抓进了北京的一所监狱。我当时很不解,因为右派一般是不关进监狱的。1962年6月,他刚从监狱放出来,我就去看他,问抓他的原因,他不敢讲。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看望他,他才说:“抓我的原因是说我是美国特务。我被放出来时,监管人员对我讲,你出去不向别人说你的案情,就没有事了。所以我不敢说。”他告诉我,他被定为“美特”主要是两件事:一是1945年他在民盟时曾受周新民(当时是民盟的一位负责人,是一个老的地下党员,解放后曾任长春市长)的指示,到美国驻中国的军队中当翻译。再一件事是,1946年,叶笃庄到北平,国民党高树勋部在晋冀鲁豫地区起义了,民盟就想在这支部队里建立支部。正好有一个美国进步记者要到晋冀鲁豫采访,民盟就让他以给这个记者做翻译的名义,到那里去建立民盟支部。当时徐冰在北平军调部任我方代表。叶笃庄在北平与徐冰相识,经请示徐冰,徐冰同意,并给刘伯承、邓小平发了电报,刘邓接见了叶笃庄和这位美国记者。

我听后说:这两件事都有党内高级干部作证明人,不会成什么问题的。我当时就想通过新华社的党组织去找周新民和徐冰来作证明。但是,八届十中全会开过后,阶级斗争这根弦又绷紧了,叶笃庄在出狱一个月后,又被法院收监,而且立即开庭,以“美特”罪名判处10年徒刑。“文革”前他被安置在安徽的一个劳改农场作渔工,不料想1968年又被押解到北京,关进秦城监狱,主要是要他交代和徐冰的特务关系。

在叶笃庄被抓回去之前,叶笃义就在秦城监狱中为这个问题没完没了地交代。在严刑逼供下,他被迫捏造说,自己和徐冰是特务关系,徐冰通过他给司徒雷登送情报。但是,每次审讯完毕后,毫无根据地捏造别人的罪行又使他感觉良心不安,他就又翻供。接着又是一轮严厉的逼供,他只好又被承认。如此反复,他在秦城监狱里一直关了4年半。

他曾经给我看过在秦城监狱中所写的几首诗,既描述了所受到的非人待遇,也抒发了自己的信念。他在狱中度过六十周岁生日时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已矣六十载,往事如云烟。
投入囹圄后,倏忽近四年。
追昔时似煎,抚今日如年。
日进嗟来食,衣寝灯光前。
日日受煎熬,时时如倒悬。
不堪逼供信,被迫作假言。
居易以艾命,一年复一年。
梦与家人会,醒来泪满颜。
影与形相吊,苦楚有谁怜。
荣辱何足论,功过盖棺言。
自古谁无死,不愧对青天。

1978年,中央统战部给叶笃义彻底平反(我的另一个哥哥叶笃庄的冤案也获得平反)。

平反以后,叶笃义以“俱往矣”的心态看待所受过的磨难,把全部精力又投入到党的统战工作中去。1981年,他得了结肠癌后,预感到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又一次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但统战部考虑到他在民盟担任中央副主席,批准入党有诸多不便。此后,他又奇迹般地活下来了。直到他80岁时,再一次强烈提出了这一要求,最后获得了党组织的批准,在他耄耋之年,终于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应该说,不管遭受多少磨难,历尽多少坎坷,叶笃义对党对革命的信念始终未曾改变。晚年他写下了发行量很大的《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书,简略地讲述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在“前言”中他写道:

将一个爱国善良的灵魂扭曲到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的反动,这里有社会的悲剧,也有自身的脆弱。在良知复苏的今天,我们该如何写下这一段历史呢?拂去历史的尘埃重新追忆个人的一生,我已没有精力;将过去的自我批判来个反批判?我缺乏这种水平。我以为最简单又最安心的办法倒是将自己后半生最多的作品——检查稿,搜集起来,整理成书,较完整地奉献给读者。

这寥寥数语,透出叶笃义对历史的洞察力,也使我们能看到他“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心态。

(责任编辑 萧 徐)

不悔的子冈

● 付 阳

1985年11月,做了20多年右派、其时已半瘫在病床上的子冈口述了《我坐在轮椅中》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在北京见到一篇回忆我和徐盈的文章(复印件),原载台湾《传记文学》,作者是当年《大公报》的同事,后来定居台北的陈纪滢。陈文所忆旧事大体不差,字里行间还隐隐流露出一丝温情;但按语却指责“中共毁灭人才”,这是我和徐盈所不能接受的。我们(何止是我们?)确实遭受过冤枉,尝受过苦痛,但无论何时何地——包括戴着“帽子”在生活最底层接受“思想改造”的时刻,我们也首先感受到生活(无私的生活!)对每一个正直的人的启示与鼓舞!是它,使我有勇气活了下来,坚持发扬身上原来正确的东西,也努力改掉不那么美好的东西。这些体会,与早已分道扬镳的陈先生是说不清的,也无须去说。(《挥戈驰骋的女斗士——女记者子冈和她的作品》,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7年版,289页)

20多年的浩劫,20多年的磨难,子冈依然真诚地说她们不悔。

—

遥想子冈当年,以笔为枪,和徐盈夫妻双双驰骋在动荡中的新闻界,并和《新民报》女记者浦熙修一起被誉为连子双璧。1980年,子冈发表《熙修和我》一文深情回忆:

抗日战争的40年代,在重庆山城,浦熙修和我,无形中成了新闻界的一双姐妹——并肩采访,分别写稿,人家看见我问她,看见她问我,好像我们之间不存在什么新闻竞争,合作得倒很融洽似的。有人猜想彭子冈是一名地下党员,而浦

熙修也愈来愈赤化了。(《子冈作品选》,新华出版社,338—339页)

子冈的记者生涯是从《妇女生活》开始的,1936年,她曾只身以“堂妹”的名义到苏州监狱采访“七君子”之一史良,写下了《“堂姐”史良会见记》;也曾参加鲁迅的葬礼,写出了《伟大的伴送》这样感人的报道。从1938年初入《大公报》,十多年间,她发表了大量生动鲜活、有棱有角的通讯,这些曾感动过一个时代的文字已永远载入中国新闻史。“那个爽朗敏锐,漂亮洒脱,穿着大红毛衣在国统区跑来跑去的子冈”也早已定格在历史中。

1943年,在一次推进“节约储金运动”的记者会上,炙手可热的孔祥熙说:“今天讲节约储金,所以准备的茶点也很节约,只有一块维他饼和一杯红茶。但必须向各位说明,这种维他饼是用最富于营养的大豆做成的,又是新生活运动总会总干事黄仁霖先生发明的。当年我在美国遇到汽车大王福特先生,他告诉我,中国的大豆,含有维他命ABC多种成分。总之,各位吃了维他饼,不但实行节约,而且有益于养生之道……”

他的话没完,子冈就当场提问:“这几年,前方战士浴血奋战,后方老百姓节衣缩食,都是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孔院长,你可以看一看,在座的新闻界同业都面有菜色,惟有你心宽体胖,脸色红润,深得养生之道。可否请你继续深谈一下养生之道?”

一番话问得孔祥熙瞠目结舌,只得“哈哈”两声,匆匆宣布散会。

直言不讳正是子冈的性格,下笔之时,她更是对权贵豪门毫不留情。所以国民党当局不止一次向《大公报》“交待”:彭子冈“文字不妥”,要

报社“采取手段”。《大公报》对此自然是不予理会,但她采写的文字越来越难在重庆《大公报》面世了。从1941年起,她为桂林《大公报》写了近百篇“重庆航讯”,几乎是每周一篇,成为桂林版的一大特色,主要传达底层社会的声音,关注小人物的痛苦与挣扎,他们的绝望与希望,被新闻界誉为“重庆百笺”。这不仅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也是足以与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相媲美的传世之作。遗憾的是后来出的《子冈作品选》《时代的回声》《挥戈驰骋的女斗士》等都没有收集她这一时期的大量通讯,即使有少量收入,也没有标明出处,徐铸成曾为此发出感叹,认为这样做,“使读者不易明了其战斗锋芒,也容易失其历史的真实”。

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作为1938年秘密入党的地下党员,当子冈在重庆机场见到她所崇拜的领袖时,心情之激动可想而知,她在第一时间写出了《毛泽东先生到重庆》,短短1500个字,朴实无华,却把毛泽东的形象活生生地勾了出来,其中两个简单的细节尤其传神:

“很感谢”,他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当记者与他握手时,他仍在重复这三个字,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时,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

记者像追着看新嫁娘似的追进了张公馆,……毛先生敞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的簇新白绸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子冈作品选》158页)

她所写的不仅合乎历史的真实,而且确实蕴涵了她“当时对于主席的诚挚感情”,令她意想不到的,为了这一神来之笔,从“反右”到“文革”,她不知道挨了多少批判。

从1945年9月起,她回到北平,担任《大公报》驻北平办事处记者,以“北平电话”的形式在天津《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篇可与“重庆百笺”前后辉映的通讯:《愁城记》、《北平小事》、《如是我闻》、《北平传奇》、《烽火北平》、《北平的春天》、《北平岁寒图》……这些文字如同为时代画像,半个多世纪以后读来也宛在眼前。借助国共关系没有破裂的时机,她发挥一个记者

特有的作用,为共产党做了许多事,蔡文治(军调部的国民党代表)曾在一次记者会上当面问她:“彭子冈,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

1946年2月,她未经国民党当局允许,擅自采访共产党控制的张家口,在《大公报》发表《张家口漫步》的系列通讯,蔡文治无奈地说:“彭子冈,你的文章真有煽动力啊!”当年12月,国共全面破裂之后,她在《大公报》发表小说《惆怅》,公开怀念在解放区的弟弟,一时震惊朝野。国民党当局一再警告《大公报》:“徐、彭文字不妥”,要求迅速“采取措施”。《大公报》却一直“拖而不办”。到了1948年底,国民党动手搜查了他们的家,并把徐盈关押了数日。

二

子冈最辉煌的记者生涯实际上在1949年就结束了,这一年她只有35岁。她坦率、直爽的个性却没有什么改变。新政协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怀仁堂的正门朝南,却在西墙专门开了个小门,规定记者只能在那里出入。子冈是代表兼记者,并未受到限制,但她对这一做法表示不满,认为开会的代表很忙,记者要采访他们只有见缝插针,在一个门出入,正好顺道交谈,单独开个门,不便于记者工作。她为此大发议论,有的言论还涉及到反对等级等问题,不无尖锐,被人称为“大自由主义”。

当年她可以直言不讳地批评国民党,面对自己出生入死一同创建的红色“新中国”,除了歌颂,歌颂,她已不可能有另外的选择,但她做梦也不会想到几年后自己竟成了“右派”。

1957年,时为《旅行家》杂志主编的子冈成为“右派”之初,她公开表示不服,声明“辞职不干了,准备回家当家庭妇女”。在批判会上,她依然不自觉地为自己“鸣放”中的意见辩护。打开尘封多年的《彭子冈的右派言论》集,其中只有她写的6篇最“毒”、最“黑”的“反党”文章,批判她的文章数量却超过了10倍。她的那些意见其实没有一条说得上尖锐的,她谈到了出版发行存在的问题,赞成恢复“开明书店”、同人刊物等等,针对蔬菜统购统销中的弊病,她提出“蔬菜公司能否解体”等,这是她作为一个家庭妇女

的切身体会——“蔬菜是娇嫩货，经不起翻腾，时间上也经不起拖延，坏了没救。能不能不要什么公司层层集中又层层下放呢？能否让郊区的蔬菜合作社里的菜农或是自留地里的菜农自己来卖呢？不说别的，北京胡同里卖菜的清脆悦耳的吆喝声，也足够叫人惦记！一吆唤一连串，充满了自豪的感情，可惜如今只能从相声《改行》里听到了。这也许只是我不足为训的小资产阶级旧情感，真正受到实惠的是千千万万、每条小胡同里短不了的家庭妇女们……”结果被批判文章咬定她希望“社会主义制度，都得统统解体不可！”

老大公报人吴永良回忆，子冈被罗织落网的真正原因还是她的口无遮拦，她竟公然表示不赞成搞政治运动，说那既费时，又无益，这些话触及了当时最敏感的问题。显然比她的文章更容易惹祸。

许多人还揭发她在《毛泽东先生到重庆》文中，“蓄意”加入毛泽东在张治中家客厅中打碎一只盖碗的细节，说毛泽东“仿佛来自乡野的书生”更是“恶毒污蔑领袖”。一篇曾被延安当年收入毛泽东在重庆的有关集子的文章此时成了她右派根源的罪证。仅仅一年前，她在怀仁堂出席一个宴会，毛泽东先认出了她、叫出她的名字，还说她“比过去胖了”，问她是不是还“经常写文章”等。她不明白转眼间，为什么一切都变了。

更让她不明白的是，昔日的战友、同志、同事，转眼间也变了。她多次受到大会批判。其中一次在北京日报社的小礼堂举行。会前因为发生了北京日报社一个“右派”跳楼自杀事件，所以那天的批判会空气特别凝重。头一个批的是刘宾雁和他的《本报内部消息》，接着批判子冈。子冈坐在那里，面无表情，似乎被批判得有些麻木了。可是每次批判会后，她依然表示不服。

因为不服，子冈受到更严厉的制裁，受到《人民日报》的点名批判，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取消工资级别，每月发30元生活费，遣送北大荒劳动改造。只是周恩来在审查名单时，把她的名字勾掉了，所以才免于去北大荒，下放到河北农村劳动。《旅行家》编辑周沙尘说了一句：“彭子冈解放前冒着杀头危险时没有反

党，怎会在解放后个人地位节节升高时去反党？！”结果被开除党籍，下放东北二十年。

三

1961年，子冈被安排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她和浦熙修这几个昔日风头最健的新闻记者成了旧闻记者。就在她埋头整理史料时，发生了许多她想不明白的事，从战犯管理所特赦的一大批战犯转眼都成了“文史专员”，每月工资100元，是她的三倍多。而且其中七八位如末代皇帝溥仪及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王耀武等很快就成了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工资翻到了200元。她在1949年前曾采访过这些战犯中的一些人，她不明白为什么对人民犯有罪孽的战犯，如今却翻了个个儿。政协机关里有人私下议论：“越是‘自己人’，挨整就越厉害。”

“文革”灾难降临，1969年她被下放到湖北沙洋干校劳动。但即使遭受了那么多不公正的待遇，她“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执着的爱”从来没有泯灭过，她在干校写信给邓颖超说：

徐盈的劳动很重，送粪，拉车，搬运粮袋，大汗淋漓，瘦骨嶙峋。我的膝关节早已坏，是个半残废。我们愿向工农兵看齐，接受再教育一辈子，但体力已跟不上，希望当革命需要用得着我们的时候，以毕生之力，为革命尽一份力，以此报答毛主席，也不辜负当年您和总理在曾家岩五十号的谆谆教诲……

在写给女儿的信中，她说：“小鸟起飞，是我二年来的生活实感，真想飞翔，不想定居。看麻雀时而啄食，时而在我的呐喊或铜锣声中忽的起飞，真是羡慕……让我们大家在国家的大好形势中，在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势中欢乐起来吧！我要像小鸟一样起飞！”

1979年，子冈获得平反，重返《旅行家》。正如沈从文为《子冈作品选》写的序中说的，“一些拿笔杆子写文章的，在风风雨雨中，被批斗得颠三倒四，无所适从……偶然幸存的，也大都由青春年华进入身心憔悴衰老迟暮之中”。（《子冈作品选》2页）这时她已65岁，走路蹒跚、行动迟缓，进入了暮年，早已不是“那个爽朗敏锐，漂亮洒脱，穿着大红毛衣在国统区跑来跑去的子

冈”了。正当她再次提起笔时,1980年夏天她猝然患脑血栓入院,从此半身瘫痪,在轮椅上度过了生命最后时光,甚至不幸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说话不着题,“坐在椅子上看报,报纸常常是倒着拿的。”1988年1月,子冈在瘫痪8年后告别人世。《人民日报》以《握一管神笔有两只慧眼 著名女记者子冈默默离去》为题发表了一篇让家属非常感动的报道。

尽管杨刚、范长江、孟秋江、刘克林、蒋荫恩……这些《大公报》人都亲自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休止符,尽管子冈、徐盈夫妻,还有曾写下名篇《落日》的朱启平等许许多多《大公报》人被打成“右派”,历经劫难,生命中大好的岁月都被浪

费了,但是子冈并不同意陈纪滢“中共毁灭人才”的批评,午夜梦回,她说真的没有后悔过。从她在湖北干校写的那些信来看,从她在病床上、轮椅中口述的文章看,这位年轻时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的记者,对她1957年以后的遭遇真的是毫无怨言,她对陈纪滢的抱怨因此也是真诚的,只是她的真诚中有太多悲凉的意味,这未必是她所能体会到的。她曾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新闻记者,她的许多文字为大时代的历史留下了见证,她也在政协整理过文史资料,但看不出她是不是属于那种缺乏历史感的人?

(责任编辑 萧 徐)

宪法中关于“国体”提法的变化

● 宋小英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因此,一个国家的宪法,最重要的是体现国家体制的性质。

早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国体的性质,就有了清醒的认识——实行“新民主主义宪政”。这一思想具体地体现在毛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新中国成立前,毛在《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两文中,确立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国家体制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

1949年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1954年诞生的第一部《宪法》作了更明确的阐述。第一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但是,由于历史曲折的发展,这部体现人民意志的比较成熟的宪法,并没有得到维护和执行。宪法中关于国家体制的提法也因此有了改变。

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到“文化大革命”,在“左”的错误思想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渐渐流行,与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斗争意识相伴随,“无产阶级专政”一词也逐渐

流行,“人民民主专政”则不敢提了。到“文革”中的1975年,张春桥主持修改宪法时,就把宪法第一条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抛弃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想指导下修改制定的这部宪法,自然无法代表人民的意愿。因此,在我们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彻底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做法后,宪法中关于国体的提法必然要进行修改。

1980年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修改宪法时,一些与会者提出修改宪法第一条的规定,主张把“无产阶级专政”改为“人民民主专政”。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又进一步指出:“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1982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第一条作了修改,即仍采用1954年宪法的提法,把“无产阶级专政”改为“人民民主专政”。

可是,在宪法的序言中,则仍然有“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把两者划了等号。这样写,与第一条就产生了矛盾:如果两个概念完全一样,1975年宪法中把“人民民主专政”改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什么错误,这次也就没有修改的必要。因此,一些人对此提出了意见。全国人大接受了这一意见,把“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修改为“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既有共同处也有不同处的两个概念,采取这样的表述很恰当。

到了她眼中闪出的亮光。

王秋琳从衣袋里掏出一封早已准备好的信，

是写给苏双碧，同时转呈《光明日报》的。信很短，只有三四百字，大体上讲了这样三方面的内容：第一，遇罗克在姚文元发表评判吴晗的文章以后，写了一篇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的文章。第二，遇罗克的《出身论》是批判反动“血统论”的。第三，遇罗克于1970年3月5日被枪毙，要求给予平反。

虽然这封信的原件已找不到了，但苏双碧不仅清楚记得信的大概内容，而且对其字体之清秀印象深刻。他后来才知道，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也是一位知识分子，曾任北京市工商联的政协委员和东城区人大代表，1957年由于为一名“右派”辩护，她自己也被划成“右派”。也正是在同一年，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也被划成“右派”。1983年5月，王秋琳去世，享年63岁。她的二儿子、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回忆说：“她是个无比刚强的人，对人总爱面带微笑，但内心的痛苦死后我们才从她的日记中知道。……母亲上下班每次经过工人体育场——宣判哥哥死刑的地方，都要把头扭过去，不去看那个地方。”

查找尘封的冤情

王秋琳来访的第二天一早，苏双碧就向《光明日报》的领导汇报了这件事。当时的《光明日报》领导，特别是副总编辑马沛文对此十分重视。随后，光明日报社给北京市公安局开了一份介绍信，内容是：“派本报记者苏双碧到你处查看有关遇罗克的材料。”当天下午，苏双碧就持这封介绍信、骑自行车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

遇罗克冤案是如何披露出来的

● 祝晓风 张洁宇

冬夜来访的母亲

1978年冬天，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光明日报》编辑、记者苏双碧的家里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她就是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

王秋琳的到来，是因为苏双碧几天前（1978年11月15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是“文革”后第一篇为吴晗平反的文章。在文章中苏双碧说了这样一段话：“这是‘四人帮’发迹时制造的最早的一桩大冤案，姚文元打着批判《海瑞罢官》的招牌，把和海瑞有一点‘关系’的人统统打下去，仅是这么一个文字狱，就在全中国制造了成千成万的冤案。……今天我们就是要平冤狱，包括你姚文元《评新编》造成的以批《海瑞罢官》为中心的文字狱，都必须一个一个地清算，一个一个地平反。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冤狱不平反就不足以平民愤，冤案不昭雪就不足以快人心。”王秋琳就是看到了这段话，看到了要为与吴晗冤案有关的人平反的希望，才费尽周折找到作者苏双碧的家中。

一进门，王秋琳就直截了当地问苏双碧：“你在文章里说，凡是和《海瑞罢官》的案子有关的人都要平反。吴晗是市长，你写文章替他平反，那么，老百姓你们管不管？我的儿子是老百姓，也跟这个案子有关，是被枪杀的。他的事情你管不管？”

面对这位母亲，苏双碧的回答脱口而出：“如果真是个错案，按照党‘有错必纠’的政策，当然应该平反。”这一句话，点燃了王秋琳心中的希望，苏双碧清楚地看

北京市公安局在查看了档案以后告诉苏双碧,遇罗克的档案并不在他们这里,而是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他们帮苏双碧给法院打电话进行了联系之后,下午4点,苏双碧又骑车赶到了台基厂附近的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说遇罗克,法院的工作人员都知道,纷纷说档案就在某间屋子里的某个墙角。一名工作人员带领苏双碧来到这间专门存放“文革”期间档案的屋子里,地上布满了尘埃,看来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这间屋子里的东西了。在一个被尘封的墙角边,苏双碧看到了一大摞半人多高的材料,他数了数,一共24卷,这就是有关遇罗克的全部材料。那位工作人员帮苏双碧把材料搬到一张乒乓球台边让他翻阅,但由于已经快到下班时间,他只能粗略地翻阅一下,因此,他先看了最后审判的情况和一些检举信,看看到底是以什么罪名判处遇罗克死刑的。

虽然是粗略地一翻,但在苏双碧的脑子里就已形成了初步的印象,他认为这的确是一桩冤案,应当给予平反。

但是,仅凭初步印象是不能作结论的。第二天,也就是王秋琳来访的第三天,苏双碧找到他的同事张义德、赵绍平,三个人一大早又来到了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个人围着乒乓球台,用了整整一天半的时间详细地查看了遇罗克的档案材料。把50多次审判记录一一翻阅之后,3个人都明白了事实的真相,也都感到了心情的沉重。他们看到,一个头脑清楚、才华横溢的青年,仅仅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就被冠以诸多严重的罪名,直至最后被夺去生命。他们还从材料中看出,逮捕遇罗克的主要原因就是《出身论》,但因为这毕竟只是个观点问题,构不成死罪,于是遇罗克就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纲”,直至成为“现行反革命”。在审判中,没有事实依据,预审庭这样告诉遇罗克:“你交待也要定罪,不交待也要定罪,我们是用毛泽东思想看透了你的罪行。”因此,在判决书上也没有任何具体的东西,全都是各种抽象的罪名,如“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等。然而,就是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结束了一个优秀青年的生命。20年后,当苏双碧忆起当时的感受,仍“觉

得心里发麻”。

1979年1月,北京召开了后来被列为改革开放20年大事之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此会的第一阶段持续了一个月左右。在1月26日的会议上,马沛文发言时谈到“文革”的封建专制,特别提到了遇罗克,说这名优秀青年是“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无辜牺牲品”。他还在会上念了王秋琳、遇罗峰写给苏双碧及《光明日报》社的信,读了抄录的遇罗克的几段日记。其中一段,马沛文在20年后接受我们采访时依然印象深刻、脱口而出。遇罗克的日记说,“比如说,乒乓球队获胜,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挂帅,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篮球队不也学习毛著吗?苏联队不是没学吗?为什么中国败给了苏联呢?讲不出来了。这是用政治讲不通的问题。”

马沛文当时就在会上说,遇罗克的这种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1978年,报纸才开始批判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的错误,可是,在12年前,遇罗克这名青年就在日记中鄙视这种蒙昧主义了。“这样一位具有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的勇敢青年,这样一位善于独立思考、并有独立见解的优秀青年,竟然被当成不可饶恕的罪犯予以处决。这说明‘四人帮’横行期间,中国的社会是多么黑暗!”

后来,《光明日报》正式致函北京市公安局,要求为遇罗克平反。

北京市公安局对此积极配合,立即开始了认真的调查、平反工作。

还历史以真实

历史从尘封中显现出来。人们看到,遇罗克是无罪的,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以生命对抗强权、捍卫真理的英雄。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此揭开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浩劫的序幕。文章刊出以后,很多人对其观点并不赞同,但是,真正撰文予以反驳的人却寥寥无几。是24岁的遇罗克挺身而出,“道他人之不敢道,言他人之不敢言”,以一篇长达15000多字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反驳姚文元。1966年2月13日这篇长

文被压缩并改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发表在《文汇报》的一角。在文章中，遇罗克批驳了姚文元对历史和现实的曲解，明确地说：“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为了这篇文章，年轻的遇罗克曾被揪斗审问多次。

1966年底，遇罗克又因《出身论》一文，再次为当权者所不容。

《出身论》针对的是社会上流布极广的封建血统论。遇罗克通过对当时一副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剖析，指出了血统论的荒谬本质。他说：“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他粗略地统计了“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的庞大数字，指出“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遇罗克坚信“重在表现”，坚信“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的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他尖锐地指出，坚持血统论的人“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

《出身论》的出现，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很多人争相传抄、议论，很多读者从全国各地写信给遇罗克，表达自己的感动之情。更有很多因出身而备受磨难的青年流着眼泪把文章读完。

同时，《出身论》也受到了血统论者的强烈抨击。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公然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

在狱中，遇罗克实践了自己“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的誓言。几十次审讯，他从不屈服。当预审庭宣布：“你公开点名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

无产阶级司令部”时，遇罗克凛然回答：“我不知道姚文元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当预审庭说他攻击中央首长时，他理直气壮：“我认为陈伯达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此外，遇罗克还曾当面指责预审庭：“这是什么时代？！（你们）还有点实事求是吗？”“把我没有的东西，强加在我头上，你们这样做不行！”

当听到审讯人员骂他“死反革命”的时候，清醒敏锐的遇罗克了解到了自己面临的危险。他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最起码的请求：“希望政府能将某些检举材料核实一下，并听一听我个人的申诉。”他说：“我还年轻，还没有对党和人民有所贡献，死了不好。”他开始一遍遍地写检查，写材料，目的在于拖延时间。但是，他的请求遭到了冷冷的拒绝。

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遇罗克遇害的第二天，在北京的街头曾出现“为遇罗克烈士报仇”的标语。

用手抄出来的历史

了解了真实情况以后，苏双碧等人开始为遇罗克的平反工作做准备。他们一方面把已掌握的有关材料提供给北京市公安局，作为重审的证据；另一方面，苏双碧开始就这些材料着手为报纸撰写平反文章。

此时，《光明日报》的领导觉得为这样的冤案平反，光靠写理论文章恐怕力度不够，于是报社又派出张天来、王晨两名记者开始采访写大通讯。张天来、王晨又到法院等有关部门搜集、抄录遇罗克的日记、生平自传，采访他的家人，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期间，有关人员转来了一张胡耀邦写来的条子。条子的内容大致是：现在社会上正在搞张志新的问题，这种案子现在比较多，据说《光明日报》也在弄，有一个典型，建议这篇文章先不要上。胡耀邦的意见主要是出于对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考虑。为此，苏双碧手中的稿子停了下来。而张天来已写了大通讯的第一稿。

虽然没有在报纸上刊登有关遇罗克的文章，



遇罗克(摄于1967年)

可有我的态度鲜明、立场坚定?这时候,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5月3日:
×××××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

但是,社会上已开始到处传颂遇罗克的事迹了。1979年,很多人都在读遇罗克的文章,很多人传抄遇罗克的日记和诗,甚至在一些正式会议上,都有人公开朗诵遇罗克的诗文。遇罗克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和勇士,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了解和崇敬。

但人们也许并不知道,这些真实感人、鼓舞人心的诗文到底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呢?其实,它们全部是经过苏双碧、张义德的手,从遇罗克厚厚的24卷档案材料中,一字一句地誊抄出来并传播出去的。凭借他们的笔,依靠他们的口,人们了解到在身边曾经发生过怎样令人发指的冤案,人们开始懂得那个被冠以“现行反革命”罪名的遇罗克实际上是怎样的一位英雄。

被抄出的遇罗克的日记是从1966年1月到8月的一部分。其中有很多早已为人熟知。

1966年2月15日,《文汇报》发表了《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一文,在日记里,遇罗克这样勉励自己:“凭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分删得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也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难道我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吗?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那些折中的文章,名为否定实是肯定的作者,

6月12日:晚上看到受批判的电影《红日》。这么一部深受束缚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真实的。今天要求的决不是什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而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欺骗人民。希望现实也去迁就那些假话。……但是,在事实面前,当权者永远觉得会有压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么不正常,即可作为明证。

8月26日: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这些日记上的话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除日记之外,社会上还流传着遇罗克的遗诗,最著名就是那首《赠友人》:

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

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逆风恶浪中的雄鹰”与“划破夜幕的陨星”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

1980年,由于公安局已经做出平反的结论,北京出版社的《新时期》杂志找到了苏双碧,要求刊登有关遇罗克的报道。于是,苏双碧完成了那篇停下许久的文章。1980年6月,《新时期》第4期登出了他的《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1980年7月15日,《北京日报》再次刊发了此文。

在这篇文章中,苏双碧就占有的材料详尽介绍了遇罗克的“坎坷曲折的生活道路”,讲述了他与恶势力不屈不挠的斗争,首次披露出一些蒙在积尘之下的历史事实。他以“逆风恶浪中的雄鹰”的形象赞美遇罗克的斗争精神。在文章的最后,苏双碧激情澎湃:“遇罗克虽然被杀害了,但他的血没有白流。正是许许多多的张志新、史云峰、遇罗克式的革命先驱的血,擦亮了中国人民的眼睛,使他们看清了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的狰狞面目。一个遇罗克倒下去,千万个遇罗克站起来;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上的怒吼,不正是遇罗克的心声吗?伟大的中国人民将永远纪念他。”

大通讯后来主要由王晨执笔,也经过了几次大改。1979年秋天,王晨开始去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这期间,又因为上面有指示不宜过于集中地报道这一类事情,所以稿子一放就是一年。1980年的六七月间,《光明日报》社又请王晨执笔再写遇罗克。在劲松的那间小屋中,经过记者几个昼夜的连续写作,一篇新闻史上的名作终于问世了。

1980年7月21日、22日,王晨、张天来的长达20000字的文章《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更细致地介绍了遇罗克生前的事迹,以及他在狱中的斗争。他们将这位“思想解放的先驱”比作“划破夜幕的陨星”。文章说:

那些扭转乾坤、功昭日月的巨星,那些有创造发明,能利国福民的名星,将永远被人们称颂。然而,人们也不会忘记,当银汉低垂、寒凝大地,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苦难的时候,那拼将自己全部的热,全部的力,全部的能,划破夜幕、放出流光的陨星。虽然看来它转瞬即逝了,却在千万人的心头留下了不熄的火种。恰似长夜的10年动乱中,被残酷杀害的青年遇罗克,就是这样一颗过

早陨落了智慧之星。

副总编辑马沛文亲自为这篇长文写了编者按,编者按说:

鲁迅先生说:悲剧是把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下面这篇通讯描述的就是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遇罗克如何被“毁灭”的悲剧。他的思想,他的才华,他的抱负,对国家、对人民该是多么“有价值”,如果能让他顺利成长起来,对我们的事业该是多么有用处!可是,在“唯成分论”风行的日子里,受歧视,遭打击,绝了他前进的路,最后,在现代迷信泛滥,封建专制猖獗的10年动乱中,这样一位异常优秀而又风华正茂的青年被彻底“毁灭”掉了。遇罗克能经受得住种种考验,“就是因为他始终信仰马克思主义,始终热爱社会主义。”今天,我们看着他感动人的事迹,看着他启发人的文章和日记,吟着他激励人的“乾坤特重我头轻”的一类诗句,该从这个悲剧中吸取什么教训呢?

在文章最后的“附记”中,作者对遇罗克的亲属、难友、同学、朋友,以及所有提供了第一手素材的人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后来,遇罗克全家都与《光明日报》社的有关记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特别是苏双碧,他至今仍不能忘记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的一次“天真”的谢礼。

那是在遇罗克平反之后,遇罗锦也得到了平反,她从监狱里被放出来,得到了680元的补助。一拿到钱,遇罗锦就立即给苏双碧和张义德打电话,希望请他们吃一顿饭,以表示对他们帮助遇罗克平反的谢意。然而,苏双碧在电话中严肃地拒绝了她的善意。他说:“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我们从工作出发,可以帮你哥哥把问题搞清楚,帮他平反,但是如果吃了你的饭,就只好说话了。”于是,遇罗锦只好买来几块巧克力,专门送到报社,交给苏双碧和张义德二人,用她自己的方式表达心中最真挚的情感。

遇罗克的事迹见报之后,在社会引起了强烈而广泛的反响。一时之间,全国30余家报纸纷纷转载此文,新华社也转发了该文中的六七千字。遇罗克这个名字一下子为全国所知,同时也必将为后世铭记。

(责任编辑 萧 徐)

关于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真相》

一文的补正

● 迟泽厚

《炎黄春秋》今年第1期的《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真相》(以下简称《真相》)一文,介绍了这次会议的缘起、背景,其中提到林彪在听了训练总监部一位上将副部长向他反映部队存在着一些教条主义现象后,即向毛泽东建议,应在即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反教条主义。这对于读者了解那次会议情况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作为参加过那次会议全过程的一名工作人员,发现该文在记述会议情况方面,有一些失实之处,需要予以指出。

众所周知,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借反对“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伤害了一批军队高级领导人;尔后层层传达贯彻会议精神,又株连了大批干部,对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造成很大损失。这次会议是根据当年3月在中共中央成都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的;会议要以“整风”方式反“教条主义”,也是毛泽东定的。会议开始后,毛泽东又对会议给予极大关注,大会小会3次讲话,并批阅了许多会议文件,这自然对会议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但是,毋庸讳言,主持这次会议的是彭德怀元帅。当时彭德怀并非被动、勉强地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他也是主张反教条主义的。早在1957年2月下旬,他曾亲率包括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和副总理陈赓在内的工作组,赴刘伯承任院长的南京军事学院检查工作,认为该院“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应当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工作”。3月初向中央写了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后第二天便批复“同意”。经中央军委审定的1992年出版的《刘伯承传》认为:“这个报告,也为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发动全军范围的反教条主义定下了基调,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见该书658页)应当说,彭德怀同志对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发生的“左”的错误是有责任的。这自然令人为之扼腕。但是,历史不能回避。更何况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彭德怀这样的革命家,也不应苛责于他。而《真相》却

极力为彭德怀辩解,认为他当时是身不由己,事出无奈,而且在会议中他不曾整人,这就不客观了。彭德怀元帅本人,对他主持的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看法,后来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当他在庐山会议因直言获罪被“罢官”之后,经过痛苦反思,终于认识到过去对刘伯承、萧克等人是批错了(《彭德怀传》556页),表现了一个伟大革命家的坦白襟怀。这是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最好评价。

至于林彪就反“教条主义”向毛泽东的进言,自然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毕竟当时林彪在党内只是个一般的政治局委员,直到军委扩大会议开会之前两天才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副主席;在军内,林彪也只是个不管具体工作的军委委员(当时中共中央军委未设副主席,林彪与其他9位元帅及邓小平均为委员)。军委扩大会议开幕时,林彪同各位元帅一起到会作了表态性的讲话,大家都对彭德怀领导下的军委工作给予肯定,林彪讲话时还要求大家团结在彭德怀元帅周围。有几位元帅曾多次到会并讲话,而林彪未再参加会议,只参加了闭幕式也没有讲话。会议期间也没听说他对会议有什么指示或建议。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林彪在一次小组会上讲,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前,他曾向毛主席建议会议应该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显然是借打击彭德怀抬高自己,不能据此过高估计林彪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影响和作用。

《真相》在提到会上被重点批判的刘伯承、粟裕、萧克、李达等人的遭遇时,讲他们如何“坦诚”“诚恳”“谦逊”“深刻”地作了“自我检讨”、“自我批评”,并一一获得“通过”。似乎他们都确有错误,而在大家的批评帮助下,又都提高了认识,得到大家谅解。原本火药味很浓的会议,竟然如沐春风!但是真实情况是:这4人除刘伯承是残病交加、力疾出席,毛泽东为他说了几句好话,因

而只在大会上作了一次检讨外,其余各人都是大会小会反复检讨,哪个人也没有“通过”,都留了这样那样的“尾巴”;会后又一一受到组织处理。如总参谋长粟裕去军事科学院当副院长,萧克、李达转到地方工作,他们从此都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备受歧视。至于受他们株连的更多干部的处境,就不问可知了。

还有,写史离不开翔实的史料。而《真相》中的很多“史料”却不知来自何处,如文中竟把军委扩大会议的开

幕时间5月27日误为28日;说什么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之后,“首先提议将各位元帅都提为军委副主席”,“而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又都弄下去”,这是没影的事;说黄永胜“竟然把女姘头带到军委扩大会议人员住所,伴宿伴舞”,其实当时黄永胜住的三座门招待所没有人住任何女人,也从未开过舞会。还有装甲兵副司令员聂鹤亭同林彪比资格,说在井冈山时二人在同一连队当排长,实际上那是南昌起义以前的事。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历史转折的前奏	程中原 夏杏珍	38.00	6.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2.00	5.00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邓 野	29.80	5.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3.80	5.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28.80	5.00
斯大林(上中下册)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	78.00	8.00
动荡岁月秘闻	温乐群等	72.00	9.00
扛起地狱的闸门	丁 群	21.00	5.00
张闻天年谱	张培森	65.00	8.00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郭汝瑰 黄玉章	68.00	8.00
邓小平时代(上下册)	杨继绳	32.00	5.00
再生中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	李 艳 熊志勇	44.80	7.00
叶剑英在非常时期	范 硕	36.00	6.00
断桅扬帆——蒙冤25年的公安局长	丁兆甲	26.00	5.00
特别审判——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	图 们 肖思科	28.00	5.00
改革风云中的万里	张广友	20.00	5.00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季羨林	24.00	5.00
没有情节的故事	季羨林	25.00	5.00
枝蔓丛丛的回忆	季羨林	26.00	5.00
李锐其人	宋晓梦	28.00	5.00
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凌志军 马立诚	23.80	5.00
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	凌志军	25.00	5.00
25年——1978—2002 中国大陆			
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	王 安	26.80	5.00
我向百姓说实话	李昌平	20.00	5.00
我向总理说实话	李昌平	23.00	5.00
影剧之王田汉——			
爱国唯美的浪漫人生	张耀杰	25.00	5.00
戏剧大师曹禺——			
呕心沥血的悲喜人生	张耀杰	20.00	5.00
白色花劫——“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大纪实	林 希	25.00	5.00
才子邓拓——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	张 帆	25.00	5.00
中国人物年鉴	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	158.00	7.00
蒋介石评说古今人物	戎向东	29.80	5.00
十年来影响中国经济决策的论点	张国华	28.00	5.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历史转折的前奏》在“文革”十年内乱中,1975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作为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努力,作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尝试。作为历史转折的前奏,作为邓小平理论的孕育,1975年整顿的历史,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

作者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和富有激情的文笔叙述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有许多史料是首次披露,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艺术感染力。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年~1946年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争论,是两种对立的国家政体的争论,是争取一个怎么样的抗战结果的争论,因而也是国共两党政治对立全部历史关系的最高表现形态。本书对这一场长达两年的政争的发生、发展和终结,进行了全程的跟踪考察,集中论述了国共两党是如何由政争走向战争的。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从皇帝官僚土匪和小民,每个社会集团都有自己的利害考量,发展出独特的生存策略。本书以明清和民国历史为本,剖析了各阶层的获利模式和反抗策略,揭示出买命和卖命的逻辑,挖出了各种规则背后的终极规则。行文生动平易,读来让人后悔:我怎么没看透呢?

《扛起地狱的闸门》第二条战线的英豪们,他们与第一条战线上人民解放军英雄一起,怀着对真理、对理想、对光明未来的真诚追求,以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谱写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壮丽诗篇,他们托起地狱的闸门、帮助万千受难者逃出地狱,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为此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七君子”群像

落成感言

● 章立凡

2004年3月26日上午,救国会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七君子”青铜群像在沪上福寿园文化主题公园落成。“七君子”的后代们作为嘉宾躬逢盛会,不少人已是白发苍苍,我是第二代中最年轻的一位。缅怀先人们为民族解放和政治民主奋斗的历史,感慨系之。当日下午有一座谈会,遂发表感言。现加以整理补充,草成此文。

过去在表述救国会历史的时候,总是将发源于上海的救国运动说成受了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从史料上看,中国的救亡运动有两个策源地,救国会的酝酿从“一·二八”事变后就开始了。1935年12月9日北平发生学潮的消息传来时,《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已经起草完毕,临时在宣言中加了一段支持北平青年学生的话,并很快就组织各界上街游行。北平学生也派了代表到上海串联,形成南北互动。但上海的救国运动不止限于青年学生,而是各界、各阶层都参加了,并很快发展到全国,具有广泛的联合阵线性质。邹韬奋先生曾谈到:“当时上海成为在实际上领导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毛泽东在对柳湜的谈话中也给救国会以崇高评价:“中国的抗战是由两种力量打出来的,一、红军北上——这是武的;二、救亡文化运动——这是文的。在救亡文化运动中,救国会起了中心的作用。”

“七君子”群像在他们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上海落成,是一件大好的事情。群像生动地

再现了先辈们捍卫国家尊严、挽救民族危亡的大无畏形象。我们今后所要考虑的,是如何继承先辈的精神遗产。

“七君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于传统与现代交替的社会转型期。其道德力量有两个来源:一是传统儒家文化“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二是从辛亥革命到“五四”以来的现代民主理念。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已成为过去,这种人现在不大容易出现了。

“七君子”都是专业人士,分别从事法律、教育、经济、新闻出版等专业,并在各自的领域卓有建树。他们都不是职业政治家,没有党派成见,更不是靠弄政治混饭吃的政客。用今天的话来说,属于白领阶层或中产阶级。他们参与政治和从事救国运动,完全是出于自觉的社会责任感,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

“七君子”都是爱国者。“爱国”是一个包容性很广泛的概念,不同世界观、不同政治见解的人都可能认同爱国主义。这就是救国运动为什么能得到社会各阶层广泛同情和支持的原因。沈钧儒先生是一位佛教徒,他的爱国心就表现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牺牲自己来救度众生。我过去参加过关于沈衡老的学术研讨会,也读过一堆研究论文,但从来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只有赵朴初先生手抄沈衡老的《主张坚决,态度和平》一文时,在按语中提及。

“七君子”在当时都是讲真话的人。他们

意识到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再打内战只会消耗民族的元气,因此要将真话讲出来,将真相披露出来,向全体人民呼吁,向当局呼吁。但国民党当局不许讲真话,认为“爱国有罪”,把他们关进监狱。激起了全国乃至全世界正义力量的义愤,引发“西安事变”,最终迫使国民党走上抗日的道路。

其后经过多年的奋斗,我们建立

了一个新国家,有了一部新宪法。但是在民主与法制建设过程中,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致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出现了“一言堂”。“七君子”中的两位——王造时先生和我的父亲章乃器,因为讲了真话,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特别是爱国者王造时先生,没有死于国民党的屠刀之下,却在“文革”期间惨死狱中。这段惨痛的历史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人人可以讲真话的社会。我们这个社会所有的问题,都是从说假话开始的,现在发展到烟酒食品都有造假。让人说真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说真话,天真的有可能会塌。1957年以后不许人说真话,喜欢听假话,才发生了“大跃进”的经济灾难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种深刻的历史教训是应当认真汲取的。历史是科学,有谁见过“宜粗不宜细”的科学?拒绝梳理历史情结,就不会接受历史教训,历史的惩罚还会再来。

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决策信息如来源于官僚系统的层层上报,决策者就有可能被蒙蔽。我们已经知道,“大跃进”中许多数字是假



本文作者在“七君子”雕像前

的,很多问题被掩盖了,得不到解决,直到积重难返,来一个总爆发,给国家人民造成重大损失。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从新闻报道上看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但实际上危机已酝酿了许多年。去年温家宝总理从一位普通农妇嘴里听到了真话,得知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才能采取措施及时解决,这就说明让人讲真话的重要性。

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两只车轮,缺一不可,一大一小也走不好。民主就是把人民的意愿变成国家意志,而不是把某个人的意志强加给人民。“七君子”是民主人士,有些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但这并不矛盾,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就说彭德怀是“民主人士”。什么叫民主人士?是能够反映和表达人民意愿的人,是为人民讲真话的人。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为民主人士。

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先辈,就是要学习和继承他们的爱国民主精神,提倡全社会讲真话,才能建设好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2004年3月28日风雨读书楼)

(责任编辑 萧 徐)

彼得大帝的出海梦

● 陈德辉

去年6月初,俄罗斯举办了规模宏大的圣彼得堡市建立300周年的纪念活动。按照俄罗斯人自己的说法,这次庆典是俄政府向世界展示自己,提升本国国际形象,鼓励国人奋发图强,重振雄风的良机。

圣彼得堡是彼得大帝在经过艰苦奋斗和付出沉重代价夺得波罗的海出海口之后,于1703年亲自规划建立的一座海滨城市,把它作为引进西欧国家先进技术和人才、进行对外贸易的窗口和平台。从此俄罗斯融入国际社会,国势日隆,成为东欧的一个强国。

梦寐以求打开海上门户

沙皇彼得一世出生于1672年5月30日。他的童年是在宫廷权力斗争的腥风血雨中度过的。彼得亲政时的俄罗斯,虽然是一个地跨欧亚两洲的大帝国,但却十分贫穷、落后,仍然处于中世纪的黑暗和愚昧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出海门户,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状态。

1693年彼得率员视察白海东南岸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在港口码头上,他看到俄国的木材、亚麻、皮毛等商品堆积如山。由于没有本国船只运出销售,外国商人残酷压价,俄商不够成本,宁可让它烂掉也不出售。彼得明白了俄国落后的一个根本原因。

1695年为了夺取黑海的出海口,彼得率俄军攻取黑海南岸原属俄国、后为土耳其占领的亚速城。因为俄国没有海军,无法阻止土军从海上源源不断地向城内供应粮食和弹药,尽管俄军奋勇作战,但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彼得亲睹一千余哥萨克敢死队员在土军猛烈炮火下殉身城下。

这些刻骨铭心的亲历,使彼得日益形成坚定的信念:必须要有海上门户,要有自己的海军,让愚昧落后的俄国融入欧洲,把欧洲先进的技术引进俄国。“俄国需要的是海域”。这是彼得毕生为之奋斗的座右铭,也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心声。

隐名乔装去西欧学习科学技术

率团去西欧访问,学习先进技术,是彼得的夙愿,1697年2月,他在克服保守势力重重阻拦之后,终于成行。这个使团共有250人,其中有30名留学生。他把使团的领导工作交由三位大使负责,自己化名彼得·米哈依洛夫,以留学生的身份随团出访。

使团到东普鲁士的海滨城市哥尼斯堡,他向一位上校拜师学习打炮技术。其后,彼得随团到达以造船业闻名于世的荷兰萨尔丹,这里工场林立,气笛长鸣。他借住在一个铁匠家里,生火做饭,洗衣搭铺,全部自理。他跟着师傅学习木工,斧子劈,刨子刨,样样活都干,而且干得非常出色。不久,他得到荷兰当局允许,又到东印度洋公司学习造船学理论。为了完全掌握这门技术,他坚持完全由留学生成功地独立建造了一艘三桅巡洋舰。

1698年1月使团来到英国。彼得除了进一步学习造船理论外,着重学习英国的议会制度。为了真实了解英国君主立宪的运作程序,彼得获准在英国上院会议厅旁边的一间房子里,听取会议进行的情况。后来彼得觉得国王参加议会当面听取议员的意见,很有益处,俄国应该向英国学习。

使团在同年1月到达波兰。因为他同波兰国

王奥古斯特二世私交甚厚,他不再隐姓埋名,而以沙皇名义同对方会谈。彼得率团出访西欧各国,除了学习先进技术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游说各国建立反对土耳其同盟,结果很不理想。在会谈中奥古斯特二世向彼得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共同反对瑞典最符合两国利益。由于他说得有根有据,使彼得十分信服。并从此将俄罗斯争夺出海门户的重点,从黑海转移到波罗的海。瑞典当时是个东北欧强国,占领了波罗的海东西两岸许多海湾和土地,俄罗斯沿海的许多土地也被瑞典占领。彼得和波兰国王击掌为誓:不败瑞典,誓不罢休。

雷厉风行革除弊政

彼得一世回国后立即雷厉风行地全面进行改革,革弊兴利,趋利避害,使整个国家面目一新。

首先改革礼仪制度。在彼得回国的第二天,大臣、贵族、领主纷纷前来晋见。彼得早已等候。他身穿西服,胡子全部剃光,完全是欧洲人的打扮,他对来者行跪拜礼立即加以纠正,说那是旧的仪式,今后再不能行这种礼了。他简要向大家讲述这次出访的成果和西方的进步以后,就提出首先进行礼仪改革的要求。这时,他拿出一把剪刀,把前面的几位亲信重臣的胡子剪了下来,尽管大家不满意,但皇命不敢违抗,很快就在朝廷所有官员以及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接着彼得又要求大臣们带头换掉宽大、拖地的长袍,一律改成西装,并逐步在全国推行。

进行政治改革是彼得思考已久的大事。他对蓄谋政变的宫廷贵族及其工具——射击军重拳出击,严厉打击,先后两批处死 799 名叛军官兵,甚至对某些罪犯采取车裂、暴尸的残酷手段,使人们明白沙皇的意志和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彼得在 1699 年设立了由他的亲信组成的办公厅和枢密院,又两次进行地方行政改革,从而建立起一套有效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彼得还“温和”地告诉神职人员:教会活动只限于精神方面,不得干预政治,不得插手世俗事务或仪式。神职人员同样要效忠沙皇,无条件执行沙皇旨意。

军事改革是彼得各项改革的核心和重点。他

取消了原有的雇佣兵和贵族军队制度,实行征兵制,主要征集对象是农民,先后征兵 53 次,经过严格训练建成一支 20 多万人的精锐部队。对于军官的选择,不是看门弟出身,而是看军事才能和军功,有力提高了军官的素质。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可以说耗尽了彼得毕生的精力。他在顿河上游的沃罗涅什建立起造船基地。下令筹集资金。凡拥有农奴 1 万户的领主和 8 千户的教堂要缴纳一艘战舰,逾期不交的将没收土地财产。皇室人员也不例外,彼得自己带头捐了 9 条战船。资金征集到以后就由从欧洲聘请来的技师主持建船,先后建成能架 16 门、46 门大炮的火攻船 24 艘,加其他各种船只计 2000 余艘。1696 年成立了黑海舰队。1703 年又在奥洛涅茨造船厂造成 43 艘大型战舰,成立了波罗的海舰队。

为了支持军事改革和军事建设,彼得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他大力支持和促进对外贸易,鼓励商人到国外去做生意,除了发展同欧洲各国的贸易外,也同东方中国、印度等国发展贸易。同时颁布关税条例,对进口的外国商品课以高税,以保护、扶植民族商业。彼得还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工业生产的发展。他鼓励商人开办工厂,国家给予贷款和各种优惠条件。鼓励外国人在俄投资办厂,在经营一段时间后,转让给俄国人经营。国家招聘国外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到俄国帮助兴建官办工场。他还通过政策规定,促使大批农奴进入工场,从事工业劳动。彼得执政前,俄国军需民用的铁都要从瑞典进口,到 1725 年已经可以向国外出口。1680 年俄国国库收入为 150 万卢布,到 1725 年,超过 900 万卢布,翻了 6 番,保证了战争的经费需求。

彼得以铁的手腕进行上述改革。他不仅残酷镇压叛军和农民起义,即使自己的亲属违抗改革,触犯刑律也毫不留情。他的姐姐索菲娅,因为支持射击军叛乱被他终身监禁于修道院。他的儿子并已立为太子的阿列克塞,因为勾结奥地利反对改革而被捕囚禁,死于狱中。正如马克思所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

圣彼得堡的建立和发展

彼得大帝自 1695 年 7 月与土耳其在亚速交

战,直至1723年争得黑海西岸和南岸,先后征战28年。其中绝大多数为俄罗斯争夺出海门户。

1702年,彼得一世趁瑞军主力远征波兰,波罗的海沿岸防务空虚之机,率领大军直奔涅瓦河口,先后攻克了瑞军坚守的诺特堡和宁尚茨堡。整个涅瓦河流域全部落入俄军手中,俄国在波罗的海开辟出海口的梦想成为现实。

1703年5月6日,彼得带领一班人马,乘船顺涅瓦河而下,侦察、寻找建立城堡的理想地方。他们在进入芬兰湾海域时发现一个名叫卢斯特·艾兰特的岛屿(意为“快乐岛”),地理环境非常好,景色迷人。彼得用刺刀在岛上划了两个十字划痕,随同前来的将军缅什科夫提议就在这里建堡,并命名该岛为圣彼得堡,彼得欣然同意,随即命士兵挖土奠基。这一天便成了未来俄罗斯首都的奠基日。不久,彼得把海军造船厂从拉多加湖迁到这里的一个岛上,命名为海军岛。

圣彼得堡位于涅瓦河入海口的三角地带。涅瓦河意思是泥泞的河,这里地势低洼,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对建立大都市而言都很不理想,甚至较为恶劣。但彼得认准的事,就得坚持到底。他身体力行,三次徒步勘测选址,界定城市版图。他不惜重金从各国聘请专家,规划城市布局,美化城市环境。调集全国能工巧匠精心建筑,使整个城市别具一格。建筑需要大量的石料,他下令其它城市禁止用石料搞建筑,将所有石料都调往彼得堡,并规定:凡驶进彼得堡的船只必须装载30立方石料,否则不准靠岸。建筑缺乏大批劳动力,彼得就下令各省每年要为建设圣彼得堡提供4万名劳工。这些人调来后没有住处就住草棚,粮食不够就吃糠菜,而且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高,稍有懈怠,就要受到鞭刑。由于繁重劳动和疾病折磨,大批劳工死去,彼得命令将犯人押来充当劳动力。据估计,在建筑圣彼得堡的过程中,有20多万人献出了生命。

1713年彼得下令将宫廷、元老院、政府机关和外国驻俄使节迁到圣彼得堡办公,并勒令385户贵族,作为首批移民,定居圣彼得堡。加之有些人自愿到这里开发建设,谋求升迁发财,到1714年圣彼得堡人口已达4万,1725年增加到7万。与此同时,工厂、商店、学校以及文化、卫生、交通等市政设施相继建成,经过20多年的建设,才建

成了都市。

新都主要由两个相邻的大岛组成。瓦西里耶夫岛为市中心,岛上狭窄的一端被划定为政府机关和商业区,“十二院大厦”是其最具特色的建筑,为政府各机关的办公室。大厦前面是巍峨壮观的博物馆大厦。海军岛是以彼得罗要塞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共有6座要塞。岛中央是用于庆典的“三圣广场”,广场一侧建有教堂,教堂不远处是森严的冬宫,旁边是海军部大厦。岛中的涅瓦大街,均铺着石料路面,又长又宽,道旁植树,整洁美丽。两个岛隔河相望,有多座桥梁相通。沿河两岸座落着一排排意大利式的两层宫邸,彼得的亲信和达官显贵大多住在这里。新都中最美的是“沙皇夏宫”,它富丽堂皇,出类拔萃。

1725年圣彼得堡已成为设施完备的都市,在许多地方可以与西欧城市相媲美,彼得把它视为掌上明珠,自豪地说:“新都是通向欧洲的门户,是插在波罗的海岸边的一把双刃利剑,是开辟俄国与西欧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捷径。”

同彼得大帝梦寐以求、毕生奋斗打开海上门户、融入国际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清王朝长期实行的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闭关锁国政策。与彼得大帝基本同时代的清康熙及其以后的雍正、乾隆三代,确实给中国带来康乾盛世。

但是,当时西方国家工业、科技正在以一日千里之势迅猛发展,而清王朝封建统治者对此茫然无知,顽固地坚持腐朽落后的封建经济制度和体制,拒绝任何根本性的改革。在对外关系上,坚持闭关锁国的错误政策。把自己隔绝于日新月异的世界体系之外。马克思在评述中英鸦片战争时曾极其深刻地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果然,其后在“洋人”的坚船利炮而前,只有屈辱地以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来苟生。所以,有些史学家认为,“彼得的崛起是旭日东升前的曙光,‘康乾盛世’是落日西下时的余辉。”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漫谈曹雪芹的人生态度

● 胡德平

真是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完的曹雪芹，辨不清的四十回，登不上的青埂峰。难怪去年在江苏南京召开的《红楼梦》座谈会上，一位同志发言的第一句话就是“曹雪芹万岁！《红楼梦》无疆！”可见伟人、伟著之影响。

1980年一个仲夏之夜，我和三个大学同学冒昧拜访了香山正白旗村三十九号的主人舒成勋先生。由于他的指引，我开始对曹雪芹在香山的生平活动产生了不可抑制的兴趣，并开始了业余调研。第一阶段的学习调研活动结束于1983年2月。2003年春，在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一家民营企业决定恢复重建清代的江宁织造署。我从事民营企业的工作已有十五年的历史，这家民营企业的举动，又让我燃起了过去对曹雪芹研究的兴趣。

我第一阶段的调研工作，深受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影响，正如《曹雪芹在西山·后记》中所言：“我们民族需要的不仅是物质文明的丰富光彩，同时也迫切需要精神文明的繁荣昌盛。整理者愿意本此宗旨听到看到各种意见和评论，从而做一个择善自省、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二十年后，我国民营企业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其占全国GDP的份额已达48%，税收占37%。它们的投资范围已扩大到教育、艺术、影视、出版等文化领域，不少企业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这又使我自觉地联想到中国历代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墨子主张的义利之辨，南宋叶适永嘉学派提倡的事功义利之说，都是中国企业家所独有的思想遗产和文化积淀。不知怎的，去年我又联想到曹雪芹，由此产生了把我以前整理和创作的《曹

雪芹在西山》《三教合流的香山世界》及两篇论文《香山曹雪芹故居所在的研讨》《卧游终日似家山》重印出版的愿望。

毛泽东同志是个大战略家，他的思想方法是纲举目张。其意是，个别问题、具体政策都是目，总任务、总路线才是纲。战略和战术有如打鱼的渔网，只有抓住渔网的纲绳，才能撒开网，张开网眼，打开目。也就是说，只有把握了战略，具有统观全局、宏观、战略的指导思想，才能有制定正确战术的可能。《红楼梦》中的章回、故事，《废艺斋集稿》的工艺都是目，作者的人生态度、世界观才是纲。我们只有逐渐明白了他的人生态度、世界观，才能认清他写作的故事情节和要说明的问题。

笔者在《三教合流的香山世界》一文中认为，曹雪芹不但反儒，大胆背叛经过注疏的孔孟经典、宋明理学、明清八股的“仕途”之路，而且毁僧谤道，并通过甄、贾宝玉之口说，女儿两个字，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

清朝康雍乾三代，号称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期。这一时期确实国土广大，财源充裕，人口众多，但专制制度、文化禁锢亦达前所未有的地步。他们不但以帝王之尊君临天下，也以儒、释、道合一的教主身份谕化中国，尤以雍正为最。雍正在位十三年，除了他的《御制新书》（《红楼梦》语）有《朱批谕旨》、《上谕内阁》、《上谕八旗》、《大义觉迷录》外，还有他的佛学著作和汇编而成的《御选语录》，并召开“当今法会”，宣讲儒释道三教合流的道理，真是“往复周详、连篇累股”，“不惜眉毛拖地”。他想达到的主要目

的即“然则终日念佛，岂有为念佛所窒碍哉？又何必但许人恶梦，而不许人善梦也？”（《御选语录》卷十三）一僧一道对梦的认识则为：“那红尘中却有些乐事……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红楼梦》第一回）而曹雪芹这部伟大的著作，一方面向人们讲述了一部貌似温柔富贵、花团锦簇的《红楼梦》，实则却是一场险梦、凶梦、恶梦！另一方面，作者通过石兄之口，说出它的红尘生活是真实的，是有意义的。“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蹊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红楼梦》第一回）曹雪芹对宝黛二人爱情的讴歌，在他书中因爱情破灭而遁入空门的青年，绝不是他们具有佛性，而是具有强烈的人性，所以石兄要竭力传世，告之后人，何谓“到头一梦”，何有“万境皆空”的道理。补天派是雍正、乾隆等大大小小的封建卫道士，曹雪芹则是一位离经叛道的人性论者。

那么，曹雪芹的人生态度究竟是什么呢？他的哲学思想又为何呢？我认为，贾宝玉焚书和林黛玉焚稿有同等意义，都是《红楼梦》一书主旨所在。“林黛玉焚稿断痴情”一回，说了黛玉将死之前，把她对宝玉所写的诗稿全都付之一炬，这是她一生最宝贵的爱情象征，这是她最美好的希望所在。而宝玉准备焚书，也是他勉强赴考，决心出家的重大命运的转折点。在“惊谜语妻妾谏痴人”（《红楼梦》第一百一十八回）中写道：宝玉送走贾兰，便出来将那本《庄子》收了，把几部向来最得意的如《参同契》、《元命苞》、《五灯会元》之类，叫出麝月、秋纹、莺儿等都搬了搁在一边，并回答宝钗道：“如今才明白过来了，这些书都算不得什么，我还要一火焚之方为干净。”“宝钗听了，更欣喜异常。”难道宝玉幡然改悔，成了投降派？否。接着，“宝玉便命麝月、秋纹等收拾一间静室，把那些语录名稿及应制诗之类都找出来，搁在静室中，自己却当真静静地用起功来。宝钗这才放了心。”宝玉要一火焚之的几部书和搁在静室之中的语录、名稿、应制诗绝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他喜爱的，喜爱犹如林黛玉所焚之诗稿。后者是他讨厌的，看透的旧文化！所以搁在静室，打人冷宫。“语录”或是宋儒的著作，或是佛家经典妙语，这里的“语录”恐怕还有特殊意义，前面

已说过，雍正就有《御选语录》之著。“应制诗”就是颂圣的诗词歌赋。何为“名稿”呢？据人民大学马时进教授介绍：《儒林外史》书中的马二先生把历代会试、殿试中的名卷汇集起来，为考生科举之用，也是他赚取钱财的手段。据此可知，宝玉对此的态度是多么鄙弃不屑了。但他又不得不“用起功来”，准备应考，愤怒压抑之心可想而知。

宝玉这时又说了句“内典语中无佛性，金丹法外有仙舟”。这句诗应是贾宝玉的基本人生态度。他认为佛性不存在于佛家经典中和偶像之中，《五灯会元》中即说“青青翠竹，尽显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无情有性，翠竹、黄花都可以通过自身之法、智慧之明到达涅槃彼岸，何需“混盖庙”、“混供神”。何况青春年华的闺阁儿女，他们有情有爱有性有欲，即使呵佛骂祖，亦有佛性。否则空空道人为何易名情僧呢？《石头记》为何改为《情僧录》呢？因为，禅宗的“人人皆有佛性”、“世法平等”、“佛门平等”的观念宝玉是接受的，所以才说“内典语中无佛性”。道家追求的“金丹”完全是要乞求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灵丹妙药，但正如袭人所言：“至于神仙那一层，更是谎话，谁见过有走到凡间来的神仙那？”宝玉认为到达仙境的仙舟是有的，但在金丹方术之外，正如《南鹞北鸢考工志》中对比翼双燕的兴托寄寓：“卜居武陵溪，仙源靡赋役。相敬诚如宾，真情非伪饰。”武陵溪、桃花源是一个不知有汉、遑论魏晋，无赋税、无劳役的地方。就说桃花源是乌托邦之地，但也要分清封建早期、中期、晚期乌托邦所出现的社会发展阶段。能否说曹雪芹是中国封建社会充分发展之后，并日趋死亡之时，新萌芽的阶级思想文化的代言人呢？我们说曹公反儒、反佛、反道只是说他反教，反对专制愚昧的文化统治，但对战国时期的百家、佛学、道家、玄学并不是一概排斥。曹雪芹极其推崇阮籍，取字“梦阮”。他对老庄、禅宗中的辩证思维、破除偶像、冲决传统、追求自由等方面均有继承。宝玉要烧的《参同契》经湖南周士一教授翻译成英文后，成为一部极受西方汉学家欢迎的作品。

曹雪芹对社会贫富问题，也有他极为明确的观点，这也是他的一大人生态度。他生长在“康

乾盛世”，却通过石兄之口说道：“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然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那里有工夫去看那理治之书？”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同情弱势群体的女性，同样同情弱势群体的贫困人群；痛恨男尊女卑的宗法制度，同样反对贫富对立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是四大家族的家产、财富，那是阿房宫、东海龙宫都无法比拟的；一方面却是柳婶对司棋说的“有一年连草根子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红楼梦》第六十一回）多么形象。

曹雪芹认为他所从事的技艺，多是“微且贱矣”、“人皆鄙之”的手艺，之所以“今乃晓喋不休，勾画不厌，以述斯篇者（注：指《南鹞北鸢考工志》），实深有所触使然也”。这使他想起“思古之世，鰥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感此实触我怆怀，于是援笔述此《南鹞北鸢考工志》。”“斯以为今世之有废疾而无告者，谋其有以自养之道也。”跟他学会扎糊风筝的于叔度，说到感激曹雪芹的情义时，曹雪芹便制止说：“何况朋友本有通财之义。”当时朝中吏部侍郎董邦达曾赞《南鹞北鸢考工志》曰：“尝闻教民养生之道，不论大术小术，均传盛德，因其旨在济世也。扶伤救死之行，不论有心无心，悉具阴功，以其志在活人也。曹子雪芹悯废疾无告之穷民，不忍坐视转于沟壑之中，谋之以技艺自养之道，厥功之伟，曷可计量也哉！”

以上引文均引自于吴恩裕先生的著作《曹雪芹佚著浅探》等书。从中我们可以知道，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香山的生活时期，他和社会底层有多么广泛深入的接触。他同情下层劳动人民，并尽其所有所能帮助向他求告的朋友、穷苦人、盲人、残废人，使他们有技有艺，以谋生计。正如舒成勋先生所言，曹雪芹能够写出《红楼梦》需要许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曹先富后也富，或先穷后也穷，他绝写不出《红楼梦》。如果他先穷，以后富起来，他也不可能写出《红楼梦》。只有他先富，以后贫困潦倒，他才有可能写出这部伟大的文学著作。

吴恩裕先生认为曹有近墨思想，这是很了不起的观点，值得深入研究。我在全国工商联工作时，曾于1995年10月接待过日本京都陶瓷株式

会社稻盛和夫先生，在欢迎宴会上致词时，我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既是同义语，又可以互为引申，互相补充，二者共生共荣，共同发展。……把爱与利统一起来的伦理观，在我国经济思想史上是罕见的。”“可以说，墨子这一人道主义思想最少统治阶级的烙印，而又最能反映劳苦大众的利益。”应该说曹雪芹继承了这一优秀伦理思想。

“兼相爱”的“兼”，“交相利”的“交”，二者互为主体，又均为客体，意思就是要想得到真正长久的利益，必然是互惠互利之交，利人利己之爱。曹雪芹笔下的王熙凤对刘姥姥既有耍笑，也有接济，最后巧姐终有一归宿，比大观园的其他姐妹们的命运要好，到底最后是谁帮了谁呢？《红楼梦十二支》之一的《留余庆》说得精彩：“留余庆，留余庆，忽遇恩人；幸娘亲，幸娘亲，积得阴功。劝人生济困扶穷。休似俺那爱银钱、忘骨肉的狠舅奸兄，正是乘除加减，上有苍穹。”（《红楼梦》第五回）

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还有更为深刻的哲学基础，此即“尚同”。战国后期的儒家接过“尚同”的命题，改变了孔子学说中的“和而不同”的主张，从而在《礼记·礼运》篇中提出了“大同”和“天下为公”的崇高思想，其号召力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永恒的魅力。曹雪芹一再关心帮助那些“鰥寡孤独废疾而无告者”，就是这一思想的光辉传承，并付诸行动，真有“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精神”。

1994年，我国十位民营企业发起光彩事业活动，即以“兼相爱、交相利”的“义利之辨”作为光彩事业理念的最早源头，并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义利观的事业宗旨。现在看来，在古代“义利之辨”的源流中，还应加上曹雪芹近墨或继墨思想这一极为重要又亲切的一章。

晚清积极倡议变法维新的梁启超认为“墨学可以起中国之衰”。毛泽东认为墨子是中国的赫拉克利特。陈独秀把曹雪芹誉为“盖世文豪”，并且大胆宣称要用四十二升重炮向封建主义开炮。《新青年》创刊号的笔法也袭用了曹的曲折障眼风格——“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却收到了启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成效。

最近，孔祥泽先生细解曹对孔墨两家的态

度,我十分同意。他说曹对孔子称为“先哲”,如“‘玩物丧志’,先(哲)斯语”,“玩物丧志”系孔子所言。对墨子则称为“夫子”,如“惟墨子作木鸢……接其初衷,殆欲利人,非以助暴;夫子非攻,故其法卒无所传”。

“夫子”地位高于诸位先哲,故在雪芹看来墨子地位高于孔子已是十分明白之事。以上两句话均引自《南鹞北鸢考工志》。在《红楼梦》八十四回中亦有这种描写,如贾宝玉开笔作文第一题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他的作文承题却是“夫不志于学,人之常也”。“圣人十五而志之,不亦难乎”。第二题《人不知而不温》,贾宝玉写的又未切题:“能无温人之心,纯乎学者也。”第三题《则归墨》,贾宝玉破题云:“言于舍杨之外,若别无所归者焉。”承题则为:“夫墨,非欲归者也;而墨之言已半天下矣,则舍杨之外欲不归于墨,得乎?”在贾氏父子问答之中,贾政批评宝玉“可见你本性不是个学者志气”。他的夫子自道是“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宝玉的本性不喜人股,没有学者志气,在宗法专制制度对人性的压抑下,逼得宝玉说出“欲不归于墨,得乎?”

说到这里,我想到在初中时的一段往事。那时,我父亲数次给我讲过这段贾氏父子问答的故事。他对贾宝玉的回答常常是大笑不止,似有欣赏之意,他赞成孩子的天真纯情,之前也曾在公开场合讲话,提出“为什么不许孩子调皮”的问题,似乎也发表过文章。但他又指出十五岁的少年应有自己的志向,这个道理恐怕是与他的经历有关吧。

我上高中时,我父亲有回极有兴致地给我讲,他相信曹雪芹写完了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他说:“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若没有写完,怎么批阅、增删呢?况且

还把目录、章回都整理出来了嘛!”我想黛玉之死,宝玉出家,都是《红楼梦》中情节高潮的高潮,今天又看到宝玉烧书、归墨思想的情节,这都是有极高思想性的章回,反映了曹“冲决网罗”的先进意识。若不是曹雪芹所写,又岂能是高鹗所创造呢?

我父亲曾仔细看过《红楼梦》,文革前常挂在他嘴边的一句话是:“咳,你这是信口开河!”兴致若高,谈吐甚快时,他又会对没有弄清情况和问题的人,情不自禁地开个玩笑:“‘刘姥姥是信口开河,情哥哥偏寻根究底’,先弄清情况再谈。”然后笑眯眯地看对方反应。究竟他什么时候看过《红楼梦》呢?我也不知道。但他多次谈过:在延安抗大、八路军总政治部工作时,是他看书最多的时期之一,那时他深受毛泽东《实践论》的影响,凡能找到的各种书籍,他都如饥似渴地阅读。我母亲笑他读书之狂、之多,他也笑着承认“我就是个杂家!”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前线时,他把大部分藏书都装箱掩埋,并作了标记,可惜以后再未找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么说,曹雪芹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家。话又说回来,世人对香山正白旗三十九号老屋那副由拙笔——鄂比——酒鬼鄂三写的对联——“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疏亲慢友因财而散世间多。真不错”,也就不应随便儿戏视之了。

(摘自《〈说不尽的红楼梦〉前言》,中华书局2004年4月第1版。)

欢迎邮购《炎黄春秋》近年合订本

通 告

2003年合订本于2004年1月装订完毕,如购买合订本,请将书款汇至我社发行部

1999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2000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2001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2002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2003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以上均免收邮费并挂号邮寄)

曹雪芹与黄叶村

● 贺 海

今年是我国的文学巨匠曹雪芹逝世 240 周年。报载,前不久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曹雪芹纪念馆等有关方面在香山召开了以“曹雪芹与黄叶村”为主题的座谈会,探讨曹雪芹在西山一带的有关足迹。

大作家曹雪芹是清季以来在我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的一代伟著《红楼梦》,不仅在国家喻户晓,在国外也享有盛誉。只从现存的最古抄本(1754 的甲戌抄本)算起,已经风行了二百余年。但是,对于曹雪芹经过许多红学家的反复考证,不断发掘、爬梳,仍有许多不解之谜,如对他的生歿年代、家世、祖籍,特别是在他相当贫困的晚年,写出这部惊世之作《红楼梦》,生活状况如何?著书的具体地点在哪里?历代都有不同的见解,值得探讨的问题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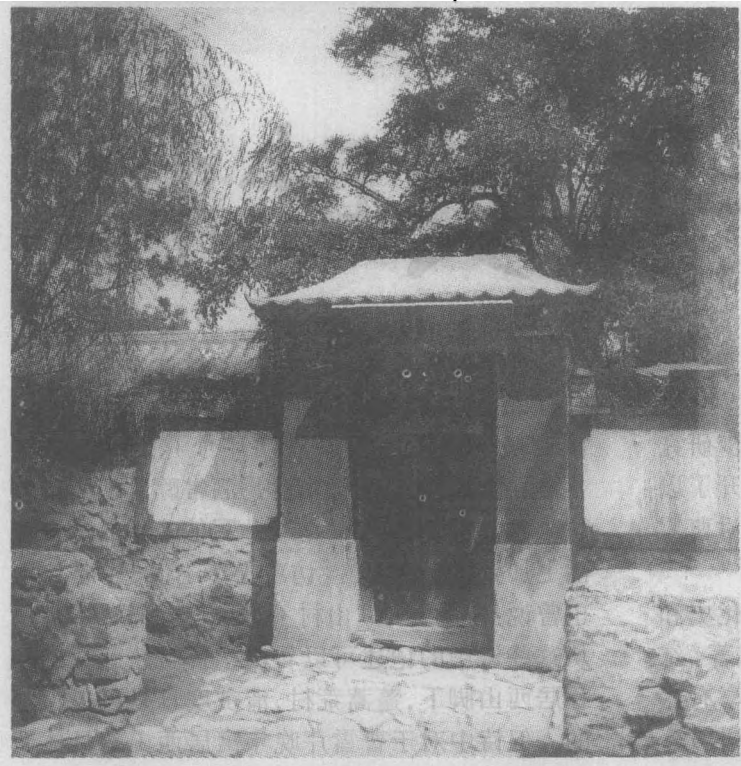
曹雪芹与北京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点得到了专家们的共识,但是,他的生平经传一点也没有,除一部《红楼梦》外,没留下片纸只字,仅能从一些笔记、诗话或诗集中去寻找,香山一带的古老传闻中也提供了一些线索,不过学界对此是有歧义的。

据学界推断,清雍正初年,曹家被抄,曹雪芹不到 13 岁,以后举家搬回北京定居下来,先在城内居住,后因生活拮据,“长安居,大不易”,不得不移居西山脚下,直到他去世,先后大约经过了 30 余年。其根据,主要是与他同时代的旗人敦诚、敦敏和他酬和的诗。敦诚著有《四松堂集》,他兄弟两人的诗文,有的被收入《八旗文经》以及《熙朝雅颂集》中。从诗文中看出,他们同曹雪芹的友谊是相当深厚的。敦诚于乾隆年间曾写有《寄怀曹雪芹》一诗,说他“于今环堵蓬蒿邨”,末了两句又说:“残杯冷

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敦诚后又写了一首《赠曹芹圃》(芹圃曹雪芹号),头四句是:“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衡门僻巷愁今雨,废馆颓楼梦旧家。”写他晚年的贫困生活更加具体。敦敏在《访曹雪芹不值》一首诗中也曾说:曹的住地“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从这些诗中的记述可以看出,曹雪芹此时已经移居西山脚下,蓬蒿荒村,清贫度日是可以肯定的。但诗中对于曹雪芹晚年寓居西山的具体地点并无记载,学界经过反复考证,虽未找到具体的位置,但却划定了香山、卧佛寺、樱桃沟、健锐营等这一范围。这一带不仅是当年旗籍的营房,而且也遗留了不少古寺、河墙、古墩等文物,以及关于曹雪芹的一些民间传闻。

香山的卧佛寺、樱桃沟一带自古以来就是个寺观林立,泉水淙淙之处,满山遍野都是青松、枫树、柿树、黄栌等林木,一到秋天,枫树、黄栌等树由红变黄,待秋风四起,遍地皆是黄叶,形成了秋色宜人的景观。《日下旧闻考》说它是“西山兰若之冠”。卧佛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初名兜率寺,后几易其名,清季定名为“十方普觉寺”,沿用到今,因寺内卧佛著名,故俗称卧佛寺。清代著名文学家和书画家郑板桥,生前在京曾与庙内主持僧青崖夙有交往,在他的诗集中曾有一首《访青崖和尚》,诗中说:“匹马径寻黄叶寺,雨晴稻熟早秋天”。诗人笔下,卧佛寺又有黄叶寺的别称。

再有敦敏曾留下一首《西郊同人游眺兼有所吊》的诗,诗云:“秋色召人上古墩,西风瑟瑟敞平原。遥山千叠白云径,清磬一声黄叶村。野水渔航闻弄笛,竹篱茅肆座开樽。小园忍泪重回首,斜日荒烟冷墓门。”诗中写的是一次小园聚会,地点看来是在香山健锐营一带。健锐营一带



北京西山黄叶村

是清代驻有数千旗籍官兵及其家属的大营盘，并建有团城演武厅。八个旗的所在地都建有碉楼，又称梯子楼。但这些碉楼只有八个是活碉楼，可以上去，其它都是实心碉楼，不能上达，因此，香山一带过去有句歇后语，叫做“七死八活”。乾隆年间修建演武厅、碉楼，当时是为了在此训练朝廷的特种兵——云梯兵。敦敏诗中所指的“古墩”，即指建于金山右环正白旗境内的活碉楼，经修复，如今仍然存在。

再说与卧佛寺相邻的樱桃沟。从香山脚下卧佛寺西北隅的行宫院旁，沿路西行，便进入了由寿安山两座挺拔秀峻的山峦形成的樱桃沟峡谷，这条峡谷绵延约三里。樱桃沟早就是一处因势利导，自然取胜的景区，隔断尘嚣，恬谧幽静。沿径前行，淙淙琤琤的悦耳泉声，倾泻于石罅之间，这就是古今闻名的“水源头”，也叫水尽头。这股山泉格外甘冽清甜，早在明清时期，此处就成为文人墨客寻幽揽胜之地。《帝京景物略》一书中曾描述这里是“薛萝深处一虹流，碎玉疏水曲磴幽”。

水源头的南面耸立着一块一丈有余的巨石，通体寸草不生，惟独北面裂缝中长出一株桧柏，人们俗称“石上松”。此处景观早在三百多

年前就已形成。清初成书的《春明梦余录》记载，“独岩口古桧一株，根出两石相夹处，盘施横绕，倒挂于外。”据当地古老传闻，曹雪芹当年居于香山脚下，曾来此收集素材，见到这株石上柏，很受启发，于是引出了《红楼梦》里贾宝玉（冲璞）和林黛玉（绛珠）之间的“木石前盟”这一奇缘的构思。香山一带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首与此有关的歌谣：“退谷石上松，人称木石缘，巨石嶙峋宝，甘泉溢水甜，山上疯僧洞，山下白鹿岩（均为附近名胜），曹公生花笔，宝黛永世传。”说也奇怪，这块巨石下面的一泓清水，四时不竭，夏不外溢，冬不结冰。

樱桃沟峡谷内，古树名木很多，到处可见。历史上的寺庙有五华寺、普济寺、隆教寺以及广泉寺等。不过这些寺庙由于年久失修，到了清季基本上都成了“废寺”。与曹雪芹同时代的好友张宜泉，曾在《万柳堂诗集》中留有一首《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诗中说：“君诗未曾等闲吟，破刹今游寄兴深。碑暗定知含雨色，墙颓可见补云阴。蝉鸣荒径遥相唤，蛩唱空厨近自寻。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谁曳杖过烟林。”

从曹雪芹同时代的好友敦诚、敦敏、张宜泉等人留下的诗文，再加上当地的历史遗存，以及百多年民间的古老传闻，曹雪芹的晚年寓居于西山脚下，他的足迹基本上是在香山、卧佛寺以及樱桃沟一带，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客观上来说，他生活在这样一个自然胜境和世俗生活当中，这些对于他的文学创作和汲取艺术素材应该说是帮助太大了，再加上他本身的经历，才写出了那部惊世之作《红楼梦》。不过，曹雪芹著书的黄叶村是专有所指，还是这一带的泛称呢？看来泛称的可能性较大。学界的多年考证，也没有肯定具体的位置。

1984年，香山植物园在现在的正白旗村39号院建立了“黄叶村曹雪芹纪念馆”。在此建馆，主要是根据在此祖居多年的老旗人舒成勋提供的佐证。认为此处宅院根据屋中门窗格局以及房子木料的陈旧程度，断定是二百年前的

老屋,又地处当年的旗籍营盘之内,尤其是1971年在这处老屋的墙皮下面发现了不少题诗和对联,因此,这位老旗人肯定这就是当年曹雪芹的故居。再加香山民间有首歌谣说:曹氏故居“门前古槐歪脖树,小桥溪水野芹麻”,正好这处老屋门前还有两株古槐,距此不远就是一条已经干涸的小河。当时对于这处故居曾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特别是红学家们的悉心考证。二十多年来虽未肯定此处即曹氏故居,但对北京植物园在此建馆,并开辟了黄叶村这一周边环境,还是得到了学界的肯定和支持,这毕竟为研究曹雪芹的晚年生活、著书环境提出了又一佐证。

这位才调极高的曹雪芹,在北京的西山脚下度过了他平淡艰苦的晚年,直到去世。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他完成了“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可见他对这部书所付出的艰辛劳动。

曹雪芹是200多年前封建时代的大作家,而且出身于“烈火烹油”的豪门贵族,但最后落(上接第5页)许多文章是围绕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而写下的。现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德平在序言中评价说,读李定的文章,“给人以淋漓酣畅,言之有韵的感觉”,可谓中肯。俗话说,“文如其人”。李定的文章之所以给人这样的感觉,是与他朴实的为人分不开的。

“有许多文章他是走出来的”。李定的夫人李美全深知这一点。李定是注重调查研究的人,他要用实践来证明私营经济发展的前景。他跑了全国许多地方,总是轻车从简,不游山,不玩水,直奔调查地区。边调查,边论证,再深思。所以,这些文章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很深的底蕴。

李定的许多文章写在“姓资姓社”争论最激烈的时期。对于分管中华全国工商联工作的副部长李定来说,是处在风口浪尖上的。他本可以明哲保身,不讲话、不写文章、不表态。不讲、不写、不表态,一是保险,不会出错;二是显得政治上深沉、成熟,让人摸不透而生敬畏之情。即使躲不过去,非写文章不可,也可以让秘书或研究室的写手依照报纸、文件炮制一篇没有任何错误,也没有任何新意的文章。但是,李定没有这样做。接任

得举家“食粥”、“赊酒”度日,可以说他的一生饱经沧桑。这种家庭的巨变,封建制度给他的家庭和他自己所带来灾难,使他“耿耿于心”,正因如此,他才“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魄垒石”(敦敏诗)。否则,红楼梦也许难以成书。

曹雪芹也是一个“傲骨嶙峋”的人,他的晚年正如《红楼梦》中开卷第一回所写:“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应该说相当凄凉。即使在这样一个一贫如洗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去投亲靠友,趋炎附势,表现了一个封建文人的正直、骨气,正如敦敏在一首诗中对他的评价:“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这也是200多年来后世人们对他所以敬重的原因之一。他的一生虽然留下了很多不解之谜,但并没有影响国内外学界对他的高度评价。

我不是红学研究者,没有资格侈谈《红楼梦》或者曹雪芹,当纪念他逝世240周年之际,这篇小文只是提出“西山何处黄叶村”这一值得探讨的问题。(责任编辑 致中)

李定担任全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的保育钧深情回忆说:

他不仅写文章、讲话,而且亲自动手。与当时“左”派们气势汹汹的文章相反,李定的文章、讲话几乎没有任何论战的口吻,也没有得理不饶人的盛气和霸气。他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平心静气,娓娓道来,信不信由你,决不强加于人。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人品、文品、官品的统一,贯穿在李定文集之中,贯穿在他七十余年的生涯之中。

在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转型时期,官场陋习蔓延,不少人人格扭曲,而李定能坚持其数十年的朴实作风不受侵染,的确难能可贵。

古人将“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李定一生在实践着这“三不朽”。已作为历史人物的李定,他的德行、事功、言论,足以垂世者,绝非本文所描述的这一点。胡德平认为,《李定文集》“实在是统战工作者、非公经济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读之有益的好文章”。他的许多创见,也应引起学者们的研究。而他朴实的为人、为官的品德,也值得人们去敬重,去学习。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漫画家沈同衡

● 萧 阳

1914年10月15日,沈同衡出生在江苏省宝山县(现上海市宝山区)一个教师家庭里,受父亲和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影响,他17岁的时候,就在家乡创办了农民夜校,并在县立萧泾小学担任教员和校长,从事平民教育。同时,还担任了县报的特约记者。他还联合了几所小学合办刊物,担任主编,编辑出版宣传抗日的少年儿童读物。他编辑的儿童读物《动物常识故事》10册被世界书局列入《小世界丛书》出版,被周围的人人誉为“小先生”。“九一八”事变后,他组织了大风文艺社,编辑出版了《大风》半月刊。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他以自己的亲历感受,撰写了《谁是我们的敌人》一书,在大东书局出版。

1934年,沈同衡考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油画系,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

1937年他在新华艺专毕业,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他的家乡被日军占领,他和一些爱国青年组成救亡宣传队,向内地转移,1937年底到达武汉。1938年初沈同衡在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委总政治部第三厅艺术处美术科从事绘制抗日宣传画的工作。他们在武汉的街道、车站、码头,用石灰、水粉颜料、油漆和墨汁绘制宣传抗日的漫画、标语。他们在武昌黄鹤楼下一面大墙上绘制了一幅高10米长30米的大壁画《全民抗战图》。他还编绘出版了抗战故事连环画。这一年10月,武汉沦陷,第三厅撤往重庆。1939年1月,他到达桂林后,在战地文化服务处参加了《士兵》、《前敌》的编辑工作,同时在桂

林行营政治部做美术宣传工作,编绘出版了《士兵识字课本》、《抗战故事辑》等书,兼任《桂林晚报》副刊编辑、《阵中画报》特约撰稿人和战士绘画训练班讲师。他画的漫画《加冕图》以抨击汪伪傀儡为题材,在莫斯科的“中国抗战画展”中获奖,刊登在苏联《文学报》上。同时他还为桂林文化供应社编著通俗刊物,创作出版了《刘力士》、《俩兄弟》、《从军记》《张子青定计诱敌》等故事连环画。

1941年皖南事变后,总政治部第三厅领导被撤换,工作人员被遣散。沈同衡到广西省艺术师范学校担任美术讲师兼教务主任。他以校刊《音乐与美术》增刊的名义出版《漫画专页》,协助生活教育社桂林分社编辑《桂林儿童》,创办《儿童漫画》,出版了小学美术教材。在此期间,他写了有关漫画创作的文章发表在《救亡日报》、《力报》、《桂林晚报》等报上。太平洋事件爆发后,香港沦陷,国民党报纸幸灾乐祸,《扫荡报》发表《祭香港文化人》,沈同衡写了反击文章发表在《力报》副刊上,国民党桂林警备司令部以“共党破坏分子”的罪名将沈同衡逮捕入狱。后来由桂林文协欧阳予倩、田汉通过李济深营救出狱。出狱后沈同衡仍在广西艺术师范学校工作,并加入全国木协、漫协和桂林文协从事木刻、漫画创作与编辑工作。

1944年,日本侵略军进攻桂林,沈同衡被迫离开桂林,1945年初到达重庆。他在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任美术教师,后来参加了朱学范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任《中国工人》副主编。这时很

多漫画家集中在重庆。1945年3月15日,沈同衡和叶浅予、张光宇、丁聪、特伟、廖冰兄、余所亚、张文元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八人漫画联展,在山城引起了轰动,将漫画创作推向高潮。中共办事处的周恩来看了画展后,曾会见并称赞漫画家们。当时所有的漫画杂志都被禁止发行,漫画家们借《商务日报》副刊,由沈同衡主编《星期漫画》。《星期漫画》配合当时反倒退反分裂的爱国民主运动,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直到全国漫协迁返上海才停止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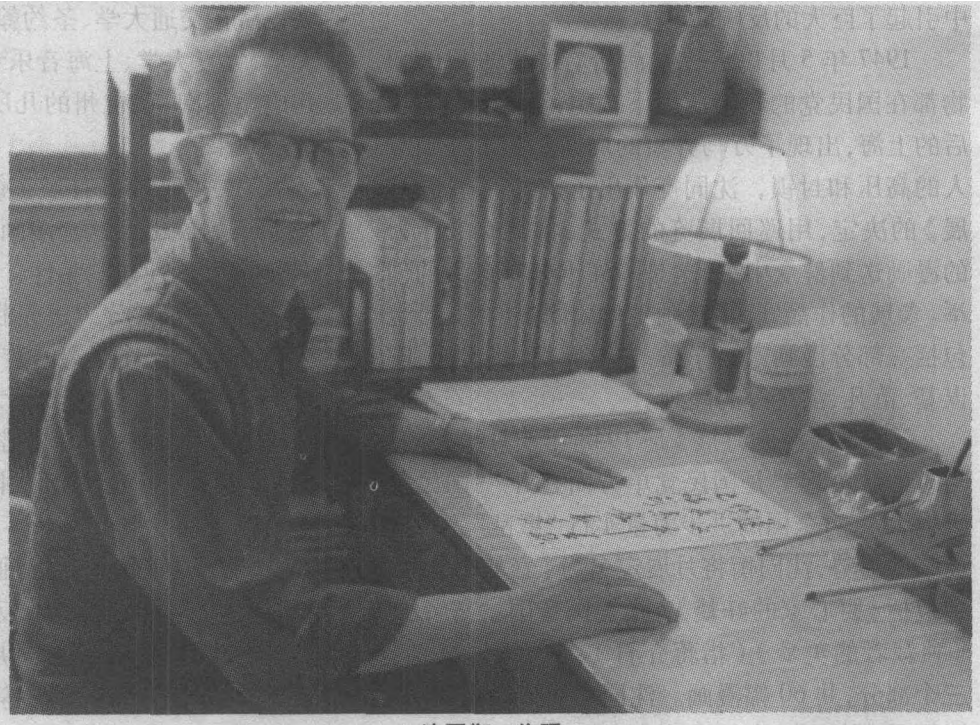
抗日战争胜利后,沈同衡从重庆回到上海,成为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的负责人之一。在多家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漫画,其中一部分漫画被外国报刊《密勒氏评论报》、《字林西报》和美国《新群众》等转载。他应聘为《文汇报》主编《美术周刊》,曾组织多次漫画专题创作,如《人民公敌蒋介石》、《美帝侵华史》等,都出版了画册。他在《文汇报》上连续发表的一百幅诗配画《百艺图》深受读者的喜爱。如《牙医》诗曰:“天生一张嘴,说话是本能。偏偏不准说,闭口牙痛生。”讽刺国民党反动政府压制舆论的卑劣行径。《写信》诗曰:“十字街头新事业,三家村里老先生。八行书上千行泪,写尽人间痛苦声!”反映了老百姓对旧社会的控诉。

1946年下半年,在《文汇报》负责美术工作的沈同衡收到许多青年读者来信,反映他们在风起云涌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迫切需要掌握漫画这一武器,以漫画创作投入战斗。于是,在全国漫协的支持下,沈同衡于1946年秋天开始筹办漫画学习班。10月中旬,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离开上海前夕,接见上海漫画界代表沈同衡、丁聪、张文元。在谈话中,周恩来对在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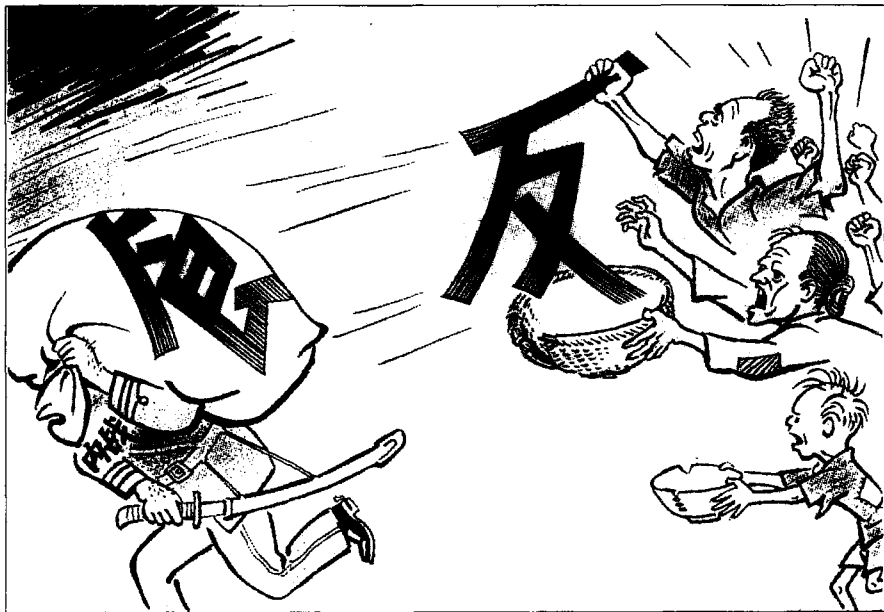
学生中成立漫画组织的事表示赞成。并嘱咐画家们:黎明前夕,有一段时间将更加黑暗,要注意保存实力。露骨的政治讽刺画无处发表,可以在报刊上发表一些社会漫画,例如物价上涨,民不聊生等等,这同样也是政治斗争。周恩来的话给了漫画家们很大的鼓舞。

1947年2月初,沈同衡在《文汇报》上刊出了一则《征求漫画同志》的启事,收到了一百多封来信,根据应征者的经历、习作水平斟酌录取后,沈同衡就开始和团员通讯联系。他利用业余时间收看每一位学员的来信,认真细致地批改作业,解答问题。漫画工学团团员约70人。其中有中学校的学生,有青年教师,有百货业的店员、职员,有商店的学徒,也有失学青年。沈同衡为这个美术团体取名“工学团”,一方面说明这是一个由工人、学生组成的漫画团体,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工作、学习、团结的意思,要求团员们边工作,边学习,团结战斗。

漫画工学团每星期日聚会一次。为了不让国民党特务发现,聚会地点经常变换,都是由沈同衡通过朋友借到学校教室后写信通知大家。教员也是由沈同衡去聘请。他和漫画家米谷、丁聪、张文元、余所亚等先后为团员们讲课和辅导习作。同学之间有时也互相观摩作品,进行讨论,或观



沈同衡工作照



沈同衡的漫画作品

摩外国著名漫画家的作品。经过一段时间的勤学苦练,学员们都逐渐提高了绘画水平。

1947年5月19日,上海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的前一天上午,在交通大学的一间大教室里,漫画工学团的团员和交通大学美术社的社员们一起作画。在第二天示威游行队伍中,100多幅尖锐辛辣的巨幅漫画,犹如一发发重型炮弹,射向敌人,在沿途围观的群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1947年5月以后,上海所有的进步报纸刊物都在国民党的政治压力下被迫停业。1948年后的上海,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为了冲破敌人的高压和封锁,沈同衡作出了举办《漫画月展》的决定,用巡回展览的方式,将富有战斗力的漫画送到群众中去,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创举。参展的作品,除了漫画工学团团员的作品,也包括一部分漫画家的作品,如沈同衡、张文元、陶谋基、范凡、洪荒等的漫画。

第一期《漫画月展》是1948年4月举办的。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对全国的进步力量实行“戡乱”。针对面临的形势,沈同衡将月展定名为《春梦图》。其中包括《野心家的好梦》(指美国帝国主义者)、《独裁者的美梦》(指蒋介石)、《人民的噩梦》三个部分,共60幅漫画。沈同衡满怀激情,为画展写了《前言》,介绍了这次《漫画月展》深刻和

富有战斗性的内容。这一套漫画用夸张、象征的手法,揭露和鞭挞了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以及卖国求荣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不顾人民死活,发动内战的罪恶阴谋。沈同衡在创作的《金盾牌的后面》等作品中,揭露了在美国盾牌的后面,隐藏的是杀气腾腾的刽子手们;以一身美丽的花纹伪装的毒蛇,隐藏着屠杀人民的炮筒;洪荒作的《救济物资、源源运到》,所谓“救济物

资”是有“US”字样的炮弹,而在炮弹下的是骨瘦如柴、手端破碗的中国老百姓;范凡作的《国民与代表》,代表是肥头大耳的地主官僚资本家,而国民是瘦骨嶙峋的老百姓;吴永清作的《简直是梦》,讽刺美帝国主义做着“独霸世界”的美梦,其实是躺在希特勒的骷髅上,寓意美帝只能得到希特勒一样的下场。这套漫画首展时,观众川流不息,反应十分强烈,接着通过地下学联先后在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等院校展出,并应邀到南京、杭州的几所大学展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第二期《漫画月展》《送葬曲》于同年5月19日开始展出。这套漫画揭露了“国民代表大会”的虚伪性与欺骗性,为粉墨登场的“大总统”蒋介石奏响了“送葬曲”。沈同衡带领漫画工学团团员们连夜突击装裱,缮写说明,一直忙到天亮完成后,送到交通大学展出,一时“容闲堂”前人山人海。上海市学联又连夜赶绘了一套《五四运动史》连环漫画,随同《漫画月展》一起展出。

5月30日,这一批漫画在上海法学院展出,吸引了近千人前来参观,反应十分强烈。第二天上午一批特务、打手闯进展厅,抢走了《又一个袁世凯》、《快到了》、《等量》、《血海鲜花》四幅漫画。下午,十几个手里拿着枪支、榔头等凶器

的特务杀气腾腾地闯进来行凶,赤手空拳的同学们和他们抗争,被打得头破血流,姚景韩、茹哲甫、刘鉴农三名学生还被抓去坐牢。

1948年9月,沈同衡和米谷、丁聪等漫画家在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转移到香港。沈同衡在香港参加了“人间画会”,在画会成立了漫画研究部,编辑出版了刊物《这是一个漫画时代》。刊物发表的作品都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战斗性。沈同衡离开上海后,装着漫画工学团师生作品的画箱一直由沈同衡夫人袁林女士保存着,当时沈同衡和袁林住在北四川路横滨桥畔的一条弄堂里,二楼房顶下面用木板搭了一个堆放杂物的小阁楼,那只画箱就存放在小阁楼上,以一堆破烂东西为掩护。警察曾多次到袁林家里来查户口,由于袁林和四个孩子镇静地应付,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那只珍贵的画箱就一直安然无恙地躺在小阁楼上,迎来了上海的解放。全国解放以后,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在此期间,举行了第一次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上海漫画工学团的部分作品参加了这次展览会,上海漫画工学团的活动也在会上受到肯定。沈同衡发起和主办的上海漫画工学团在中国漫画史上书写了壮丽的一页。

1949年1月,沈同衡由中共华南局安排进入解放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部队中原军区中原大学文艺研究室工作。后来随大军南下,到达武汉,在武汉军管会文教部文工团负责漫画工作。他在武汉创作了大量大幅宣传画,在街头展出。不久,因工作需要,调回上海

在上海,他担任上海军管会文艺处美术室副主任,负责筹备组织上海漫画联合会,被推选为上海漫画联合会主席。上海文联和美协成立后,他又被推选为文联委员、创作研究部副主任和美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并任漫联主席。他和米谷等漫画家创办了《漫画月刊》,任执行编委。又应邀为《文汇报》主编《美术周刊》。他还在《劳动报》上连续刊载《怎样画漫画》,出版了单行本,还编写出版了《怎样画漫画人物》。他为上海文化事业作出的贡献,受到上海人民的充分肯定,被推选为首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政协委员。

1953年,沈同衡被调到北京,担任《人民日报》文艺部美术组负责人。这个时期,他创作了

大量新闻漫画。

1956年,为了配合当时试行的“文艺作者职业化”,他改为专门从事漫画创作,兼任文艺部顾问。1957年,却以“摆脱党对文艺的领导,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道路”的罪名,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他以前写的谈漫画创作的文章,已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结集为《漫画漫谈》出版,但已编好的续集却被迫停止出版;应晨光出版社之邀编辑的《苏联漫画选》10册,只出了两册,就此夭折了;已向天津某出版社交稿的《与青年同志谈漫画》,从此杳无音讯;与北京某出版社签约的《中国现代漫画家作品集》也半途而废。他被安排到报社图片组整理照片资料,被迫放下了手中的画笔,长达22年之久。

1966年2月,他被分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南疆库尔勒兵团农二师二十九团农场被监督劳动,他带去的全部作品和参考资料,满满七大箱,都被“造反派”毁掉了。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沈同衡和袁林编撰了84万字的辞书《成语典故》,获得全国首届优秀畅销书奖,五次再版,发行量高达100多万册。

1979年中央落实政策,改正了1957年的错案,沈同衡从新疆回到北京人民日报社,这时,他已是65岁的老人了。他不顾年老体衰,重新拿起笔来,投入他热爱的创作活动中。1982年他离休以后,仍然勤奋地工作。他为《漫画》的复刊而奔走,1987年新闻漫画研究会成立,他被推选为会长,与人民美术出版社联合出版《新闻漫画选刊》,由沈同衡担任主编。他主持了每年一届的中国新闻漫画奖的评选工作。由于他对中国漫画事业的杰出贡献,1984年国务院授予他“国家级政府津贴专家”称号,1992年被中国美协漫画艺术委员会授予中国漫画“金猴奖”荣誉奖。1992年他因患脑溢血致残,才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画笔。

2002年1月8日,沈同衡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他一生创作的漫画在万幅以上,为中国新闻漫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漫画创作的理论研究上也作出了突出的成就。人们将永远怀念这位中国漫画战线的坚强战士。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 李 晨)

浅说时尚

精神现象零拾之十四

● 陈四益 文 丁 聪 画

时尚这东西,要让“高人”来说,可以云天雾罩,让人莫测浅深。好像一时尚,就雅;不时尚,就俗。而时尚又不断在变化,今天这样,明天那样,跟在后面跑,即便身心俱惫,也未必追赶得上,只能望洋兴叹:雅人难做。我是“低人”,也就是俗人,不能高谈,只解浅说,其说一浅,可能会大煞人间风景。

引领时尚潮流的人,起码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有钱,二是有闲。有钱,才玩得起那些花样;有闲,才玩得出那些花样。

就拿女人说,许多时尚的花样出自她们。但玩出这些花样的,大抵是两种人——贵妇与娼妓,因为只有她们才具备了有钱和有闲的基本条件。小家碧玉就不玩时尚吗?也不,但她们只是跟随潮流或为潮流裹挟罢了,从来不会站在潮流的前头。

宫廷贵妇有的是时间,也不愁没有钱供她们挥霍,加之后宫之中,“佳丽三千”,为了争宠,挽住那唯一一个男人的心,便把心思都用到了装扮上面,从头脸直到足靴,无不花样迭出。宫廷里玩出了新花样,宫廷外的贵妇人便争相效尤,然后再传到民间,成为一时风尚。《新唐书·舆服志》载,唐中宗时,后宫人戴胡帽,穿男人的衣服和靴子,“海内效之”。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据《大唐新语》记载,士流之妻,包括娼妓也都穿起男人的衣服、靴子,戴起男人的帽子了。这是时尚由宫廷贵妇发端而推向民间的例子。这情形迄今似也大致如此,比如英国黛妃的装束就为庶众所仿效。

娼妓也是以色事人的。要留住嫖客,不得不在各种装束打扮上调花样。只要这些花样能勾住



嫖客,让他撒漫花钱,就可以继续调下去。娼妓们的花样把男人从家里勾到了外头,良家妇女就学其样,希望把男人留在身边。于是,娼妓的装束,也会成为时尚推向社会。鲁迅先生曾说:“伎女的装束,是闺秀们的大成至圣先师”。他举了汉代“利屣”的例子。“利屣”是一种尖头的舞鞋,为舞者所着,“常穿利屣,即等于现在之穿高跟鞋,可以俨然居炎汉‘摩登女郎’之列,于是乎虽是名门淑女,脚尖也就不免尖了起来。先是倡伎尖,后是摩登女郎尖,再后是大家闺秀尖,最后才是‘小家碧玉’一齐尖。待到这些‘碧玉’们成了祖母时,就入于利屣制度统一脚坛的时代了。”需要补充的是,时尚一统了天下,雅也就化为了俗,不成其为时尚了,那时,又会有新的花样出现,形成新一轮的时尚潮。马叙伦先生也有同样的见解。他引用《枣林杂俎》中“近时冶容尤胜于妓”一段话后说:“余观今世妇女装束几视娼妓为转移。士大夫不惟不能止,且从而导其妇女。风俗如此,道德衰落,元气潜(下转第45页)

本期: 终审 杨继绳

执行主编 徐庆全

审校 赵友慈

欢迎继续订阅

《炎黄春秋》

求实存真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以弘扬中华文化、增进爱国大团结为办刊宗旨。对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不媚俗，求实存真，以史为鉴，以史资治。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炎黄春秋》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老革命家，是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资深的专家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2004年以来《炎黄春秋》订户逐月上升，希望广大读者下半年继续支持本刊，订阅本刊。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82-507 国内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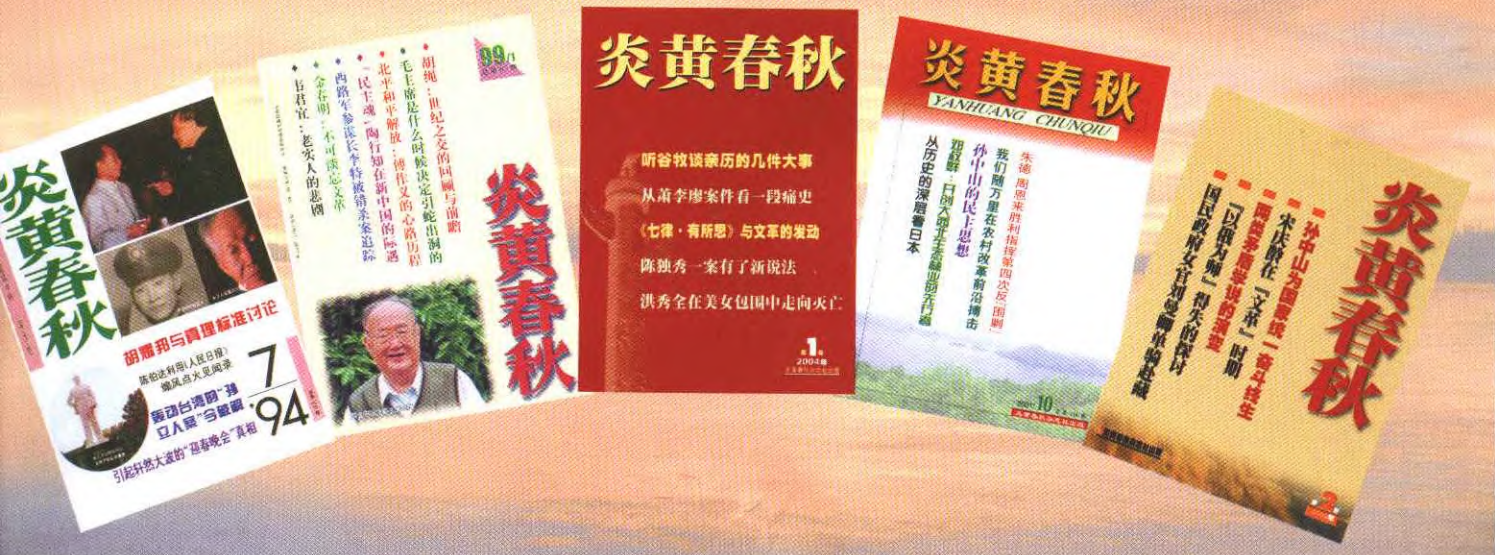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邮发代号：1274M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68532569

如在当地邮局订阅有困难，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阅，免付邮费。



- 胡德平：漫谈曹雪芹的人生态度
- “学大寨运动”的回光返照
- 赵尔陆含冤逝世真相
- 遇罗克冤案是如何披露出来的
- 彼德大帝的出海梦
- 渡江战役前夕的危险旅途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元